

审计与经济研究

JOURNAL OF AUDIT & ECONOMICS

2011年第4期
(总第140期)

总顾问

李金华 刘家义 石爱中 洪银兴

顾 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华 王光远 王跃堂 方福前 石 磊
朱小平 刘永泽 曲晓辉 孙 铮 沈立人
张立民 李若山 宋 常 易仁萍 陈良华
杨肃昌 孟 焰 杨雄胜 秦荣生 郭道扬
韩传模 谢志华 谢 荣 蔡 春 廖 洪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家新

副主任 尹 平 王会金 张金城 许成安(常务)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昊 王会金 王家新 尹 平 许成安
何 平 汪祖杰 杨 政 张伦俊 张金城
时 现 李 群 郑石桥 庞 春 姜德波
胡宁生 高 雷 蔡则祥 裴 育

审计与经济研究

双月刊
第26卷第4期(总第140期)
2011年7月1日出版

目次

特稿

我国审计需求的异化及制度成因 刘明辉 王恩山(03)

国家审计理论建设专栏

制度移植视角下的近代政府审计制度检讨 夏寒 蒋大鸣(13)

审计理论研究

机会主义倾向、经营风险与审计质量 陈良华 冯文滔 陈吉凤(21)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 李明辉 张艳 张娟(29)

盈余管理、关联交易与审计师特征 赵国宇(38)

投资机会、审计风险与审计质量研究 翟华云 廖洪(46)

财务与会计研究

应诉反倾销的会计举证资料管理平台构建研究 韩庆兰(54)

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 刘斌 吴娅玲(60)

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例 李婉丽 陈丽英 吕怀立(69)

独立董事独立性、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

——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徐高彦(77)

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分析 孙敬水 陈稚蕊 李志坚(85)

后危机时代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 王晓青 李涛(94)

基于产业互动视角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研究 冯海华(102)

书评

现代审计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有效尝试

——评《审计心理学》 李凤鸣(111)

Audit Demand's Alien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al Reasons in China	LIU Minghui, WANG Enshan(03)
A Criticism on the Government Audit System in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View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XIA Han, JIANG Daming(13)
Opportunistic Tendencies, Business Risk and Audit Quality	CHEN Lianghua, FENG Wentao, CHEN Jifeng(21)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 Review of Overseas Studies	LI Minghui, ZHANG Yan, ZHANG Juan(29)
Earnings Management, Affiliated Transaction and Auditor Characteristics	ZHAO Guoyu(38)
A Research o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udit Risk and Auditing Quality	ZHAI Huayun, LIAO Hong(46)
A Research on Accounting Adduc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for Anti-Dumping Responding	HAN Qinglan(54)
An Empirical Study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apital Efficiency	LIU Bin, WU Yaling(60)
Earnings Restatement and Real Activity Manipul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Overstatement Companies Claiming Higher Earnings	LI Wanli, CHEN Liying, LV Huaili(69)
Independ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Related Party Sale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Stock Market	XU Gaoyan(77)
A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tended STIRPAT Model	SUN Jingshui, CHEN Zhirui, LI Zhijian(85)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Post-Crisis Era: A Comparison Analysis of Bank-Based vs. Market-Based	WANG Xiaoqing, LI Tao(94)
A Study on the Producer Service Sect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Interaction	FENG Haihua(102)
An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Modern Audit and Psychology: A Commentary on Audit Psychology	LI Fengming(111)

特稿

我国审计需求的异化及制度成因

刘明辉,王恩山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 审计需求是影响审计市场乃至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审计需求的异化现象在我国资本市场的特定时期或特定范围内显著存在,是高质量审计需求缺乏的表现。这种现象可分为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审计需求的无所谓态度、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三种。诱导审计需求产生异化的制度原因是股权表决中“资本多数决”原则实质性剥夺了中小股东的监督权;国有企业和政府存在难以割舍的荣辱与共的关系;新股发行资格的行政管制以及对虚假陈述的法律惩戒不足。抑制审计需求异化的制度改革主要是通过建立分类表决机制等确保外部股东的监督权,进一步阻隔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产权联系,实行登记制等市场化的新股发行制度,通过集团诉讼等提高投资者参与虚假陈述法律诉讼的热情。

[关键词] 审计需求;审计需求异化;审计师选择;审计市场;制度;股权表决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4-0003-10

一、引言

尽管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但从本质上讲它仍是一个买卖“审计服务”的产品市场,市场需求对整个市场走势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审计需求一直是审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Watts(沃特斯)和Zimmerman(齐梅曼)的研究表明,审计是由市场自发需求而产生的。一个良性的、自发需求的市场总是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1]。随后西方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审计需求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保险理论等),帮助人们理解市场为什么需要高质量的审计。然而,对照我国审计市场的现实和相关文献,笔者却发现了一些无法用相关理论进行解释的怪现象,在此将这些现象称为“审计需求异化现象”。正常的需求引导正常的市场走势,“异化”的需求引导“异化”的市场走势,而市场走势决定着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引导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兴衰。因此,研究这些需求异化现象,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下安排是:首先,归纳出在我国审计市场存在的不同于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三类需求异化现象,描述其具体表现。然后,分析我国的制度背景,探求制度特征与审计需求异化之间的联系,以便为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提供思路。最后,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三种审计需求异化现象

审计需求的异化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这些表现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审

[收稿日期] 2010-10-05

[作者简介] 刘明辉(1964—),男,湖南汨罗人,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审计与内部控制研究;王恩山(1977—),男,山东沂南人,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审计学研究。

计需求的无所谓态度以及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

(一) 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

若高质量审计需求能够主导市场,那么在市场压力的竞争下,审计师则会竞相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市场的整体审计质量随之提高,审计市场出现良性循环。若市场存在较强的低质量审计需求,那么提供高质量审计的审计师就难以获得市场青睐,“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就会在审计市场上演。因此,防止低质量审计需求成为市场的主导,是保证审计市场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从没有绝迹过,有时甚至表现得很明显。以下两种情况就是审计需求低质量偏好的明证。

1. 独立性较弱的审计师反而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一般来说,审计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审计独立性两个方面。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一定时,其独立性越高,审计质量就越高。在我国早期证券市场上,人们发现存在普遍的“独立性提高与审计市场背离”现象^①,表明独立性较弱的审计师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市场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2]。进入21世纪后,虽然人们对高质量审计需求有所增加,但在特定范围内,低质量审计需求仍然旺盛。林志军与刘明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持股较多或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由同一人担任的公司更有可能转聘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这说明内部治理机制薄弱的公司倾向于转聘规模较小但更顺从的会计师事务所,以维持从较弱的公司治理实务中获取“不透明收益”^[3]。可见,当公司治理机制薄弱时,公司对低质量审计就存在较强的需求。

2. 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审计意见购买动机,并且往往能如愿以偿

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上市公司是一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组织,其总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当会计信息造假的风险很小而收益却很大时,公司就会铤而走险进行会计信息造假,而若此时聘请高审计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则会增加会计信息造假暴露的风险,于是低质量审计备受青睐。有些舞弊公司甚至直接以较高的审计收费来购买“干净”的审计意见。上市公司的这种动机在我国审计市场上有时能如愿以偿。杜兴强与郭剑花以2003年—2005年全部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通过审计师变更来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及其动机是否实现。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确实存在通过审计师变更来进行审计意见购买的动机。这一动机虽然在2003年没有实现,但在2004年、2005年就都实现了^[4]。

(二) 审计需求的无所谓态度

审计是一项鉴证服务,质量是其是否具有价值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质量的审计等于没有审计,对审计的需求等于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客户对审计质量的关注引导着审计师不断地提高审计技能和审计独立性,带动审计行业的良性发展,但在现实操作中,我们却发现很多公司在选择审计师时抱有对审计质量无所谓的态度。以下三点可以看做是这种无所谓态度的例证。

1. 实际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关键人物的地位较低

在正常情况下,独立董事应该在慎重的考察和论证后向董事会提出审计师选择的建议,然后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但有些独立董事往往不“懂事”也不愿去“懂事”,结果审计师的提名权实际落到了地位相对较低的财务总监甚至会计核算部门负责人手中,独立董事、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只是履行程序而已。2005年7月,《中国证券报》与四川上市公司协会联合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89.5%的独立董事从未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审计师^[5]。独立董事不去提议聘用审计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无所谓。

^①李树华以我国早期的证券审计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提高了审计质量(表现为审计意见中非标意见比例上升),但是,在审计质量提高的同时,提供高审计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却显著下降。

2. 审计师选择中没有质量偏好,人缘在选择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在审计师选择中也有体现。既然公司选择哪家会计师事务所都无所谓,那么无论哪位高管提议聘用审计师基本上都可通过,于是对审计师来说“认识”某位高管就能提升其市场竞争力。陈仕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他在整理上海地区 2004 年上市公司数据时发现,在 137 家上市公司中,有 46 组联结企业选用了相同的审计师。这 46 组联结企业共涉及 72 家企业,占总企业数的 52.55%,即约一半以上的企业选用和联结企业相同的审计师^[6]。这意味着相同的董事选择相同的审计师,同一董事任职的不同企业也因此选择相同的审计师。可见,审计师与上市公司董事之间的“人情”能提升审计师的市场竞争力。

3. 审计师选择中没有质量偏好,地缘在选择过程中起显著作用

上市公司对审计师选择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在审计市场竞争中,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在同一地方就是其一个很大的优势。朱红军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对于 2001 年和 2002 年我国首次发行股票的证券审计市场来说,地缘关系是影响审计师选择的显著因素^[7]。虽然公司选择地缘上相近的审计师的背后原因可能有很多,有时并不是“无所谓态度”的表现,而是经过了慎重考虑,如审计意见购买、人缘、费用等,但现实中公司的有些目的确实很单纯,仅仅是为了方便。这种情况就是审计需求异化的表现。

(三) 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

一般来说,只要依赖上市公司公开财务信息进行决策的人都会关注审计质量,进而会对高质量审计存在需求。这一主体主要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监管部门等。债权人与股东相比,其收益是固定的,在破产清算时享有优先求偿权,因此股东的风险要大于债权人,而且是剩余风险,股东对经营状况和会计信息的依赖性更强。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审计质量高低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于政府官员的多重代理关系和可能的权力约束机制不完善,他们在评价审计质量时很可能故意采取与股东不一致的标准。由此可见,股东是最主要的审计服务需求者,股东们认可的高质量审计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审计^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促使我国经济 30 多年来持续高增长,功不可没,但这种长期行政干预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其在审计需求上表现出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市场过度依赖行政部门的好恶,必然会漠视审计服务真正需求者(股东)的意志,导致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扭曲,不利于审计市场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以下两点可以看做是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表现。

1. 政府行政部门的偏好仍是左右审计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

2001 年 12 月 11 日,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成员,包括审计市场在内的多个服务市场正逐步开放,审计师正与来自全球的同行展开竞争。根据世贸组织的公平竞争和国民待遇原则,政府只是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不再对某些竞争参与者提供特殊的保护或支持。然而,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审计市场仍然习惯性地对政府的偏好具有高度的敏感,政府行政职能一时也难以实现理想的“归位”。审计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政策市场,政府偏好是决定审计市场总体走势最重要的因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曾在会计部便函[2002]25 号文件中列了一个包括 15 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名单,认定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具备首次公开发行的专项复核资格。虽然这个带有歧视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性质的文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这份名单充分体现了证监会对这 15 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偏爱。限于自身能力,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这种区分并不一定准确无误,而且

^①实际上,上市公司股东不是一个人,而是数量众多。他们又可分为两类:掌控经营权的内部股东和不掌控经营权的外部股东。很显然,由于掌控经营权的内部股东是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他们无需依靠审计质量来判断会计信息的可行性;而外部股东虽然和内部股东一样为公司提供了资本,承担着同样的剩余风险,但由于他们没有参与经营,不掌握内幕消息,只能依靠公开的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审计质量的高低对其利害攸关,所以更准确地说,外部股东才是真正的审计需求者。

是否完全按照审计质量进行区分也值得怀疑,但这份未执行的文件却显著影响了审计市场的需求偏好。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进入这个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专项复核名单,那么其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证券审计市场份额就显著增大^[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行政偏好对审计市场的强大影响。

2. 权力寻租在审计市场中的表现

政府行政部门长期对审计市场的有力干预,除了推动审计市场健康发展外,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对缺乏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来说,面对政府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向政府权力靠拢,在选择审计师时也对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存有偏爱,表现出寻租性的审计需求。例如,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是决定企业能否上市的关键部门,发审委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决定企业能否上市的权力,这使其成为一些公司上市寻租的对象。由于第五届以前的发审委委员名单和身份是保密的,拟上市公司要寻租就需先得到名单,因此发审委委员名单竟成为某些部门工作人员谋取暴利的手段^①。从2004年成立第六届发审委起,发审委委员名单和每次参会的委员名单都公开,以便接受社会监督,但从中仍可找到一些寻租的痕迹,甚至体现在审计市场中。从公开的发审委委员名单来看,专职委员较多地来自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这样,那些受聘担任发审委专职委员的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与证监会的监管权力“沾亲带故”了。王兵与辛清泉考察了这种“沾亲带故”的市场影响力。他们以2005年1月至2008年6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证监会发审委担任专职委员,其所在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证券审计市场中的份额就显著增大,并且获得了更多的审计收费。另外,他们还发现审计质量因素并不是一个显著因素^[8]。可见,对打算上市的民营企业来说,会计师事务所的这种“沾亲带故”比其审计质量更有价值。应该说,这种审计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行贿性质,只是比较隐蔽,法律上难以认定罢了。管中窥豹,这些发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寻租性审计需求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审计需求对行政偏好的依赖。

三、对审计需求异化的制度分析

西方的审计需求理论指出,如果各种市场制度设计合理,那么市场总是需要高质量的审计^[9-10]。而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中却存在着审计需求异化现象,高质量审计需求有时或在一定领域里并不是主流,这说明我国的市场制度设计可能存在问题。通过分析和对比,我们认为股权表决制度、企业产权制度以及市场管制制度与我国的审计需求异化密切相关。当然,制度并不是导致审计需求异化的唯一因素,文化背景等非制度因素也可能对审计需求异化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影响审计需求异化的制度因素也可能并不仅限于股权表决制度、企业产权制度、市场监管制度这三项,其他一些制度(如公司治理、市场交易规则、外汇管制等)对审计需求异化也可能有重要影响。我们认为,对审计需求异化的影响来说,制度是“骨”、文化是“肉”,但制度更根本、更关键;在各种制度中上述三项制度又比其他制度更根本、更关键。所以,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这三项制度与审计需求异化的关系。

(一) 股权表决制度与审计需求异化

和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样,鉴于会计信息质量对股东利益的重要性,我国有关法规将上市公司审计师选聘的决定权交由股东大会行使。在股东大会表决审计师选择议案时,无论是掌握经营权的内部股东还是没有经营权的外部股东都有表决权,而且是以普通决议通过。然而,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大股东凭借其大宗股权既掌控了公司实际经营权又掌控了股东大会的审计师选聘权。

^①2004年11月18日,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罪名是向拟发行上市公司出卖发审委会议的委员名单。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1041/22061/3043985.html>。

这样,大股东不但是财务报告的实际提供者,也是审计师选择的实际决策者。按照现行股权表决制度,真正需要审计服务的外部股东往往没有审计师选聘权,这是造成审计需求异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资本多数决”原则与外部股东监督权及审计需求异化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使得公司所有权具有可分散能力,可以筹集更多的权益资本,还在于所有权分散的同时维护了经营权的统一,没有使公司经营政出多门,严重影响公司在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更在于维护经营权统一的同时赋予了外部股东监督权,限制了经营权的滥用,保证了外部股东的公平利益。协调监督权、经营权和所有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使命。而公司治理的根基则是股权表决制度,股权表决制度的缺陷往往从最根本上损害公司治理,损害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当然也损害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诱使审计需求异化。“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基本的股权表决制度,但若在监督权事项中也不加创新地运用,则会损害监督权。如在我国很多“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经营管理者不但具有经营权,还握有比重很大的股权。股东大会对监督事项(如审计委托)的表决仍然实行“资本多数决”原则,经营者就会控制股东大会,实质剥夺了外部股东的监督权,造成公司治理失效,审计需求异化。

所有权的分散与经营权的统一具有矛盾,协调这一矛盾的方法是“资本多数决”原则。“资本多数决”表面上公平、实质上剥夺了中小股东的经营权,将经营权集中在大股东手中,维护了经营权的统一。中小股东们因丧失经营权而成为“外部”股东。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掌握经营权的大股东若不受监督必然胡作非为,必然侵害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因此,要保证中小股东的监督权,监督大股东经营的权力,外部股东就必须具有审计师选聘权。

2. 累计投票制的扭曲与外部股东监督权及审计需求异化

除“资本多数决”原则外,我国还向英美国家学习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和累积投票制度,而且审计师选择的提名权往往交由独立董事负责。但从实际运行来看,即使实行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也很难不受大股东操控,甚至比普通董事更易受大股东操控。

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于2002年1月7日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条规定:上市公司在董事选举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股东大会在董事选举中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上市公司应在公司章程里规定该制度的实施细则。这表达了监管层试图通过推行累积投票制来保护外部股东监督权的良好愿望。但在实践中,这一愿望落空了。究其原因就是上市公司往往通过实施细则规定普通董事和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的选举表决时分别计票。例如某公司共设9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3名,普通董事6名。要确保1名独立董事,需要掌握参会总股份的1/4加1股,而要确保1名普通董事则只需参会股份总数的1/7加1股。可见,中小股东对独立董事的影响能力还不如对普通董事的影响能力大,独立董事更易受大股东的操控。因为分别计票的累积投票制已经决定了独立董事的当选比普通董事的当选要更依赖于大股东。累积投票制的扭曲直接导致了大股东对独立董事的绝对控制,导致了审计师选择权被牢牢地控制在大股东手中,外部股东的监督权被剥夺了,审计需求异化了。

3. 完善股权表决制度纠正审计需求异化的具体思路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实特征,股东大会表决制度不能简单地模仿英美国家,而应大胆创新,以切实保障外部股东的监督权、完善公司治理、消除审计需求异化。具体来说,有保守和激进两套方案可供选择。

保守方案是完善现有的累积投票制度。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董事时,明确规定应将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合并计票,不能再分类分别计票。仍以9人董事会(6名普通董事,3名独立董事)为

例,在选举时不区分普通董事和独立董事,直接统一选举,统一排名。在9名董事产生后,再协商分工,分为独立董事和普通董事。这样,对外部股东来说,要保证在董事会有一名代表,只需控制参会股份的1/10加1股即可,这比分开表决时大大提高了外部股东的影响力。若中小股东的董事代表通过协商分工任独立董事,则能影响审计师选择,纠正审计需求异化现象。当然,不限制内部大股东的表决权,只通过合并计票来完善累积投票者不是一个保证外部股东监督权的绝对方法,只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点“改良”。

激进方案是建立分类股权表决制度(或称经营者股权回避制度)。这是一种比较绝对的制度,即股东自愿分为经营股东(往往是大股东)和监督股东(往往是中小股东),董事也分为经营董事和监督董事^①,经营股东选举经营董事,监督股东选举监督董事。该思路可用图1表示^[11]。

这是一个全新的股权表决制度运行体系,其关键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分类表决制。有关监督董事的决策由监督股东(通常可能是中小股东)单独表决,其他事宜由经营股东(或全体股东、大股东)表决。这样,通过分类表决制,中小股东的监督权才不可能被大股东剥夺,并得以落实,监督董事才可以独立地对大股东进行监督,实质上维护公正原则。公司的董事会是公司的权力核心,对公司的所有重要决策负有责任。董事会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由经营董事组成的经营董事会代表大股东的利益行使经营权,以提高公司的业绩为努力目标;另一个是由监督董事组成的监督董事会(或称审计委员会)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行使监督权,以实现股东间的公平为努力目标。监督董事会监督权的关键是审计权,所以监督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就是行使审计权。审计权具体包括:委托外部审计师审计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报告,如选择审计师、决定审计报酬、监督审计质量等;与经营董事会共同领导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及时获取足够的内部信息,实时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经营董事会由全体经营董事组成,是大股东利益的代表,行使公司的经营权,如选聘总经理、决定重要的经营策略等。经营董事会与监督董事会平行,两者合称“公司董事会”,是公司所有重大决策的核心机构。

(二) 企业产权制度与审计需求异化

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共存是我国当前企业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表现在证券市场上就是既有以各级政府为终极控制人的上市公司,也有以自然人、外资机构、职工持股会等为终极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其中,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等原因,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处于主导地位。两类不同的产权关系体现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干预程度的不同。相对于私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而言,国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与政府关系更为密切,政企难以彻底分开。一方面,企业为政府提供税收,帮助政府解决就业、公共建设等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利用其特殊的权威和信用为企业承担经营风险,解决经营危机,两者存在“荣辱与共”的关系^[12]。产权关系所蕴含的政企关系、风险差异或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影响上市公司对审计的需求,甚至导致审计需求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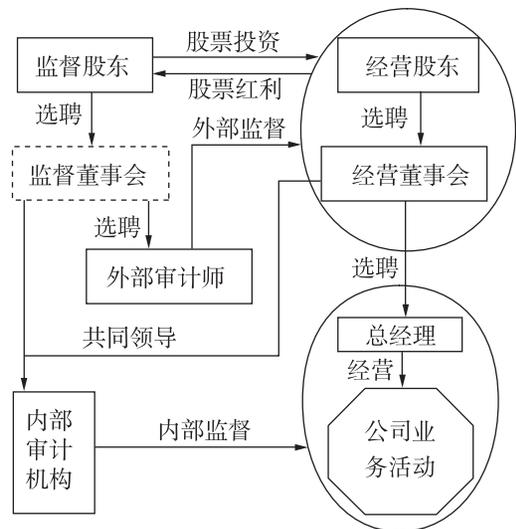


图1 分类股权表决制下的公司治理模式

^①经营董事也可以称为执行董事、内部董事、普通董事,或直接简称董事。监督董事也可称为独立董事、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

1. 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使国有企业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政府政策是由政府官员制定和执行的,而政府官员都是一个个现实的人,关注自身的职业风险,尤其是要避免政治风险。从政府官员的晋升和履职风险看,政府官员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比对非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小,因而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国有企业,以减少履职风险。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和保护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的精神和指示,因此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支持和保护时,即使政府官员的政策效果出现偏差,也可以利用相关文件精神进行解释,这被上级政府追究的可能性小,或者是追究的责任轻。而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就不一样,如果对非国有企业进行支持和保护,政府官员和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接触过于密切,往往容易被外界解读成官商勾结,一旦对非国有企业支持和保护的政策效果出现偏差,他们就很可能被追究和查办。因此,对于一个理性的政府官员来说,对于同样需要发展和支持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说,他更可能选择支持国有企业,以减少履职风险^[12]。政府对国有企业(包括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理解为是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这种“隐性担保”减少了银行的顾虑,当企业出现危机时,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取贷款^[13]。这说明相对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融资优先权。高质量审计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引导投资,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则使高质量审计的这一功能显得不再重要,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2. 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导致有关企业在审计需求上的低质量偏好

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条块分割的特征仍未完全消除。出于维护地方经济形象并提高政绩的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推动当地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上市,他们不惜纵容企业造假或“包装”,甚至为企业出具虚假文件。例如,罗牛山在有关部门为其制作了虚假文件后才取得上市资格;红光实业舞弊案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参与程度也很高。这些“包装”起来的“优秀企业”是经不起高质量审计的,其更需要的是审计师的“配合”,表现出明显的审计需求低质量偏好。为了当地经济的形象和发展,地方政府不仅帮助当地企业争取上市资格,还会帮助当地企业保持上市资格,协助企业保持较高的利润水平等。这些来自政府的“帮助”往往会被理解为对造假的默许,而企业在会计信息方面的造假行为还往往需要得到注册会计师的“配合”,这也导致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

3. 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可能表现为审计需求上的行政依赖

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政府甚至直接任命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使得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对政府的政策倾向更加敏感。我国目前有会计师事务所近 8000 家,政府对这些会计师事务所的态度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各地方政府存在扶持本地会计师事务所的自然冲动,而中央政府也是如此。例如,政府部门先是偏爱本地会计师事务所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再是偏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歧视本地会计师事务所^[14],又再到重视本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等,这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态度,而是采取偏爱与歧视并存的态度^①。针对政府对待不同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态度,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以显示其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即表现出审计需求上的行政依赖。王恩山对我国 2007 年—2009 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师变更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随着政府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战略支持态度的逐步明朗,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比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将审计师选择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15]。这说明企业的产权性质确实影响企业对审计师的选择,国有企业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现象有时也是显著的。

^①当然,这样说可能有些武断。但从会计师事务所的分级管理、中央主抓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各部门纷纷表态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以及各类资格审批时的不同会计师事务所不同对待看,说政府对会计师事务所不是一视同仁的应该也没错。

(三) 市场管制制度与审计需求异化

“上市”是许多公司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它却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我国对资本市场实行相对严格的行政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审计需求的异化。

1. 对新股发行上市的管制与审计需求异化

在我国现行新股发行制度下,一家公司要发行上市,最关键的一环是获得证监会发审委的认可,拿到批文。2010年12月2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在第九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透露^①,目前在审核部门排队的公司就有300多家,保荐机构辅导的公司有500多家。为了能尽早上市,各家拟上市公司可谓费尽心机,选择发审委偏爱的审计师成为其必然选择,即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投资需求逐步增强,但由于外汇管制,投资者难以直接投资国外市场,而国内投资渠道又很有限,因此大量资金囤积于股票市场;再加上证监会对新股发行资格的严格控制,潜在的新股供给能力无法直面新股投资者,“新股不败”曾成为我国股市多年的神话。即使新股发行价格市场化,也会出现“三高现象”^②。面对“新股不败”的神话,投资者对审计需求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就理所当然了。他们抢到新股就能赚钱,至于会计信息真假与审计质量高低都无所谓。

一边是发审委门外拟上市的公司排成长龙,一边是数万亿资金对新股投资如饥似渴,新股发行的“三高”现象正考验着监管部门的新股发行资格管制能力。有没有更好的制度?前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的设想也许值得考虑,即把发行审核权还给市场。他认为,不管是行政审批、核准还是发行审核,都是用静态的眼光来看公司的质量,但并不能保证公司上市后质量的持续性。这个权力(发行审核权)太大了,总有一天政府会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发行审核股票这件事。上市公司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盈亏的区别,甄别的权利在于投资者^③。学习美国实行登记制,在满足较低的基本条件时,只要股票有人买,就可以上市。这也许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注册会计师审计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审计质量可能会更受到投资者关注,审计需求异化也会更少。

2. 对资本市场虚假陈述的惩戒制度与审计需求异化

近年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频频遭到美国投资者的集团诉讼^④，“赴美上市”大有变成“赴美上庭”之趋势^⑤，而被诉的主要原因几乎是清一色的“信息披露违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内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足,这又会影响企业对审计的需求,因为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主要把关者。在国内,尽管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但从近几年的实施效果来看,由于存在四项前置条件^⑥等缺陷,大大降低了法律诉讼对虚假信息披露的威慑力,而且对虚假信息受害者的补偿有限,以致大多数的虚假信息受害者只能理性地选择沉默。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保持理性沉默的投资者自然也对审计师的选择持无所

^①网易财经 <http://money.163.com/10/1202/11/6MT82Q1000254KI0.html>.

^②即同时并存“高市盈率”、“高发行价”与“高超募”。

^③中国经营报 <http://finance.stockstar.com/MS2010103030000524.shtml>.

^④集团诉讼是美国处理大量产生于同一事件的类似诉讼请求的一种独特诉讼程序,指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集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没有预料到损害发生的相关主体也具有适用效力。集团诉讼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一度被称为“美国的法律天才们最具特色的成就”。

^⑤截至2009年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有52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124家,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8家,在场外交易市场上市的有100家。在这284家中国企业中,有25家遭到集体诉讼。2010年3月,弗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目前在美国面对集团诉讼的中国公司大约有16家,多于其他任何一个除美国之外的国家。”

^⑥四项前置条件分别是:(1)只受理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2)只受理在信息披露中进行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案件;(3)不接受集团诉讼;(4)只有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

谓的态度,审计需求因此而异化。

由于法律风险很小,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主要面临行政处罚,但行政处罚不会补偿投资者的损失,最多对上市公司有惩戒作用。当行政处罚严厉时,上市公司的审计需求就表现出行政依赖,以便讨好行政监管当局。当行政处罚不严厉时,上市公司就肆意利用虚假信息侵占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因而倾向于寻找比较配合的审计师,表现出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结果,由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制度不能有效补偿投资者的损失,无论行政处罚是否严厉,审计需求都是异化的,上市公司要么表现出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要么表现出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而投资者则表现出审计需求的无所谓态度。因此,加大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惩戒力度有助于消除审计需求异化。例如,实行集团诉讼制度,扩大可诉范围(即不局限在“已被证券监管部门做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之中)等。当然,等我国的法律惩戒也足够严厉、我国公司也都知道“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时,我们相信去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就不会因信息虚假而成批地“赴美上庭”了。

四、结论

本文首次总结归纳了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中出现的三种审计需求异化现象,并分别分析了我国现行的上市公司股权表决制度、企业产权制度和市场监管制度与审计需求异化现象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审计需求的异化现象在我国资本市场的特定时期或特定范围内显著存在,是高质量审计需求缺乏的表现。需要高质量审计的主体很多,其中外部股东由于承担剩余风险且没有内部消息而对高质量审计最为依赖,审计需求异化对其利益损害也最大。审计需求的低质量偏好意味着对审计质量的逆向需求,它在我国资本市场早期普遍存在,目前仍在特定范围内有所表现。审计需求的无所谓态度表现为对审计质量的漠不关心、审计师选择中关键人员地位的偏低以及对人缘地缘的依赖。审计需求的行政依赖往往表现为一种扭曲的或虚假的高质量审计需求,因为政府行政部门对高质量审计的认定往往与市场(尤其是最具利害关系的外部股东)存在差异。

第二,股权表决中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剥夺了中小股东的监督权,会诱导审计需求的异化。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个普遍特征是一股独大,依照简单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大股东不但掌握公司的经营权,而且实质性控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对审计师的选择只代表大股东(同时也是经营者)的意志,不代表审计真正需求者(外部股东)的意志。大股东既是财务报告的提供者也是审计师的实际选聘人,这使维护审计独立性的审计三角关系被扭曲,诱导审计需求异化。分类表决制度可以有效地弥补“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维护中小股东的监督权,重构审计三角关系,抑制审计需求异化现象。

第三,企业的国有产权性质是导致审计需求异化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决定了国有企业(包括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经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国有企业是审计市场的重要客户。然而,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荣辱与共”却可能引致审计需求异化现象,例如政府的支持与保护使国有企业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可能导致有关企业在审计需求上的低质量偏好;国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可能表现为审计需求上的行政依赖。据此,进一步阻隔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产权联系,让政府更公平地对待各类产权性质的企业,可以抑制审计需求异化现象。

第四,对新股发行资格的管制会诱导审计需求异化。通过实施和完善询价制,我国新股定价机制坚定地迈向了市场化,审计师声誉初步展示出提高发行价格的重要作用,这对消除投资者对审计质量漠不关心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对公司新股发行资格仍实行较为严格的行政管制,巨大的新股供给能力和巨大的新股投资需求无法对接,审计需求既有行政依赖的异化又有质量无所谓的异化。对新股发行资格确认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例如终止审核制,实行登记制)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至少是以后应坚持的改革方向。

第五,对虚假陈述的法律惩戒不足是诱致审计需求异化的重要原因,完善相应的民事诉讼赔偿制度,使投资者获得较多的损害赔偿,可以有效抑制审计需求的异化。对于虚假陈述,行政处罚一般不会对投资者的损失进行补偿,民事赔偿诉讼是投资者主要的损失弥补方式。但是,现行法规由于存在不允许“集团诉讼”等前提,我国投资者依然很难从民事赔偿诉讼中获得足够的补偿。结果,面对虚假陈述,更多的投资者理性地选择了沉默,无论行政处罚是否严厉,审计需求异化都难以避免。实施集团诉讼等法制改革,加大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惩戒力度,将有助于抑制审计需求异化现象。

参考文献:

- [1] Watts R, Zimmerman J. Agency problems, audit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evidence[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2): 613 - 633.
- [2] 李树华. 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3] 林志军, 刘明. 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看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师变更的影响因素[J]. *当代会计评论*, 2008(2): 1 - 24.
- [4] 杜兴强, 郭剑花. 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购买: 一项经验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11): 101 - 106.
- [5] 彭文革, 邱永红. 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N]. *证券市场导报*, 2007 - 02 - 10(4).
- [6] 陈仕华. 审计师的选择: 一个关系嵌入视角[J]. *审计研究*, 2009(1): 58 - 63.
- [7] 朱红军, 夏立军, 陈信元. 转型经济中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研究[J]. *审计研究*, 2004(5): 53 - 62.
- [8] 王兵, 辛清泉. 寻租动机与审计市场需求: 基于民营 IPO 公司的证据[J]. *审计研究*, 2009(3): 74 - 80.
- [9] Volker L, Paul N D. Auditor liability and client acceptance decisio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1): 261 - 285.
- [10] Jan Barton. Who cares about auditor reputation?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5(3): 549 - 586.
- [11] 王恩山. 让外部股东掌握独立审计的委托权[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5): 48 - 51.
- [12] 陈小林. 制度环境与审计独立性: 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 [13] 孙铮, 李增泉, 王景斌. 所有权性质、会计信息与债务契约——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06(10): 100 - 107.
- [14] 徐正刚. 中国审计市场结构研究[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 [15] 王恩山. 审计师变更、政府支持与审计质量——注册会计师行业做大做强战略实施效果检验[J]. *经济经纬*, 2011(1): 30 - 35.

[责任编辑:高 婷]

Audit Demand's Alien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al Reasons in China

LIU Minghui, WANG Enshan

(School of Accounting, Northea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3, China)

Abstract: Audit demand can have an appreciabl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dit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alienation exists in China capital market during the special period in some special domain, which indicates the shortage of high quality audit demand.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alienable phenomena of audit demand —— low quality preference, casual attitude, and dependence on administration —— in China audit market, which signifies the deficiency of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udit. There are some institutional reasons, such as a) majority rule in equity voting; b) intimate conne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 government regulation on IPO, and d) insufficient legal punishment on fals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a) classified voting system; b) property privatization; c) IPO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d) group lawsuit system.

Key Words: audit demand; audit demand's alienation; auditor selection; audit market; institution; equity voting

制度移植视角下的近代政府审计制度检讨

夏 寒, 蒋大鸣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审计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中国近代审计制度并不是本土文明发展的结果, 而是西方审计制度的影响与移植的产物。近代审计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审计初步走上了法制化、专业化的道路, 对保障财政的正常运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整个民国时期, 移植来的审计制度由于受到民主基础薄弱、军阀强权以及配套和投入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并未充分发挥效用。这段历史对当前中国政府审计的发展不失借鉴作用。

[关键词] 近代文明; 政府审计; 制度移植; 近代审计制度; 国家审计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4-0013-08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推翻了我国三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 建立了共和国制度, 同时很多全新的制度开始建立起来。一般来讲, 国家制度变迁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内发生长, 二是制度移植。内发生长是人类长期与一定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制度移植则是指制度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引入、吸收与推广。晚清时期, 西方列强不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 而且提供了一个更加优越的制度模式范例, 这不仅加速了中国传统政治的衰落和崩溃, 也使得近代中国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成为必然^[1]。和民国初期很多制度一样, 近代审计制度并不是中国本土政治文明演进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西方政治制度移植的产物。近代审计制度的建立加速了审计法制化、专业化的发展, 促进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和审计人才的培养, 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 由于民国时期的政治社会环境, 审计制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因而并未能发挥全部效用。

一、审计制度的移植和发展

一般来说, “移植”是指将有机体的一部分组织或器官补在或移入另一机体的缺陷部分, 使缺陷部分逐渐长好。政治学中的制度移植是指制度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推广或引入。制度移植可以是部分移植也可以是全部移植。制度移植是现代制度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 这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差距, 人们往往把先进国家的经济发达与其制度联系起来, 所以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 这种示范效应就是制度移植的重要原因^[2]。

近代中国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建设的滞后, 晚清时期列强的肆无忌惮,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使很多人意识到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历史境遇, 仅仅依靠对原有国家机器进行简单改造是行不通的, 因此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就成为中国制度构建的捷径与必然选择。

就审计制度而言, 中国财政审计监督古已有之。西周时期的官员宰夫、司会已承担了一定的审计

[收稿日期] 2010-10-26

[作者简介] 夏寒(1977—), 女, 江苏江阴人, 南京审计学院国际审计学院副教授, 博士, 从事审计史、经济史研究; 蒋大鸣(1947—), 男, 山东枣庄人, 南京审计学院国际审计学院教授, 从事财政学、税收学、财政史、审计史研究。

职能。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度要求郡县官员每年定期向中央递交记录地方赋税、垦田、人口等内容的上计簿,也包含了一定的审计职能。隋唐时期的比部、北宋的三部勾院、南宋的审计院以及明清时期的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均肩负着监督国家财政的审计职能。不过古代中国的审计机构废置频繁,名称、隶属关系多变,专业化程度较低,审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审计效果的发挥也往往与皇帝本人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近代西方审计制度是民主法制、权力制衡的产物。为了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执行财政预算法案,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审计机关来维护纳税人权益,防范官员贪污腐败与滥用权力。近代西方的审计制度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审计独立性强,审计人员专业化、专职化程度较高。上述两种制度孰优孰劣,泾渭分明。在晚清至民国这一制度大变革时期,西方近代审计制度逐渐被国人接受并移植到中国。

最初,清廷预备立宪时,当时出国考察的礼部尚书戴鸿慈和闽浙总督端方就在《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的奏折中,建议按照普鲁士、日本的政治体制模式设置独立的审计机构。“今宜仿普、日之制,特置会计检查院……凡关于检查会计之事,各地方行政官皆受其监督。”^[3]另一出访大臣杨晟则在《条陈官制大纲折》中指出各国国会有负担财政之责,即有监督财政之权,强调应该设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审计机关^[4]。出使美国、墨西哥等国的张荫桓则在清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陈奏设置责任内阁的奏折中提出“设会计检查院以稽核全国财政,院长由内阁大臣会奏任,但任职以后独立行事,不受内阁管辖。”^[5]尽管清末成立审计院的设想并未实现,但足以说明当时西方的审计思想已经被一些有识之士所接受。

1911年辛亥革命一爆发,审计制度就在一些宣布独立的省份有了具体的实践,如湖南设立了会计检察院,广东设立了核计院,湖北、江西设立了审计厅等。这些地方审计机构的设置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其目的均是为了对地方的财政收支进行监督。这为后来地方审计机关的建立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财政困难,需向列强银行团借款。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审计机关,列强银行团要求中国成立一个有洋人参与并有实权的审计机关,由洋人监督中国借款使用情况^[6]。面对如此苛刻的政治条件,1912年9月袁世凯急令国务院设立审计处,隶属于国务院总理,掌管全国会计监督事务,地方各省则设立审计分处,同时对外正式宣告中国政府审计机关建立。可以说,当时中央审计机关是在列强银行团的压力之下建立的,但是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是西方近代审计制度的存在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政府审计机关的成立。审计处(后改称审计院)初建时为59人,其中留学归国的就达到了19人^[7]。审计机构中较多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必然有助于当时人们对外国审计制度的了解,也有助于中国最初政府审计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审计机构成立后,与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也提上日程。审计院专门聘请了宝道、葛诺发等外国专家参与中国审计法律法规的修订,在宝道等人撰写的关于审计院法草案第一次意见书中,卷首便是“审计院法草案根据他国成例采事后监督制度”。该意见书还附上了法国、俄国核准状格式^[8]。1914年,审计制度被载入了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约法》,该法规定:“国家岁入岁出之决算,每年需经由审计院审定。”同年《审计院编制法》、《审计法》颁布,规定审计院直隶于大总统,各省不设审计分院。此后,《审计法实施细则》、《审计院办事细则》等一系列审计细则也陆续出台。有学者粗略统计,北京政府时期审计院颁布了30多个审计规章制度^[9]。这一现象的出现大体因为有“他国成例”可借鉴,故而短期内审计的法规建设颇有成效。

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部门隶属于五院之一的监察院。审计、监察合二为一,是中国政治的传统,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移植来的审计制度有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不过,北京政府1914年颁布的《审计法》和国民政府1925年、1928年颁布的《审计法》的内容大致相同^[10],这表明国民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大致继承了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1928年至1937年,我国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审计制度的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一进展可以从1938年修订的《审计法》上体现出来。

1938年《审计法》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立法,而且和当时的审计实践密切相关,如1933年起审计部下分设三厅,分别负责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查事宜。1938年《审计法》则分为四章,除去第一章总则之外,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针对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查制定了细致的规定,同时审计的职责范围扩大,执法力度加强,除了注重财政收支的合法性之外,还关注财政支出的合理性和效益性。1938年的《审计法》沿用时间相当长,直到1972年台湾才对其进行了修改。可以说,这样一部相对完善的《审计法》的修订,说明了当时政府审计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二、近代政府审计制度实施后的效用

基于西方审计制度的示范性作用,在疾风骤雨的革命之后,审计制度被移植到了中国。这一制度构建的捷径,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使得中国审计制度短期内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民国的政治建设中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一) 近代政府审计初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

中国古代官厅审计机构隶属关系多变,专职化程度较低,与审计相关的规范也散见于各种律令中,未形成体系。与古代官厅审计不同的是,近代政府审计制度一开始就写入了国家宪法,之后陆续颁布的《审计法》、《审计法实施细则》、《审计条例》以及《审计院编制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了审计机关的责任与权利、隶属关系和人员编制以及审计工作的内容和程序。可以说,近代政府审计一开始就注重法制化的原则,审计法律法规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系,这使得审计工作有法可依。

除此之外,为了便于审计工作的展开,审计部门还出台了一系列对官厅簿记、计算书表和凭证单据等方面的格式规范,如审计处设立之初就拟订各种官厅簿记之规则、格式及说明书之类,呈请颁布实施。1914年审计院颁布了《修订普通官厅用簿记》,要求各级会计官吏必须按照程式,切实遵行^[11]。审计部门内部也相继制定了各类报告文书的格式,统一了审计报告和文书的形式。审计工作由此也初步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二) 近代政府审计对维护财政正常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的审计制度对监督政府的财政收支和预算决算的执行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民国时期战乱不断,政府时常面临财政困窘的局面,而审计制度的实施则利于政府增收节支,维持最基本的财政开支,确保各级政府机制的运转。例如北京政府在编制民国二年年度预算时,通过审计,陆军军费从1.6亿元减至1.1亿元,海军军费从1011万元减至897万元。再如1931年至1937年,审计部审计支付文件53673件,各机关送审的支付计算书总金额为107682万元,其中核准103507万元,因不合法或不合手续剔除的金额为853万元^[12]。

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时候,审计所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例如南方革命政府和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审计对确保战时经费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国民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13]。审计制度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支的透明度,防止了财政收支的暗箱操作,使政府的运作机制初步走上了近代化轨道。另外,审计还揭露了数以百计的官员贪污舞弊和渎职犯罪案件,如1947年上海金融风潮中的中央银行职员渎职贪污案、1948年山东盐务局局长的贪污渎职案等^[14]。审计对这些案件的揭发,对加强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近代政府审计推动了审计人员的专业化,促进了审计人才的培养

民国时期对审计人员的专业和学历有着严格的要求,如1914年《审计院编制法》规定审计官、协审官必须工作3年且卓有政绩,或者在专门以上学校学习政治、经济3年以上毕业。1929年的《审计部组织法》则规定审计和协审须由在国内外大学或专门学校学习政治学、经济学3年以上毕业,并对财政学或会计学有精深研究的人担任。上述规定保证了当时审计人员的基本素质,这使得近代审计

制度实施之初审计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较古代审计有了很大的提高。有数据统计显示,1946年底国民政府审计部的职员和工勤人员达435人,其中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有218人,占50.11%^[15]。由此可见,当时审计人员的专业化已达到较高水平。

另外,审计制度建立之初,近代审计学刚刚传入中国,为了迅速培养大批审计人才,审计部门开办了审计讲习所,制定《审计讲习所章程》,向审计人员以及机关财会人员教授审计法规、各国审计制度、簿记学、会计学等。这不仅普及了审计学常识,而且也培养了不少审计人才。

随着中央和地方审计机关的相继成立以及民间审计的发展,教育部门也开始关注审计人才的培养。中央计政学院专门设置了审计班,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具有大学毕业资格在政府机关任职者,学生毕业后根据其能力分配到政府部门担任计政工作^[16]。民国时期一般大学的会计系、经济学系、商科系以及其他管理学科系也都开设会计和审计的课程,如南开大学的会计系主干课为六门,审计学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社会审计教育在当时也较为常见,如上海的各类会计师事务所纷纷采用兴办会计学校和举办培训班的方式来培养审计人才,潘序伦先生开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就专门培养五年制和二年制学历的会计和审计人才。

在上述各种方式培养的审计人才中,很多人都积极投身于政府审计工作,并参与近代的审计组织和审计法制的建设,为加强民国审计监督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有些人则成为专门研究政府审计制度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的审计专家杨汝梅对近代各国政府审计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审计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7]。

三、制约近代政府审计制度发展的因素

从遗传学和生物学理论来讲,移植要获得成功,受体必须对移植的器官(或组织)克服异体排斥反应,使移植体最终和受体有机地融为一体。政治学领域的制度移植原理也类似,制度移植的成功取决于接受移植的国家和地区原有的体制和环境是否能和移植的制度有机融合。审计制度移植到近代中国后,虽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作为一项从西方民主体制中移植来的政治制度,在近代中国却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它的成长与发展受到较多因素的制约。

(一) 制约之一——真正民主难以实现

近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审计大都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产生,基于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司法部门和立法部门对政府行使包括财政监督在内的监督权。从更深层次上来看,西方政府审计制度还建立在受托责任的基础上。根据民主制原则,所有政府机构和官员均是受人民的委托对公共资金和资源进行管理,他们应该受到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度的约束。审计就是监督受托责任的一种体现,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促进公共资金的公开公平,并保障公民基本权力的行使。可以说,近代民主政治的孕育推动了现代国家审计的诞生^[18]。

然而近代中国的民主基础却相当薄弱。美国学者达尔在其《论民主》一书中曾高度概括了实现民主的关键条件,即军队和警察控制在选举产生的官员手里,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不存在强大的敌视民主的外部势力^[19]。反观民国时期的政治,这三点关键条件均不能满足。

首先,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当政后解散国会、攻击异己,不仅把民主破坏殆尽,甚至还当了100多天的专制皇帝。袁世凯去世以后,北京政府内部斗争不断,各种军阀势力此消彼长,中央和地方关系错综复杂,中国社会长期不稳定。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国民党作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设立了五院制,但国民党以党治国,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仍然没有民主可言。1931年通过的《训政约法》更是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可以说,在整个民国时期,军事力量始终决定着政治话语权,政治权力则缺乏制约,尽管国民党三番五次地制宪、修宪、开国会,也都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民主选举往往沦为政治丑剧。

其次,民主信念和政治文化难以形成。中国数千年来一直习惯于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民众普遍缺乏独立、自由、人人平等的理念。以忠孝为价值核心的传统文化一直诱导普通民众扮演安分守己的顺民角色。辛亥革命爆发后,尽管帝制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但是当时的人们往往“视共和与帝制无甚区别,且时以帝制之观念解释共和,视总统为君主”^[20],可见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民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教育普及程度低,普通民众很少有纳税人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也缺乏审计制度所需要的民众对公共经济权力进行监督的意识。

最后,当时中国正处在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欺压和控制之下,诸多强大的外部敌对势力极大地禁锢了中国民主环境的培育。西方列强在中国扶持各路军阀势力,争夺各自利益,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不稳定,更有甚者如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始终未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近代西方的审计制度移植到中国后,由于缺乏真正民主的土壤,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没有保障,审计的效用也很难完全发挥。

(二) 制约之二——政局不稳,政令难行

近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一直处在不稳定状态,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不足,地方军阀往往各自为政,拥兵自重。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而混战不断,其结果就是中央政令不出都门,地方军阀在自己辖区内政由己出,随意设置税务征收机关开征各种税收,截留中央税款是常事。据统计,1916年至1927年地方政府共截留划归国税的盐税3亿多元^[21]。这种财力分散的局面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导致北京政府时期中央财政资金严重匮乏,财政规章制度就是一纸空文。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形式上实现了政权的统一,但是党内派别林立,大多数省份还是控制在实力派军阀手中。尽管当时已经有了具体的财政法规,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广西、云南等省的地方军阀经常消极抵制国税的划分,山东省更是在1931年至1932年以军饷无着落为由直接接管该省的国税机关,截留中央税收以充军饷^[22]。抗战爆发后,很多地方陆续成为沦陷区,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大受影响,审计机构也不得不随着不断搬迁。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以监督财政收支为主的审计机构必然处处受限,其在地方诸省审计举步维艰,同时财政资金的匮乏和缺乏规范也直接制约了中央政府审计的监督。

(三) 制约之三——军阀强权的直接干扰

民国时期,审计实施的过程时常要受军阀强权的干扰。如1914年颁布的《审计条例》,开头第一条就规定“政府机密费”不在审计之列。同年颁布的《审计法》更扩大到“大总统、副总统岁费、暨政府机密费”不得审计。另有文献称“海陆军凭势压人,自非院所敢挑剔。北洋派以军警组成,内务部长非有统率北警者不能任也。故内务部经费偶有出入,亦不敢苛求。”^[23]

国民政府时期,长期操纵国家财政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四行联合总办事处常常借口各行局与一般公务机关性质不甚相同而拒绝审计,同样国防部和陆军总部也经常以财务制度尚未制定为由一再拒绝对其进行审计^[24]。再如1932年蒋介石为了围剿中共苏区随意更改预算,将巨款拨付给南昌行营做军费,当时审计部部长茹欲立表示反对后,蒋介石大发雷霆,茹欲立被迫去上海躲避^[25]。由此可见,尽管当时的审计有法可依,但在实行过程中屡受军阀强权干扰,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

(四) 制约之四——与审计相关的制度不完善

就西方政府审计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审计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合方可达到监督政府财政的目的。然而民国时期与审计相关的预决算制度、公库管理制度以及财务行政系统的不完善都影响了审计的发展。

民国建立之初,北京政府虽颁布了预决算制度,但由于政府机构变更频繁、军费开支膨胀、地方截留中央专款的现象加剧,统一的国家预算仅在最初几年编制,至1920年便已中断。决算制度则由于

编制的具体方案并未落实,制度规定也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政预算常常不能按期编制,即便由主计处编制了预算,也常因入不敷出而不能实施。1937年《预算法》颁布,但不久抗战爆发,军费日增,通货膨胀,国家预算只得不断调整变更。至于颁布的决算章程同预算章程一样不成熟,实行中又流于形式^[26]。故有审计官感叹:“目前审核支付命令之最大困难尤莫如预算不完全。预算为国家一切收支之标准,预算不完全则全国收支状况无从总核比较,欲于此时执行完密的事前监督,尤感无穷困难”^[27]。

国库制度不完备也是制约政府审计发展的因素之一。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了中央银行,但当时国库制度很不完善,并非所有支付命令事先都经审计部门审核,如国民政府财政部所签发的军费支付命令有“直字”、“坐字”、“拨字”三种,除“直字”支付命令须先经审计部核签方能拨款外,所有“坐字”、“拨字”的支付命令大多可以先行用款,后再根据抵解手续填发支付命令。这就违背了《审计法》第三条“凡未经审计机关核准之支付命令,国库不得付款”的规定^[28]。另外,一些征税机关还存在自行保管税款、坐支抵解、不经过国库收支的情况,审计机关对此也难以监督。加之由于军阀割据和战争等因素,中央财政部门虽制定了各种收支方案,但是由于受到地方统治者的消极抵制,收支方案多未切实执行,以至于中央财政部门难以控制地方财政,这些情况均造成了政府审计发展的瓶颈。

(五) 制约之五——审计机构人员和经费有限

任何一项政治制度都有必要的成本。虽然制度移植可以减轻制度设计成本,但是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还需要运行成本,以保证其正常运行。然而中国近代政府审计机构创立之初,由于财政的困境以及对审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政府在审计方面投入严重短缺,致使审计部门经常处于经费和人员匮乏的困境,无法全面有效地进行审计。如北京政府审计院经费经常缺乏,当时审计人员的生活、工作环境非常艰难。时任审计院院长的庄蕴宽曾提及:“审计固闲曹……往往累月不名一文。所幸僚属咸体院长情况,不加苛索。间有所得,发给奉食,亦自厮养,办事员至科员、科长按成递配,往往至本人一无所获。”^[29]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经费和人员的不足仍然困扰着审计部门。从1928年到1935年,伴随着国家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审计部门的业务量也随之增加,审计人员从190人增加到303人。有学者统计审计机关经费和国家岁出总预算数之间的比例不仅未能同比增加,反而出现同比下降的趋势^[30]。加之国民政府机构庞杂臃肿,外加数百万军队,仅凭审计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全部审计。审计工作大都只能如蜻蜓点水般走过场而已,或者是抽审几个单位,以点带面。另外,由于审计部门的待遇相对较低,不能吸引优秀人才,导致各审计部门严重缺编,不得不以大量的雇员临时补充。1944年贵州审计处雇员比重高达66%以上,广西审计处的雇员也占55.18%^[31]。可以想像,民国时期审计机关人员和经费的不足不仅严重影响了审计工作的开展,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审计的质量。

四、结论

近代西方审计制度因其示范性的效应而被移植到中国,但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审计制度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整个民国时期吏治腐败,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何以会如此?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对制度移植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学者们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部分,正式制度是指某些人或组织自觉和有意识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规则;非正式制度是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如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是外生的,非正式制度是内生的。一项正式制度被移植到另外的国家和地区之后,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才能够生根发芽,行之有效^[32],然而一项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是异常缓慢的,只能通过习惯、教育和经验习得,而不能依靠政治行动由上而下强加于社会。只有非正式制度被大多数人认可,移植来的制度才能真正发挥相应的功效。

近代政府审计制度是西方民主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审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基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保证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民众对公共资金管理透明度的强烈诉求确保了审计制度高效运行。而当近代审计制度移植到近代中国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审计机构都建立起来了,相应的审计法律法规也制定了不少,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却无法让审计制度有效运行,民主基础薄弱、社会不稳定、军阀割据、配套制度的不完善、投入不足等种种因素导致审计效用难以完全发挥。从更深层次来讲,民国时期移植的审计制度只是移植了西方近代审计的细则,如设立审计机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即新制度主义所谓的正式制度。近代西方审计制度原则性的东西,如权力制衡的观念、民主的思想、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撑、民众对受托经济责任的理解,即新制度主义所谓的非正式制度却很难在短时间内真正移植过来。由于缺乏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民国时期移植来的审计制度必然难以有效运行。

历史证明,制度移植必须考虑到本国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传统。如果制度移入国和制度移出国的社会环境比较一致,那么制度移植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两者的社会环境不一致,基于非正式制度移植的难度远远大于正式制度,那么短时间内制度移植的结果则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因此,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相对落后国家必须结合本国的现实环境,超越简单的制度移植,在借鉴别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制度。这可能会比简单的制度移植付出更多的制度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本民族的主动性,实现制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度移植了苏联的审计监察制度,最后证明这样的制度移植同样是低效的。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经济监督的需要,1983年我国重新确立政府审计制度,尽管此次审计制度的设计从理念上来讲仍然受到西方审计制度的影响,但是它更多地考虑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审计制度。1983年之后的20多年里,政府审计制度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在不断地调整。今天政府审计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对政府审计工作也越来越认可,这是由于我国审计制度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的结果。

借鉴近代审计的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对国家审计制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民主的实践和权力的制衡对确保审计制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样必不可少;同时审计制度效用的发挥还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和对审计制度本身的投入。这些对我们今后的审计制度的发展都不无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章兴鸣.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移植的必然性分析[J]. 云南社会科学,2003(5):83-86.
- [2]卢现祥,朱巧玲. 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及其绩效问题[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18-22.
- [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90:373-374.
- [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90:402.
- [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90:551.
- [6]李金华. 中国审计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14.
- [7]李金华. 中国审计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16.
-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北洋政府审计院外籍顾问宝道等改革中国审计制度的建议[J]民国档案,1994(1):3-17.
- [9]方宝璋. 中国审计史稿[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388.
- [10]李金华. 中国审计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 [11]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公报第36册[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14:259-260.
- [12]李金华. 中国审计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29,100.
- [13]史全生. 略论民国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J]. 民国档案,2003(1):115-120.

- [14]李金华. 中国审计史:第二卷[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200.
- [15]审计部及所属各处员役奉薪工饷数查报表[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监察院档案,1947:4-8.
- [16]郑忠. 民国政府时期审计教育述评[J]. 民国档案,2003(1):132-143.
- [17]杨汝梅. 近代各国审计制度[M]. 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1.
- [18]文硕. 民主政治与现代国家审计[J]. 审计理论与实践,1988(12):16-18.
- [19]达尔. 论民主[M]. 李柏光,林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5.
- [20]方溯泉. 少年中国之社会观[J]. 东方杂志,1914(10):8.
- [21]丁长清. 民国盐务史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16.
- [22]朱红琼. 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及其变迁[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80-181.
- [23]邱沃仲子. 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审计院[M]. 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公司,1922.
- [24]许祖烈. 中国现行审计制度[M]. 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146.
- [25]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省志·审计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396.
- [26]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册[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453.
- [27]王培驥. 中国事前审计制度[M]. 南京:南京正中书局,1936:44.
- [28]鄢定友.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军费审计评述[J]. 广西社会科学,2002(5):213-216.
- [29]卞孝萱,唐文权. 辛亥人物碑传集[M]. 北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458-462.
- [30]鄢定友. 南京国民政府审计机制软化的原因管窥[J]. 沧桑,2005(1):15-17.
- [31]视察西南各省审计工作报告:上[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审计部档案,1944.
- [32]唐斌. 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移植思想研究[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9(9):10-13.
- [责任编辑:高 婷]

A Criticism on the Government Audit System in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View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XIA Han, JIANG Dam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The audit system in modern China was not the result derived from local political culture, but on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ransplant of western audit system.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audit system made some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leg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audit on the part of an institution, and functioned as an active role in guaranteeing the national finance, but they are limit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weak basis of democrac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warlords' power politics and many other constraints, and the effect of audit system was greatly reduced. This history gives us an inspiration on the current audit system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modern civilization; government audit;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modern audit system; government auditing

机会主义倾向、经营风险与审计质量

陈良华¹, 冯文滔², 陈吉凤¹

(1.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2. 厦门大学 会计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以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分析审计行为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审计意见的作用机制,采用深交所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经营风险越小的上市公司越容易获得清洁的审计意见。原本应该反映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质量的审计意见似乎成了财务业绩评价的标准,这说明审计行为中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在方法上引入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可以拓展审计研究的思路,并在理论上进一步升华我们对于审计行为的认识。

[关键词]审计质量;机会主义倾向;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经营风险;审计师变更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4-0021-08

一、引言

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端于 DeAngelo(迪安杰洛)等人相继提出的审计质量检验两步法,即先求出审计师有能力发现财务报告问题的概率,后求出审计师如实报告所发现问题的概率,再用二者的联合概率表示审计质量的高低^[1-2]。此后,关于审计质量的实证研究不约而同地遵循了“审计师变更-审计意见改善”的路径,也就是将公司企图购买审计意见的行为看做变更审计师的原因,进而成为评价审计质量的主要解释变量。遗憾的是,陆正飞等均没有发现显著的经验证据,理论和实务出现了第一次“脱线”^[3-7]。在第二阶段,学者们开始对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反思。一方面,Lennox(伦诺克斯)在方法上引入概率的思想,希望改良前人的研究思路。这在表面上似乎解决了估计方法的问题,但是理论上却仍然死守“审计师变更-审计意见改善”的路子不放^[8]。另一方面,Krishnan(克里舍南)提出了审计质量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即“审计稳健-审计师变更-审计意见改善”。人们此时才开始将研究主体从公司拓展到审计行为本身,并开始关注审计行为特征对审计意见质量的影响^[9]。令人惋惜的是,克里舍南的研究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审计行为对审计意见的作用机制,他还是认为公司更换审计师的原因是公司希望遇上一个不那么稳健的审计师。以上思路会面对这样的矛盾:后一任审计师在面对前一任保守的审计意见时可能更加稳健,公司应该频繁地更换审计师,直到结果满意为止。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常见,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理论无法解释现象的矛盾之中,理论和实务出现了第二次“脱线”。国内学者也开始涉及以上问题。吴联生和刘慧龙对国内审计实证研究进行了一次批判性的回顾,其中就审计师变更与审计意见改善在统计上不显著的原因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审计师变更的原因是不确定的^[10]。

[收稿日期]2010-11-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0872106);江苏省社科基金资助重点项目(09GLA001)

[作者简介]陈良华(1963—),男,浙江绍兴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管理会计及企业财务管理研究;冯文滔(1984—),男,四川泸州人,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与审计理论研究;陈吉凤(1970—),女,江苏海安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资本市场会计与审计理论研究。

鉴于此,无论是“概率说”还是“稳健说”,都关注公司行为对审计稳健行为的反应,却没有进一步探讨审计行为本身,这导致理论与实务的两次“脱线”。为什么我们没有进一步研究审计行为本身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以往的研究都忽略了审计行为对审计意见影响机制的分析,从而不能在审计行为和审计意见之间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进而不能对审计质量做出全面的评价,这导致理论和实务的脱节。本文力图解决一个长期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市场中的审计行为对审计意见有什么影响?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出发,采用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成果——“前景理论”,就审计行为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以期在方法上拓展审计研究的思路,在理论上深化我们对审计行为的认识。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审计行为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经营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往往被出具保守的审计意见,经营风险较低的上市公司则更可能获得清洁的审计意见。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分析审计行为对审计意见影响的作用机制,第三、四部分将进行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将就本文的研究结论做一些探讨。

二、机会主义倾向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分析

以往的审计研究文献或多或少地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影响,人们追求绝对财富的原动力是相对财富的差异。针对这一问题,Tversky(特韦尔斯基)等在总结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前景理论”和新的价值函数,提出了关于一个人效用的衡量不是“最终财富”的多少,而是“财富变化的多少”的观点^[1]。

借鉴“前景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分析投资者行为时,我们从成本视角(包括审计行为中的风险规避和投资者诉讼两个方面)入手,引入投资者作为“有限理性人”的效用函数:

$$U(x_1, p; x_2, q) = \pi(p) \cdot v(x_1) + \pi(q) \cdot v(x_2) \quad (1)$$

$$U(x_1, p; x_2, q) = p \cdot v(x_1) + q \cdot v(x_2) \quad (2)$$

为了对比,(2)式代表传统的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函数。(1)式这一效用函数的主要特点是纳入了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即确定效应、镜像效应和隔离效应^①。假定在初始状态下, x_i 表示收益, $-x_i$ 表示损失, $v(0) = 0, \pi(0) = 0, \pi(1) = 1, p + q = 1$ 。其中, $v(x_i)$ 表示投资者的价值函数, $\pi(p)$ 表示权重函数。纳入“认知偏差”的投资者效用函数主要有两点新的变化。

第一,在传统效用函数中引入了权重函数 $\pi(p)$,这使得投资者会低估不确定事件的价值,高估确定事件的价值。

第二,投资者的价值函数发生了变化。在纳入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后,投资者的价值取向不再是“单域”的,而是呈现“双域”的,如下页图1所示。当股市出现“熊市”时,投资者面临投资损失,此时的效用函数是凸的,即投资者有较强的风险偏好,愿意投资那些经营风险大的公司;当股市出现“牛市”的时候,效用函数是凹的,即投资者抱有风险厌恶的态度,希望“稳中求胜”。这两点看似矛盾,其实反映了权变的思想,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人们往往会改变原来的偏好取向。实际投资决策中,投资者处于良好的投资环境时,投资反而显得很谨慎,并力求收益的实现;但是,当投资者已经面临损失时,他反而会冒险一搏,投资高风险的公司。也就是说,当面临损失时,价值函数呈现比较陡峭的曲线趋势,人们对损失的变化也更为敏感。

我们将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分为高(H)和低(L)两种情况,并假设两种情况等概率出现。为避免歧义,我们用高(H)经营风险表示公司价值的降低,用低(L)经营风险表示公司价值的上升。投资者的决策只有两种:投资(Y)和不投资(N)。审计意见分为清洁意见(C)和非清洁意见(U),清洁审

^①确定效应是指收益确定时,人们会高估其价值;镜像效应是指在正的收益时,人们呈现风险厌恶,在负的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偏好;隔离效应是指人们在多阶段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前一阶段的影响,即条件概率失效。

计意见表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其他所有类型的审计意见归为非清洁审计意见。其中,投资者遭受损失的成本为 ΔV , 审计的诉讼成本为 Δv 。

由此可以得出投资者和审计意见之间存在一个 2×4 的得益矩阵,如图 2 所示, L 和 H 作为下标分别表示低经营风险和高经营风险的情况, A 代表审计师, T 代表投资者, C 表示清洁的审计意见, U 表示非清洁的审计意见, Y 表示投资者实施了投资行为, N 表示投资者没有实施投资行为。 a 、 b 、 c 、 d 表示投资者在不同的风险和审计意见下的得益情况。其中, a_L 表示出具了清洁意见,而投资者也做出了投资该公司的决策,此后公司价值确实上升,投资者获得收益,以此类推其他得益的经济含义。在 8 种得益中,我们需要关注的其实不是所有的得益,而是投资者可能起诉的情况。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a_L 、 b_L 、 c_H 和 d_H 表示无论审计意见如何,投资者都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没有遭受损失,投资者起诉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c_L 和 b_H 表示投资者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导致了损失或者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但是投资者很难提起诉讼^①。最后, d_L 和 a_H 表示投资者有机会就自己的投资损失提起诉讼,因为 a_H 表明出具了清洁意见,投资者进行了投资,但是倘若公司未来的实际业绩呈现下降趋势,投资者就会遭受实际财富减少的损失;而 d_L 表示当公司被出具非清洁审计意见后,倘若公司未来业绩上升,投资者会因为没有投资而没有得到更多的财富。由此可见,无论是 d_L 还是 a_H 的情况,投资者都可以就此发难,审计师就会面对相应的诉讼成本 Δv (审计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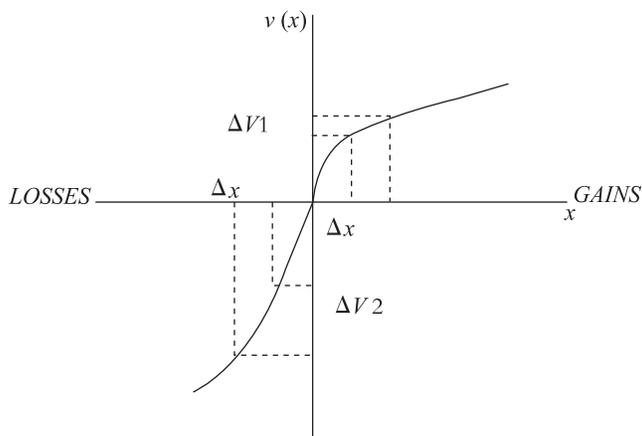


图 1 投资者价值函数

我们再比较 d_L 和 a_H 的大小。根据图 1 所示的投资者效用函数,同样增量的损失带来的效用降低会远远大于收益的减少,因此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更可能提起诉讼。那么,根据“前景理论”,前者的效用减少远远大于后者。如图 1 所示,当 Δx 相同时,显然 ΔV_2 大于 ΔV_1 , 并且投资者的损失必然需要进行补偿,因此审计师需要承担诉讼成本 Δv_i , 但是 ΔV_i 与 Δv_i 一般不相等, ΔV_i 大于 Δv_i 。投资者的损失并不全由审计师独自承担,二者应该是正比例关系,因而 $\Delta v_2 > \Delta v_1$ 。显然,审计师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诉讼成本,审计行为中必然体现为:对高经营风险的公司出具非清洁意见,对低经营风险的公司出具清洁意见。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营风险越小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清洁的审计意见。

		A			
		C_L	U_L	C_H	U_H
T	Y	a_L	b_L	a_H	b_H
	N	c_L	d_L	c_H	d_H

图 2 得益矩阵

三、样本筛选与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的观测样本为深交所 A 股上市公司,时间的选取为 1999 年至 2006 年。观测样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 (CCER),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再筛选:剔除了数据不全的观测值,例如公司行业类型未分类、最终控制人类型未分类、会计师事务所未分类等;剔除了当年交易状态异常的公司,例如 ST、PT 的公司;剔除了相关财务指标异常的观测值,例如速动比例、总资产周转率小于 0

^①这可以理解审计师出具了清洁意见,说明公司至少在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上没有问题,投资者如果不去投资,公司的股价又上升了,投资者当然无法归罪于审计师;同样的,审计师出具了非清洁意见,说明公司至少在财务报告信息上是有问题的,投资者需要谨慎,投资者如果还是要投资,也无法归罪于审计师。

等;剔除了金融保险业的观测值。最终,我们筛选出 3386 个观测值。

(一) 样本行业特征

我们将所有样本按照 1998 年《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中的产业进行分类。从表 1 可以看出,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比例最大的产业是采掘业,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比例最小的产业是综合类产业,极值相差 12 个百分点。采掘业主要经营的是石油、矿石和煤炭等矿产资源,近年来由于此类资源的供求不均衡,这些企业的销售业绩呈现飙升的趋势,这说明清洁审计意见可能偏爱此类业绩好的企业。我们进一步发现样本中的采掘业全部是国有企业,清洁审计意见比例位列第二的水电煤产业也全是国有企业,由此可见国有上市公司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较大。

表 1 产业特征分析

产业代码	产业名称	观测值数量(个)	样本比例(%)	清洁审计意见观测值(个)	产业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77	2.01	68	88.31
B	采掘业	61	1.74	59	96.72
C	制造业	2040	56.62	1917	93.97
D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9	3.93	133	95.68
E	建筑业	51	1.33	45	88.24
F	交通运输业	106	2.89	98	92.45
G	信息技术业	169	4.34	147	86.98
H	批发零售业	219	6.00	203	92.69
J	房地产业	142	3.96	134	94.37
K	社会服务业	134	3.63	123	91.79
L	传播与文化产业	28	0.74	25	89.29
M	综合类	220	5.46	185	84.09
合计	共计 12 个大类产业	3386	92.65	3137	-

注:“样本比例”指各个产业被出具了清洁审计意见的观测值占总体样本的比例;“产业比例”指各个产业被出具了清洁审计意见的观测值占本行业样本的比例。

(二) 经营风险的衡量与自变量设计

阿伦斯和洛贝克对于经营风险的定义:“企业由于经济或营业条件,如经济萧条、决策失误或同行业之间意想不到的竞争等,而无力归还借款或无法达到投资人期望的风险。”^[12] 秦荣生也指出,企业的经营风险与企业的持续经营基本假设存在密切的关系^[13]。可见,经营风险可以理解为企业将面临存量或流量破产的风险,无法满足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而制度变迁、行业风险等经营风险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减弱。公司经营风险可以划分为市场的系统风险和公司自身的经营风险,前者是系统风险,后者是公司偶然风险。本文主要考察审计对公司自身经营风险与审计失败之间的权衡,我们主要以公司自身的经营风险作为研究的自变量。公司自身的经营风险一般可以将“会计持续经营”假设作为前提条件,即在持续经营假设下,倘若公司出现资不抵债或者现金流无法维系的问题,公司无法持续经营下去,这说明公司存在严重的经营风险。进一步而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主要体现为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体现投资者的资产保值增值情况,利润很低甚至为负的公司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必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偿债能力主要体现债权人的权益,如果公司资不抵债,公司实际上便存在结构性破产的风险;营运能力是公司经营效率的体现,良好的经营效率往往可以抵消盈利能力弱、偿债能力不足的风险。上述能力可以通过公司的财务指标进行反映,也就是说倘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显示该公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就说明该上市公司具有较好的持续经营能力,从而公司的经营风险较小。同时,为了控制系统风险的影响,我们引入时间和行业作为固定效应控制变量。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本文以财务指标作为经营风险的替代变量,从基本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

和营运能力三大类财务指标入手设计变量(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因变量	Y	审计意见类型	凡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 Y = 1; 出具其他审计意见类型时, Y = 0
	ROA	总资产报酬率分类变量	息税前利润与当年平均总资产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对应三个分位区域, 分别取 ROA = 1, 2, 3
	ROE	权益报酬率分类变量	净利润与股东权益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对应三个分位区域, 分别取 ROE = 1, 2, 3
	QR	速动比率分类变量	流动资产扣除存货以后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落在中间区域取 QR = 1, 其他取 0
	OCFR	经营现金流比率分类变量	经营性现金流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落在中间区域取 OCFR = 1, 其他取 0
	自变量	DR	资产负债率分类变量
TAT		总资产周转率分类变量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对应三个分位区域, 分别取 TAT = 1, 2, 3
IT		存货周转率分类变量	主营业务成本与当年平均存货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对应三个分位区域, 分别取 IT = 1, 2, 3
ART		应收账款周转率分类变量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与平均应收账款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对应三个分位区域, 分别取 ART = 1, 2, 3
FAT		固定资产周转率分类变量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与平均固定资产的比值, 分类以后指标对应三个分位区域, 分别取 FAT = 1, 2, 3
控制变量		SOE	是否国有企业
	BIG4	是否“四大”	哑元变量, “四大” BIG4 = 1, 否则 BIG4 = 0
	YEAR	时间效应	哑元变量, YEAR _i = 1 或 0, i = 1, 2, ..., 8
	IND	行业效应	哑元变量, IND _i = 1 或 0, i = 1, 2, ..., 11

以往的研究设计没有考虑自变量的类型设计, 因此对回归结果的解释仅仅停留在变量系数符号的讨论方面。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 我们将连续变量财务指标构造为分类变量, 并假设指标各区间内的上市公司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是相同的。根据资本结构权衡理论, 最优负债水平应该是一个中间区域, 过高或者过低的负债都不是良好偿债能力的体现, 负债指标呈现“凹”性特点, 因此我们采用三分位将偿债能力指标构造为二元分类变量。根据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指标的特点, 这些指标数值越高表示公司的经营状况越好, 我们将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指标构造为三分类变量。同时, 我们对财务指标的好坏作一个简洁的定义, 偿债类指标取值为 1 的公司偿债能力强, 反之则弱; 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指标按照分类, 从 1 到 3 分别表示差、一般、好。

四、机会主义倾向的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目前, 美国和中国学者在进行此类回归分析时, 大多采用 Logit 和 Probit 两类回归模型。中国的社会环境、审计制度与美国不尽相同, 而且相关的监管措施也有较大差异, 因此财务指标对于审计意见的反应关系必然存在差异。鉴于以上因素以及研究样本的限制, 我们需要谨慎选择计量模型。我国上市公司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比例多在 95% 以上, 这与美国资本市场有较大差异。一般认为 Logit 模型在多数情况下对于极值有更好的拟合效果^[14], 因此本文采用 Logit 回归模型进行数据拟合, 同时以 Probit 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手段。本文的检验模型为:

$$\ln\left(\frac{p}{1-p}\right) = f(\text{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 control})$$

Logit 模型的基本形式主要表现在没有残差项以及自变量不要求为多元正态分布,但模型仍对多元共线性问题敏感,严重的共线性会导致变量的标准误膨胀,使得估计存在偏差。我们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判别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又进行了拟合优度的 H&L 检验,计算得到 χ_2 值为 12.258 ($p = 0.14$),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本文采用 Deviance 检验法分析样本数据结构,剔除了 93 个异常观测值,以剩余的 3293 个观测值为拟合样本。我们采用 Indicator(first) 方法将第一个分类变量作为参照系进行拟合。根据表 3 的拟合结果,模型的拟合效力指标 Nagelkerke 和 Cox&Snell 值均大于 0.15,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好。

表 3 Indicator (first) 模型拟合结果

变量	预计符号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系数	P 值
常数项	?	1.562 *	0.092	1.963 **	0.026	3.416 ***	0.000	3.152 ***	0.000
ROA									
ROA(1)	+	1.575 ***	0.000	1.793 ***	0.000				
ROA(2)	+	1.858 *	0.065	2.167 **	0.031				
ROE									
ROE(1)	+	2.384 ***	0.000	2.158 ***	0.000				
ROE(2)	+	2.434 **	0.015	2.487 **	0.013				
QR	+	-0.204	0.352			0.026	0.892		
OCFR	+	0.681 ***	0.005			0.761 ***	0.000		
DR	+	1.179 ***	0.000			1.067 ***	0.000		
TAT									
TAT(1)	+	0.465	0.118					0.929 ***	0.000
TAT(2)	+	1.194 **	0.010					1.853 ***	0.000
IT									
IT(1)	+	-0.843 ***	0.001					-0.382 *	0.09
IT(2)	+	-1.305 ***	0.000					-0.834 ***	0.002
ART									
ART(1)	+	0.981 ***	0.000					1.216 ***	0
ART(2)	+	1.148 ***	0.000					1.454 ***	0
FAT									
FAT(1)	+	0.285	0.293					0.256	0.285
FAT(2)	+	-0.404	0.227					-0.287	0.327
SOE	?	1.030 ***	0.000	1.175 ***	0.000	1.001 ***	0.000	0.802 ***	0.000
BIG4	?	0.086	0.884	0.573	0.338	0.631	0.239	-0.026	0.962
YEAR	?								
IND	?								
N									
-2Log likelihood		1255.996		763.859		997.182		922.515	
Cox&SnellR ²		0.158		0.139		0.076		0.096	
NagelkerkeR ²		0.500		0.438		0.238		0.304	

注:***、**和*分别表示 Wald 卡方检验在 0.01、0.05 和 0.1 水平上显著。

Logit 模型的系数不能直接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我们可以采用发生比(Odds)和发生比率(OR)进行分析,比如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为 p ,那么发生比为 $p/(1-p)$,发生比率就是指不同类型指标之间的发生比的比较值。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我们发现盈利能力好的上市公司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比盈利能力差的公司要大得多,ROA 和 ROE 的最大值分别达到 45 倍和 81 倍。这说明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受到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十分明显。偿债能力指标中除了速动

比率不显著以外,其他指标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说明偿债能力好的公司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概率也大。QR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速动指标中含有应收账款,这一指标受到审计的关注较多,因此速动指标可能不是判断上市公司持续经营情况的主要指标。营运指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TAT(2)在0.1水平上边际显著,并且TAT和ART的OR值说明上市公司营运效率越高,其被出具清洁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FAT与审计意见类型没有显著相关关系,IT虽然显著但是对应的OR值呈现递减关系。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我国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以前对于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存在较大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审计师对于这几项指标还是比较谨慎的,可能不会将其作为反映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主要因素来考虑。总体而言,拟合结果说明审计意见确实与财务指标存在系统的相关关系。此外,模型的控制变量SOE的回归系数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上市公司一般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有更好的投融资环境,且多为垄断性质的企业,经营风险相对较小,因而容易被出具清洁的审计意见。为了进一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三种类型的财务指标分别进行Logit回归(见表3)以及Probit回归(见表4),显著性水平也是一致的。

表4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显著性	系数	显著性	系数	显著性	系数	显著性
常数项	-3.510	0.335	-3.955	0.231	-4.956*	0.082	-5.401*	0.075
ROA	0.634***	0.000	0.718***	0.000				
ROE	1.028***	0.000	0.918***	0.000				
QR	-0.104	0.381			-0.012	0.901		
OCFR	0.400***	0.002			0.358***	0.000		
DR	0.630***	0.000			0.549***	0.000		
TAT	0.265**	0.023					0.454***	0.000
IT	-0.361***	0.000					-0.240***	0.000
ART	0.366***	0.000					0.424***	0.000
FAT	-0.047	0.600					-0.022	0.772
SOE	0.590***	0.000	0.646***	0.000	0.498***	0.000	0.437***	0.000
BIG4	0.078	0.806	0.333	0.304	0.335	0.189	-0.067	0.797
YEAR								Control
IND								Control
N								3293
-2 Log likelihood	1220.550		794.677		765.907		1068.590	
Cox & Snell R ²	0.158		0.139		0.077		0.097	
Nagelkerke R ²	0.498		0.439		0.244		0.305	

注:***、**和*分别表示Wald卡方检验在0.01、0.05和0.1水平上显著。

五、进一步的讨论

经验数据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这表明审计行为中确实存在机会主义倾向。那么,这一现象是合理的吗?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审计职业从其发端之初,时时、处处都在规避风险。我们回顾了西方审计方面实证研究的文献,从时间序列上看,财务指标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一直都十分显著,这说明西方“严刑峻法”下的审计市场存在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制度环境并不能作为区分这一问题的标准。跨越文化和制度环境的限制,无论人的行为是否完全理性,都会做出一个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只是其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认为审计机会主义倾向的存在是客观的,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任意夸大这种倾向。审计理论研究的学者尚德尔在其著作《审计理论》中阐述:审计是人类为了建立对某种标准的遵循性而进行的评价过程,其结果是得出一种意见(或结

论)^[15]。可见,审计意见本身针对的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信息的公允性、真实性和是否遵循了公认会计准则而做出的评价性意见,并不是对财务业绩本身的评价。我国财政部 1995 年出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2006 年新的审计准则第 1101 号均明确指出独立审计的目的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发表审计意见。如果审计师让自己的机会主义不断膨胀,超越了一个界限,将会导致审计的外部治理功能缺失,也就可能给投资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那么,我们如何防止如今不断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我们认为可以从审计的道德约束方面寻求答案,比如我国 2009 年最新的 CPA 资格考试分为专业和高级阶段,各个阶段都强调了对“职业道德”的考察。此外,诸如英国的 ACCA、美国的 AICPA 等资格考试中都设立了道德方面的考察内容。以上都是我们为了提升审计师道德品质不懈努力的体现,这说明审计师的道德建设一直都在受到重视。

最后,本文所探讨的内容是审计理论的一个崭新领域,鲜有学者涉足,因此很多理论尚待进一步完善。但是,这一尝试可以说是行为经济学与审计学的首次亲密接触,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审计质量的探讨。在诸多审计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的今天,我们坚信引入行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审计问题,将会使审计研究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参考文献:

- [1] DeAngelo L E. Auditor independence, low balling and disclosure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2): 113 - 127.
- [2] Watts R L, Zimmerman J L. Agency problems, audit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evidence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3): 613 - 633.
- [3] Chow C W. The demand for external auditing: size, debt and ownership influence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82, 57(2): 272 - 291.
- [4] Simth D. Auditor subject to opinions, disclaimers and auditor changes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1986, 11(6): 95 - 108.
- [5] Krishnan J, Stephens R. Evidence on opinion shopping from audit opinion conservatism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5, 14(2): 179 - 201.
- [6] 陆正飞,童盼. 审计意见、审计师变更与监管政策——一项以 14 号规则为例的经验研究 [J]. 审计研究, 2003(3): 30 - 35.
- [7] 吴联生,谭力. 审计师变更决策与审计意见改善 [J]. 审计研究, 2005(2): 34 - 40.
- [8] Lennox C. Do companies successfully engage in opinion-shopping?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 29(3): 321 - 337.
- [9] Krishnan J. Auditor switching and conservatism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4, 69(2): 200 - 215.
- [10] 吴联生,刘慧龙. 中国审计实证研究:1999—2007 [J]. 审计研究, 2008(2): 36 - 46.
- [11] 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1979, 47(2): 263 - 291.
- [12] 朱小平,余谦. 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与审计意见类型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J]. 中国会计评论, 2003(1): 30 - 48.
- [13] 秦荣生. 对经营风险导向审计的反思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6(3): 3 - 7.
- [14] Amemiya T. Qualitative response models: a survey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1, 19(4): 1483 - 1536.
- [15] 尚德尔. 审计理论 [M]. 汤云为,吴云飞,等,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1 - 7.

[责任编辑:马志娟]

(下转第 76 页)

国外环境审计研究述评

李明辉, 张艳, 张娟

(南京大学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1990年以来,随着环境保护观念的不断深入,环境审计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快发展,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也大量涌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审计的基本理论与主体,公司环境审计政策选择与成本效益,规则与立法,程序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国环境审计理论研究和相关实务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环境审计;环境治理;法律监管;内部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4-0029-09

一、引言

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这导致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并导致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缺乏、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极端性气候变化频发等不利后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多次出现环境公害事件。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人类能否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有效的环境管理系统是减少环境不利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环境审计作为环境管理的一种重要工具,受到世界各国(地区)、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各类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关注。许多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都已发布了环境审计指南。从实践来看,在西方国家,环境审计在政府部门、私营组织当中均得到了较快发展。例如,1992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府环境审计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各类私营组织中,内部环境审计更是发展迅猛。1991年一项对75家加拿大私营公司的调查表明,有57家制定了环境审计计划^[1]。1992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236家制造业、公用事业、天然产业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有许多公司实施了内部环境审计,其中对环境事项的会计处理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33%,对环境法规的遵循性及相关的报告要求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40%,对内部环境政策与程序的遵循性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58%^[2]。

1983年以来,我国政府审计机关不断探索政府环境审计工作,并且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的日益加大,我国政府环境审计实务也有较大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环境审计工作

[收稿日期]2010-09-24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0ZDIXM025)

[作者简介]李明辉(1974—),男,江苏金坛人,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中国审计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张艳(1970—),女,安徽滁州人,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中国审计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从事审计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张娟(1978—),女,湖北随州人,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审计研究。

还存在许多不足,无论是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审计目标,还是审计方法,均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且人们对于环境审计的含义、内容、目标等问题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以及“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以及“低碳经济”观念的不断深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环境审计工作,尤其是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工作,以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提升 and 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这就需要理论界进一步加强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由于国外环境审计发展相对成熟,有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本文将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以期对我国相关理论和实务研究有所帮助。

二、国外环境审计理论研究回顾

鉴于环境审计的重要性,许多国际组织都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发布了相关的指引、规范。这些指引和规范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限于篇幅,本文只回顾相关的理论研究文献。

国外学者对环境审计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 环境审计的基本概念

环境审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许多学者对环境审计的相关基本概念进行了探讨。

1. 关于环境审计的定义。Tomlinson(汤姆林森)等对环境审计的七种定义进行了探讨。这七种定义包括 EIS^① 草案复核或审计、决策点审计、执行审计、绩效审计、项目影响审计、预测技术审计、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程序审计,它们分别代表对环境影响评价的不同环节和内容进行的审计^[3]。Thomson(汤姆森)等认为,环境审计是环境管理系统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环境审计管理层可以确定组织的环境控制系统是否能够对遵循监管要求和内部政策提供充分保证。简言之,环境审计是一种自我评估程序,组织借助环境审计可以确定其是否达到法律和内部环境目标的要求。一般而言,环境审计是对公司、机构和政府的管理系统、政策、实务进行的系统、定期评估,其目的在于确定组织是怎样影响环境以及消耗资源的;环境审计还包括其后的调整或纠正行动^[1,4]。Lightbody(莱特博迪)则认为,环境审计包括广泛意义上的环境评价与复核^[5]。此外,Natu(纳特)等学者也探讨了环境审计的定义^[6-8]。总的来说,现有文献中关于环境审计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将环境审计看成是一种有用的环境管理工具。

2. 关于环境审计的目的。一些学者讨论了环境审计的目的,如 Boivin(博伊文)等认为,环境审计的主要目的是评价公司对有关法律规章的遵循以及公司的经营与业绩,并确定组织的风险。环境审计还有助于开发旨在减轻环境风险的弥补性计划^[9]。

3. 关于环境审计的内容与种类。汤姆森等认为,环境审计可分为遵循审计、环境管理系统审计、交易审计、处理、储存和处置设备审计、污染防范审计、环境负债审计、产品审计^[4,7,10]等。Thompson(汤普森)等则认为,环境审计不仅仅限于设备审计、废料审计、财产转让审计,所有的环境审计都应当包含以下四个基本要素:验证公司对有关监管要求的遵循性;验证公司对行业标准的遵循性;评价日常环境事项的管理情况;提出纠正已识别缺陷的行动计划^[1,8]。由此可见,对于环境审计的内容与种类,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4. 环境审计的动力与发展趋势。汤普森等指出,在过去,环境审计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对诉讼的担心以及监管部门的要求。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提高以及环境治理成本的提高,环境审计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信贷机构、董事会、行业组织、政府、投资者、会计职业团体均已成为环境审计的驱动力量。他们认为环境审计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强调环境审计的标准化;越来越强调审计师的教育与资格认证;有越来越多的来自环境科学、工程、管理或会计领域的人从事环境审计工作^[1]。Black(布

^①EIS 是指环境影响报告。

莱克)认为,传统的环境审计关注法律规章的遵循,但当环境审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它应更多地关注环境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他提出环境审计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实现转变:(1)更广泛的审计。环境审计除了关注遵循性外,还要评价组织环境系统的有效性,环境审计师应当识别影响环境的流程点、衡量环境损害的可能性、减轻环境风险。(2)整合化的环境审计。环境审计师应当融入组织的整个业务,从而对业务循环产生直接的影响。(3)涉及面更广。环境风险存在于组织的整个生命周期当中,组织中的所有经营人员都对环境审计负有责任。(4)环境审计人员应当进行统一认证。(5)环境审计与内部审计的作用应合并^[11]。

(二) 有关环境审计主体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环境审计主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注册会计师和内部审计师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问题。

1. 注册会计师参与环境审计的问题。注册会计师传统上更多地关注财务审计,当环境审计出现以后,注册会计师是否应当介入以及如何介入呢?一些学者对注册会计师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表明,尽管会计职业界将环境审计市场作为其新的业务增长点,但很少能够取得成功,目前的环境审计业务仍然主要由非会计师完成。Tozer(托泽)等的调查表明,多数的环境审计业务主要是由具有民用与工业工程、生物与化学技能和知识的人士所完成,被调查者没有雇用会计师从事环境审计工作^[5,12]。汤姆森等也指出,在美国,多数的环境审计团队,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均主要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组成^[4,13-14]。莱特博迪对新西兰的调查表明,进入21世纪后,参与环境审计的财务审计师的数量在增加,但多数的财务审计师仍然没有从事环境审计业务,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并没有从事环境审计业务的需求,或许是由于他们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15]。不过,Özbirecikli(奥兹伯斯克利)认为,环境问题将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长期财务安全产生显著影响,这促使会计和审计职业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他认为,在1970年—1989年期间,环境审计与报告主要关注法律的遵循性。此时,环境审计与会计工作是由组织以外的非会计领域的人员来完成的。而到了1990年—2000年,环境审计与报告成为环境管理系统的一个部分,其目标是管理层为了确定组织的环境控制系统是否能够为遵循相关的监管要求和内部政策提供充分的保证。此时,注册会计师介入环境审计与报告活动^[16]。Moor(穆尔)等则从环境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注册会计师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他们认为,注册会计师参与环境审计,可以对环境管理系统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价,并且可以与科学家、工程师一起对企业的流程及其对环境的后果进行深入地了解和评价,从而实施全面审计^[8]。那么,注册会计师应当如何进入环境审计业务领域或者说在环境审计中发挥更大作用呢?Dixon(狄克逊)等认为,阻碍财务审计师在环境审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因素是审计师自身的素质以及公司对环境报告缺乏需求。他们进而提出,财务审计师要想在环境审计中发挥作用,就必须改革会计教育,职业界应当就环境会计与报告以及环境报告的鉴证发布相关的指南^[17]。穆尔等也认为,现实中注册会计师不愿意从事环境审计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环境审计的公认准则^[8]。莱特博迪则认为,会计师可以利用其专业技能来推进审计理论与方法方面的培训^[5]。Power(鲍尔)讨论了注册会计师进入环境审计领域的战略问题^[18]。

2. 内部审计师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Tucker(塔克)等认为,应当重新考虑内部审计师的作用。这是因为,环境管理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审计环境系统以及评估环境风险敞口、计量环境负债,这为具有会计背景的内部审计师提供了机会。内部审计师应当接受相关培训,以便在环境审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19]。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和组织探讨了环境审计师的能力框架及教育问题。例如,他们提出采用问卷方法来引导学生学习环境审计技术,并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20]。加拿大环境审计协会则提出了注册环境可持续预测管理审计师的技能与知识框架。

（三）公司及地区环境审计政策选择

在许多国家,环境审计是公司的自愿行为。那么,为什么有的公司会自愿进行环境审计,而有的公司却不愿意进行环境审计呢?或者说,影响公司环境审计决策的因素有哪些?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Elliott(雅利安)等研究了法律监管对公司环境审计的影响。他们认为,对环境具有潜在危害的公司更可能实施环境审计,但研究结果并未支持这一假说。对此,他们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些公司可能并不认为环境问题是多大的问题或者是并未从战略层次来处理环境问题。此外,环境审计的成本也可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1]。Kolk(科尔科)等的研究发现,公司是否对其社会环境报告进行审计受到治理理念和法律环境的显著影响,审计社会环境报告可以看成是对所在国家较弱的制度的弥补机制^[22]。Mishra(米什拉)等的分析表明,监管部门评估公司环境报告的能力越强,公司越有动力进行环境遵循性审计。此外,当自我检查环境问题的收益提高时,公司在其战略当中纳入环境遵循审计的可能性也将会随之提高^[23]。

Bae(贝尔)等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实施环境审计,并且组织的行业特征会对其是否实施环境审计的决策产生影响^[24]。Gabel(加贝尔)等研究了管理层激励对环境审计的影响,并发现环境审计结果的相对准确性将会影响到管理层对传统业务和环境审计两方面的时间分配决策^[25]。他们进一步研究了环境审计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实施环境审计以后,最优工资的范围应当比未实施环境审计之时更大,实施环境审计的决策和预期工资的高低取决于代理人的预防性动机是否超过其对风险的厌恶。在现有管理系统中加入环境审计将会促使管理层更加关注环境问题,恰当地设计环境审计可以实现对环境和其他问题的关注之间的平衡^[26]。Darnall(达纳尔)等发现,组织对环境审计的不同利用政策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影响的差异有关^[27]。

此外,Stafford(斯塔福德)对美国不同州在环境审计政策方面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治关系以及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影响环境立法与自我监管政策最主要的因素^[28]。

（四）环境审计的成本与收益

制订环境审计计划必须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审计的收益、成本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Kass(卡斯)等指出,环境审计有很多好处,例如,它可以使公司更易于融资、发行证券,自愿实施环境审计还可以使公司改进环境管理,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声誉^[29]。Stanwick(斯坦尼克)等认为,环境审计的收益包括多个方面:它可以促使公司遵循相关的法律规章;减轻公司管理者潜在的法律风险;可以减少政府的检查和处罚;更容易获得政府订单;可以使公司的标准计量面向环境,从环境审计中获得的信息有助于公司制订经营计划;可以使公司避免环境危机和突发事件;可以使公司在利益相关者面前建立起正面的形象^[7]。穆尔等则指出,环境审计最主要的收益在于之后的纠正行动可以降低公司的环境风险^[8]。汤普森等指出,环境审计和环境影响评价所收集的公司层面的信息可以作为地区或者国家层面环境状况报告和新国民账户体系的基础^[1]。还有一些学者对环境审计的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对德国公司的研究发现,EMAS^①不仅对环境流程和组织革新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产品的革新活动具有积极影响。这一影响取决于特定的内外部因素,如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研发部门的参与等^[30]。他们还认为环境管理系统对环境流程革新具有积极影响,环境报告促进了技术性环境革新的普及^[31]。

但学者们也认识到,环境审计在产生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存在巨大的成本。环境审计的成本不仅

^①EMAS 是指允许工业企业自愿参加生态管理和审计联合体系的规则。

包括支付给审计师的费用,还包括许多潜在的经济或非经济的损失。他们指出,公司实施环境审计的障碍包括:审计成本、对管理层绩效评价的影响的担心、对潜在的法律问题的担心、对负面宣传的担心、审计收益的不确定性、不愿意发现存在的问题、对现有环境绩效已经感到满意^[1]。

与环境审计成本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环境审计可能产生的法律诉讼问题以及是否需要给予环境审计一定的豁免权以鼓励公司实施环境审计。Kass(卡斯)等指出,环境审计不仅需要花费成本,而且会涉及公司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秘密信息,许多公司的董事和高管担心环境审计会成为用来对付他们的一种手段。他们进而提出一个问题,环境审计通常需要披露地下水的污染情况或者没有严格遵守相关要求来处理废物的情况。如果公司报告这些情况并进行调查、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其最初的违反相关规定或者未能尽早报告危险物排放的行为是否可以免受民事或刑事诉讼呢?他们认为,除非环境审计可以享受一定的豁免权,否则环境审计很可能导致针对公司或其雇员的处罚,而且,第三方也会根据环境审计所披露的信息提出成本补偿或损害赔偿的要求。不过,他们认为,对环境审计给予一定的豁免权以避免可能的法律问题是不可行的。即便是给予豁免权,也不可能保护自愿披露给第三方的审计信息。尽管缺乏豁免权,公司还是有許多理由来进行环境审计,例如,债权人、潜在的客戶以及证券法中的披露规则都可能要求环境审计^[29]。Stensvaag(斯腾维格)则从法律角度对环境审计豁免权问题进行了分析^[32]。Lang(兰)分析了公司在环境审计方面所面临的立法、监管和司法上的两难困境后指出,采用覆盖整个公司的遵循性审计计划以确保其善意地遵循了环境规章并表明其确实注意到可能的环境影响,可能是一种稳健的政策^[33]。Lyon(莱昂)的分析表明,非政府组织对公司的漂绿^①行为进行惩罚,将会诱使公司更少地(而不是更多地)披露环境业绩;要想促使公司充分披露其环境信息,就应当鼓励公司建立环境管理系统的公共政策,而不是实施惩罚制度^[34]。

(五) 关于环境审计规则与立法的研究

Hillary(希拉里)对欧盟 EMAS 的产生过程和内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35-36]。Hepler(赫普勒)对美国国防部的“环境评价与管理”指引、美国环境保护署的“联邦设施环境审计草案”以及 ISO14001“环境管理系统审计”这三个环境审计工具进行了比较^[37]。Cahill(卡希尔)则对环境审计可以采用的权威性依据(准则)作了系统归纳^[38]。

一些学者通过对环境审计师的访谈研究了相关规则的具体实施情况。如 Collison(科利森)对英国财务审计师进行访谈后发现,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审计师关注环境问题十分重要,相关部门应当制定环境审计指南^[39]。Ammenberg(阿门博格)等对 13 位来自 9 个注册会计师团体的瑞典审计师进行访谈后发现,审计师们对 ISO14001 有关核心条款的理解存在差异。在瑞典公司中,环境管理系统与产品之间的关联是相当小的,产品很少会被看成是重要的环境因素,因而很少被纳入环境管理系统的范围,环境管理系统主要关注场所。但所有被调查者都认为,在开发产品时应当考虑某些环境因素^[40-41]。

(六) 环境审计程序和技术方法的研究

Perry(佩里)等阐述了如何运用环境审计对爱达荷州的水质量管理计划进行全面评估^[42]。博伊文等对公司环境审计计划的制订、审计报告的撰写进行了具体阐述^[9]。Natu(纳特)等也都对环境审计的步骤进行了探讨^[6-7,10,43-44]。穆尔则对传统财务报表审计与环境审计的步骤进行了比较^[8]。Diamantis(迪亚曼蒂斯)分析了在实施环境审计时如何选择适当的环境指标的程序^[45]。此外,有许多学者结合具体的案例对环境审计中的环境评估技术方法进行了介绍。

(七) 有关环境审计具体应用的研究

一些学者结合相关案例介绍了环境审计的具体应用,如 Visvanathan(维斯范纳)等介绍了一家中

^①所谓漂绿(greenwash),是指公司选择性地披露环境或社会绩效方面的正面信息,而不充分披露这方面的负面信息。

等规模的泰国食品厂实施综合环境审计以实现清洁生产的情况^[46]。

由于不同行业、部门的活动有较大差异,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所使用的环境规章也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部门、行业实施环境审计的内容和目标各异。为此,一些学者就医院、大学、服务业等一些特殊行业或部门实施环境审计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八) 国别研究

一些学者对相关国家实施环境审计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他们回顾了美国和英国环境审计的相关技术和案例,介绍了墨西哥和印度实施环境审计的情况^[47-50]。

三、总结与评论

(一) 国外相关研究的特点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国外关于环境审计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总结起来,相关研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 研究主题的多样化。国外的环境审计研究不仅涉及环境审计的基本概念,而且涉及环境审计政策选择、环境审计的成本与效益分析、环境审计立法与准则、环境审计的程序和方法以及具体应用等。从所研究的环境审计主体来看,相关研究既涉及政府环境审计,也涉及企业内部环境审计以及注册会计师对环境审计的介入问题;从所研究的环境审计的对象来讲,相关研究既包括区域性或群落的环境审计问题,也包括企业、政府部门、医院、大学等微观主体内部的环境审计问题。

2.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国外的环境审计研究在方法上基本做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规范研究中,既有运用环境经济学、公共选择、法学、审计学相关理论进行逻辑推理,也有运用数理模型进行推演、证明;实证研究中,既有建立在问卷调查或档案数据基础上的经验研究,也有实地研究、案例研究,尤其是有大量关于环境审计程序和方法的案例研究。

3. 企业微观环境审计是重点。尽管也有一些组织和学者关注政府环境审计问题(包括区域环境审计以及政府对微观组织环境问题实施的审计),但总的来说,国外多数研究都关注企业内部环境审计问题,这实际上反映出国外环境审计已经由外部强制式审计发展为强制式审计与自愿式审计并重。事实上,环境审计的深入发展必须依靠众多微观市场主体,尤其是众多企业。此外,由于国外环境审计实务的发展已经不局限于对环境法规的遵循性和财务报表中环境事项的处理和披露,国外研究对环境绩效审计、遵循性审计、环境财务审计均有所涉及,这与我国多数研究立足于政府环境审计且主要关注遵循性审计有着明显的不同。

4. 强调应用理论。尽管国外研究也会涉及环境审计的概念、目标、内容、种类等基本理论问题,但很少会专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且这些研究大多发表在行业性刊物上而较少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尤其是,国外学者一般不会对环境审计假设、对象、职能这些抽象性问题进行探讨。相比而言,他们更关注环境审计的程序与方法等应用理论,或者是对环境审计的成本效益、自愿性环境审计政策的影响因素等进行实证研究,这与我国现有环境审计研究主要关注基本理论有着较大差别。

(二) 国外相关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从国内来看,近年来关于环境审计的研究已经相当多,尤其是在环境审计的基本理论方面涌现出大量成果,这些研究对我国尽快了解和应用环境审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总的来看,我国的环境审计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关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和深度上均存在不足,概念辨析和介绍性的文章仍占有较大比重,这与我国环境审计实务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2008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在《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提出,要着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环境审计模式,2012年初步建立起资源环境审计评价体系。这就要求理论界必须进一步加强环境审计理论研究,为我国环境审计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持。

我们认为,我国未来应从以下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相关研究成果,加强环境审计的理论研究。

1. 加强对企业环境审计的研究。目前我国环境审计以政府环境审计为主,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由政府审计部门实施的外部环境审计问题,较少涉及企业及其他微观主体的内部环境审计问题,尤其是对于内部环境审计的动因、成本与效益、方法、指标、组织、内容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微观主体内部的自愿性环境审计对于整个社会加强环境管理、实现科学发展更为关键。因此,学者在继续对政府环境审计(包括区域性环境审计和政府投资项目环境审计)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应当加强对企业环境审计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包括企业环境审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企业实施环境审计的动因与障碍、企业自愿环境审计及信息披露的责任豁免、企业环境审计政策实施的成本与效益、内部环境效益审计的理论与方法等。

2. 加强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我国现有的环境审计研究多为规范分析,缺乏对我国环境审计实践现状和问题的调查以及关于环境审计应用实践的深层次案例分析,经验研究也很缺乏。因此,学者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运用理论建模、案例分析、实地研究、问卷调查、经验分析、实验研究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环境审计相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展开研究。

3. 在关注基本理论的同时加强环境审计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对环境审计的概念、理论基础、对象、职能、目的、目标、种类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总的来说,相关研究仍处于松散的状态,并没有构建起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认为,学者们应当在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出一个内部概念一致、可以指导环境审计实践的环境审计理论框架,对短期内不能达成一致的抽象性理论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从而集中力量,加强对环境审计应用理论的研究,以构建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审计的技术方法体系。当前,学者们尤其要研究在我国现有环境保护法律框架之下如何实施环境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绩效审计。此外,学者们也要加强对环境审计结果的公开与运用、环境审计的信息基础、环境审计准则等问题的研究。

4. 加强对环境审计师能力框架的研究。专业胜任的环境审计师的缺乏是制约我国环境审计深入开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我国需要在借鉴西方国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环境审计实务对审计师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进而构建出我国环境审计师的知识与能力框架,并探索环境审计师的教育与资格认证问题,从而解决我国环境审计的人才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 [1]Thompson D, Wilson M J. Environmental audit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4, 18 (4): 605 - 615.
- [2]Byington J R, Campbell S. Should the internal auditor be used i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J]. The Journal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Finance, 1997, 8(2): 139 - 146.
- [3]Tomlinson P, Atkinson S F. Environmental audits: a literature review [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987, 8(3): 239 - 261.
- [4]Thomson R P, Simpson T E, Grand C H. Environmental auditing [J]. The Internal Auditor, 1993, 50(2): 18 - 22.
- [5]Lightbody M. Environmental auditing: the audit theory gap [J]. Accounting Forum, 2000, 24(2): 151 - 169.
- [6]Natu A V. Environmental audit; a tool for waste minimiza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 scale dyestuff industries [J]. Chemical Business, 1999, (9): 133 - 138.
- [7]Stanwick P A, Stanwick S D. Cut your risks with environmental auditing [J]. The Journal of Corporate Accounting & Finance, 2001, 12(4): 11 - 14.
- [8]Moor P D, Beelde I 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the role of the accountancy profession; a literature review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5, 36 (2): 205 - 219.
- [9]Boivin B, Gosselin L. Going for a green audit [J]. CA Magazine, 1991, 124(3): 61 - 63.

- [10] Brooks K. Reaping the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auditing [J]. *Internal Auditing*, 2004, 19(6) : 26 – 36.
- [11] Black R. A new leaf in environmental auditing [J]. *Internal Auditor*, 1998, 55(3) : 24 – 27.
- [12] Tozer L, Mathews M. Environmental auditing: current practice in New Zealand [J]. *Accounting Forum*, 1994, 18(3) : 47 – 69.
- [13] CICA.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the role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R]. Working Paper of CICA, 1992.
- [14] Goodfellow J, Willis A. W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J]. *CA Magazine*, 1991, 124(3) : 42 – 50.
- [15] Chiang C, Lightbody M. Financial auditors an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in New Zealand [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004, 19(2) : 224 – 234.
- [16] Özbirecikli M. A review on how CPAs should be involved in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reporting for the core aim of it [J].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2007, 5(2) : 113 – 126.
- [17] Dixon R, Mousa G A, Woodhead A D. The necessary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auditors: a review of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inancial auditing profession [J]. *Accounting Forum*, 2004, 28(2) : 119 – 138.
- [18] Power M. Experti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ce: accountants and environmental audit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997, 22(2) : 123 – 146.
- [19] Tucker R R, Kasper J. Pressures for change in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in the role of the internal auditor [J].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1998, 10(3) : 340 – 354.
- [20] Frid C L J. Environmental auditing: what is it and how can it contribute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J]. *Journal of Biological Education*, 1991, 25(3) : 214 – 218.
- [21] Elliott D, Patton D. Environmental audit response: the case of the engineering sector [J]. *Greene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1998, (22) : 83 – 95.
- [22] Kolk A, Perego P. Determinants of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ility assurance statements: an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8, 19(3) : 182 – 198.
- [23] Mishra B K, Newman D P, Stinson C 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centives for compliance audit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7, 16(2) : 187 – 214.
- [24] Bae S, Seol I. An exploratory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audit programs in S&P 500 companies [J]. *Management Research News*, 2006, 29(9) : 573 – 579.
- [25] Gabel H L, Sinclair-Desgagné B. Environmental audits and incentive compensation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4, 25(1) : 103 – 110.
- [26] Sinclair-Desgagné B, Gabel H L. Environmental auditing in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ublic policy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7, 33(3) : 331 – 346.
- [27] Darnall N, Seol I, Sarkis J. Perceived stakeholder influences and organizations' use of environmental audits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8, 34(2) : 170 – 187.
- [28] Stafford S L. Stat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 audit initiatives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6, 24(1) : 172 – 187.
- [29] Kass S L, McCarroll J M. Environmental audits: how they can help and hurt the corporation [J]. *Directorship*, 1995, 21(9) : 12 – 14.
- [30] Hoffmann E, Ankele K, Nill J, et al. Product innovation impacts of EMAS: results of case studies and a survey of German firms validated according to the EU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auditing scheme [J]. *The Journal of Sustainable Product Design*, 2003, 3(3/4) : 93 – 100.
- [31] Rennings K, Ziegler A, Ankele K, et al.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auditing scheme on technical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57(1) : 45 – 59.
- [32] Stensvaag J. The fine print of state environmental audit privileg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1998, 16(1) : 69 – 178.
- [33] Lang J C. Legislative, regulatory and juridical dilemmas in environmental auditing [J]. *Eco-Management and Auditing*,

- 1999, 6(3):101 - 114.
- [34] Lyon T P, Maxwell J W. Greenwash: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under threat of audit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6.
- [35] Hillary R. Developments in environmental auditing [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1995, 10(8):34 - 39.
- [36] Hillary R.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requirements under the EU [J]. *The Environmentalist*, 1995, 15(4): 293 - 299.
- [37] Hepler J A, Neumann C. Enhancing compliance at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ilities: comparison of three environmental audit tool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2003, 65(8):17 - 24.
- [38] Cahill L B. Conducting third-party evalu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audit programs [J]. *Environmental Quality Management*, 2002, 11(3):39 - 49.
- [39] Collison D J. The response of statutory financial auditors in the UK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 descriptive and exploratory case study [J].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1996, 28(4): 325 - 349.
- [40] Ammenberg J, Wik G, Hjelm O. Auditing external environmental auditors: investigating how ISO 14001 is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in reality [J]. *Eco-Management and Auditing*, 2001, 8(4): 183 - 192.
- [41] Ammenberg J, Sundin E. Products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the role of auditors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5, 13(4): 417 - 431.
- [42] Perry J A, Schaeffer D J, Kerster H W, et al. The environmental audit application to stream network design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85, 9(3):199 - 208.
- [43] Vinten G. Green audit: the path to global survival [J]. *Executive Development*, 1993, 6(2):14 - 17.
- [44] Paramasivan T. Taking professional care of the nature: the environmental audit [J]. *The Chartered Accountant*, 2002, (8): 148 - 155.
- [45] Diamantis D.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in Islands [J]. *Eco-Management and Auditing*, 1999, 6(1):18 - 25.
- [46] Visvanathan C, Parasnis M, Janesiripanich A. Multimedia environmental audit in a rice cracker factory in Thailand: a model case study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998, 6(2): 93 - 101.
- [47] Tomlinson P, Atkinson S F. Environmental audits: proposed terminology [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987, 8(3): 187 - 198.
- [48] Alvarez-Larrauri R, Fogel I. Environmental audits as a policy of state: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exico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8, 16(1): 66 - 74.
- [49] Badrinath S D, Raman N S. Environmental audit: Indian scenario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995, 121(6):472 - 477.
- [50] Mahwar R S, Verma N K, Chakrabarti S P, et al. Environmental auditing programme in India [J].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7, 204(1): 11 - 26.

[责任编辑:马志娟]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 Review of Overseas Studies

LI Minghui, ZHANG Yan, ZHANG Juan

(China Center for Audit Studies,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s a subject has developed fast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since 1990s,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bloomed simultaneously. Western scholars mainly focus on following issues: fundamental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uditing (such as definition, objective, methodology, type, et al), the subjects, the choice of relevant policy, cost and benefi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auditing, rules or standard setting, procedures and methodologies, etc. Such researches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both academic studies and relevant practic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uditing; environment governance; legal supervision; internal audit

盈余管理、关联交易与审计师特征

赵国宇

(广东商学院 会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必须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配合”才有可能顺利实施,而与之“配合”的审计师因承担更高的审计风险,必以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作为补偿。实证研究表明,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量越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规模越有利于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审计任期过长不利于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量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非国际“四大”和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即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是上市公司的选择目标,因盈余管理进行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支付了更高水平的审计费用。

[关键词]盈余管理;关联交易;审计师选择;审计收费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4-0038-08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实现自身利益或企业利益,误导某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它影响会计盈余的契约的结果,在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结果时,运用职业判断做出会计选择和决策的过程^[1]。上市公司主要出于契约安排、政治成本和资本市场动机进行盈余管理^[2-4],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上市公司主要侧重于资本市场动机。杜滨、李若山对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关联方交易进行了研究,发现关联方交易是盈余管理实现配股等动机的重要手段之一,债务重组、关联资产重组还是为满足配股动机最常用的类型,且配股动机是决定上市公司采用关联交易的最重要因素^[5]。大量证据表明,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购买和销售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6]。

虽然在外部市场环境不完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的条件下,企业集团和内部市场的关联交易有助于形成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结构,起到效率促进的作用^[7]。但是,当控股股东掌握公司的控制权时,公司主要的代理问题不再是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的重点是如何防止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的利益侵占^[8],而盈余管理则成为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主要手段。我国的经济制度、法制体系、企业结构容易导致关联交易^[9]。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是为了实现“效率促进”的目的,而是将“红色业绩”转变为“蓝色业绩”的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之一^[10]。

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上市公司被强制要求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核、鉴证,并公开披露获得的审计意见。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实施盈余管理或利益挖掘行为,肯定是审计师重点关注的内容,当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违反相关规定、超过一定限度时,审计师很可能出

[收稿日期]2010-10-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37204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6-0703);广东商学院校级科研资助项目(10BS79002)

[作者简介]赵国宇(1972—),男,湖南邵东人,广东商学院会计学院讲师,博士,从事公司治理、产权保护与审计师行为研究。

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存在违规关联交易行为的上市公司为规避不利的审计意见,有寻求与其“配合”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强烈动机。现有研究主要从代理成本角度对审计师选择进行实证检验^[11-12],较少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等利益视角研究审计师选择问题。可以推测,关联交易严重的上市公司并不需要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总是寻求愿意“配合”其行为的会计师事务所。盈余管理的存在增加了公司的错报风险,这使“配合”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关联交易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增加,并将承担更大的审计风险。从风险与收益匹配的角度来看,这些会计师事务所将获取更高水平的审计收费作为补偿。通过盈余管理、关联交易行为研究审计师选择,进一步考察关联交易对审计收费水平的影响,这对丰富现有研究、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控制审计师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下面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样本选择与构建相关研究模型;第四部分为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的提出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如果上市公司最近2年连续亏损,交易所将对其股票实行特别处理。我国《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如果最近3年连续亏损,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暂停或终止其股票上市。因此,上市公司一般宁愿冒着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的风险,也要进行盈余管理。Jian(简)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法制体系、企业结构容易导致关联交易,属于企业集团的一个公司在有通过盈余管理避免退市或发行新股动机时,会报告非正常的大规模关联销售^[9]。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属于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国有股权的特殊性决定了上市公司和关联方高管人员的相互兼职现象严重,从而造成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可操作性更强。另外,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大量的企业集团控制现象,企业集团结构可能更容易造成要素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关联交易。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与关联交易量呈正相关关系。

作为公司的外部监督机制,独立审计的最终目的是降低信息不对称,保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产权^[13]。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必须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公开披露获得的审计意见,这使得我国的独立审计是强制性需求的结果。因此,利用关联交易操纵会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有寻求与其“配合”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强烈动机。一般来说,规模越大、声誉越好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因为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服务会丧失更多准租金”的顾虑^[14]。存在关联交易问题的上市公司不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因此,声誉较差、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成为关联交易严重的上市公司的首选目标。

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声誉不突出、规模较小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因审计失败造成的准租金损失的顾虑较小,他们更有可能“配合”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漆江娜等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可操控应计利润额较低这一方面,说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保持了较好的审计质量^[15]。温国山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审计市场存在着大批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审计质量的确较高^[16]。王霞、张为国在进行相关研究时,用“十大”和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代表国内大规模和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17],而蔡春等发现,“十大”比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确实更易发现并抑制错误的会计行为,提供合格的审计报告^[18]。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关联交易水平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非“四大”和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查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正常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业务的收费应当公平地反映其所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价值,过高或过低的收费都可能影响审计独立性和审计工作的质量。因此,可以推测,若会计师事务所对存在严重关联交易行为的上市公司予以“配合”,对本该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出具了标准审计意见,

或者改善了公司应得的审计意见,则其审计收费水平应该比正常情况偏高。这是因为,作为鉴证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会计师事务所的异化行为与其经济利益存在直接的内在联系。由于配合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风险更大,因此其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此外,违规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为使经过盈余操纵后的财务报表顺利通过,也会通过调高收费水平来寻求审计师的默许或者“配合”,以对审计师承担的较高风险给予额外补偿。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违规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支付的审计费用水平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 盈余管理的衡量

在应计制会计模式下,会计盈余包括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额两部分。由于操纵各种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最为灵活和常见,数据也较容易取得,故实践中多以应计项目作为研究盈余管理的对象。国外大量研究发现,截面 Jones 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能够有效地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19-20]。国内学者夏立军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对多个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及其调整模型在中国证券市场的使用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相对于其他模型来说,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行业特征参数的截面 Jones 模型能够较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21]。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特点,参照夏立军的做法,本文将调整后的截面 Jones 模型确定的计算公式表示如下:

$$DA_{it} = TA_{it}/A_{it-1} - NDA_{it} \quad (1)$$

其中, DA_{it} 为公司盈余管理幅度; TA_{it} 为公司当年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由 $TA_{it} = NI_{it} - CFO_{it}$ 计算得到, NI_{it} 为公司当年净利润, CFO_{it} 为公司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A_{it-1} 为公司上年年末总资产; NDA_{it} 为经过上年年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当年非操纵性应计利润,计算公式如下:

$$NDA_{it} = \alpha_1 + \alpha_2(\Delta REV_{it}/A_{it-1}) + \alpha_3(PPE_{it}/A_{it-1}) \quad (2)$$

其中, ΔREV_{it} 是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和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 PPE_{it} 是公司当年末固定资产原值;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是行业特征参数,这些行业特征参数的估计值根据以下方程(3)求得。

$$GA_{it}/A_{it-1} = \alpha_1 + \alpha_2(\Delta REV_{it}/A_{it-1}) + \alpha_3(PPE_{it}/A_{it-1}) + \varepsilon_i \quad (3)$$

其中,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是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值; GA_{it} 是公司线下项目目前总应计利润, $GA_{it} = OI_{it} - CFO_{it}$, OI_{it} 为公司当年营业利润, CFO_{it} 为公司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ε_i 为残差项。

在对(2)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时,本文选取该行业内全部上市公司,估计过程每年每个行业独立进行一次。由于股票发行事件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剔除了估计期间相关行业中配股、增发和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 2005 年开始股权分置改革,2006 年大部分公司已经完成了这项改革,全流通可能对上市公司的市场表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择 2002 年—2004 年的全体 A 股上市公司为基础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本文剔除以下样本:金融类企业;当年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净资产为负的公司;数据缺失的公司。在数据处理时,本文剔除了所用到的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分位数之外的极端观测值,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则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手工进行收集,上市公司年报来自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审计师相关数据均来自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数据库,并与巨潮资讯网和万得资讯系统核对。

本文研究中需要计算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为了保证每一年份、每一个行业组合有足够的样本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并使分类具有合理性,我们参照陈武朝、张泓的做法对行业进行了适当归并和

调整^[22],最终将上市公司分为 C₄、C₆、C₇、C₈、C₉、G、H、J、M 共 9 个行业。

(三) 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

模型 1: 检验盈余管理与关联交易之间关系的模型。

$$DA_i = \beta_0 + \beta_1 RPT_i * EMM_i + \beta_2 ROE_i + \beta_3 Size_i + \beta_4 Debt_i + \beta_5 Growth_i + \beta_6 Big4_i + \beta_7 Big10_i + \beta_8 Tenure_i + \beta_9 Industry_i + \beta_{10} Year_i + \varepsilon_i$$

其中, β_0 为截距, $\beta_1 \sim \beta_{10}$ 为回归系数, ε_i 为残差。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因变量 DA_i 是经过上年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当年的操纵性应计利润, 代表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它可由(1)式计算得到。

$RPT_i * EMM_i$ 为交叉变量, 用来衡量具有盈余管理行为的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 RPT_i 为关联交易规模。我国 2002 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 45 条规定, 公司应披露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由于上市公司规模大小不同, 为了从横截面比较所有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总规模大小, 本文选择上市公司年度关联交易额与净资产值的比例来度量某一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在我国, 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实行股票“特别处理”制度, 上市公司利用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盈余管理存在“0% 现象”, 当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介于 $[0, 1\%]$ 区间时, 即认为上市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23]。因此, 当样本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 $[0, 1\%]$ 区间时,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ROE_i 为公司年末净资产收益率, 等于公司净利润除以年末净资产。 $Size_i$ 为公司当年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Debt_i$ 为公司年末负债总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Growth_i$ 为公司主营业务增长率, 等于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与上年相应数据的比值。引入这些变量是为了控制公司的规模、经营业绩等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Big4_i$ 是虚拟变量, 用以控制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和规模对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影响。若上市公司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现有研究表明, 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监督^[24]。 $Big10_i$ 也是虚拟变量, 如果上市公司聘请的是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十大”是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的数目为衡量标准的。 $Tenure_i$ 为审计任期, 它表示公司所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累计年份。具体来说, 我们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市场审计(即 3 年加一期的上市审计)作为审计任期的第 1 年, 如果以后未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那么审计任期就按年累加。如果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变更当年就作为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任期的第 1 年。如果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 则合并前后的审计任期连续计算。

$Industry_i$ 为行业虚拟变量的统称, 用于控制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因素对关联交易行为的影响, 它以综合类上市公司为基准组进行分类。

$Year_i$ 为年度虚拟变量的统称, 用于控制不同年度变量的影响。

模型 2: 分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与审计师选择之间关系的模型。

$$RPT_i = \beta_0 + \beta_1 Big4_i + \beta_2 Big10_i + \beta_3 First_i + \beta_4 Nature_i + \beta_5 Board_i + \beta_6 ROE_i + \beta_7 Size_i + \beta_8 Debt_i + \beta_9 Industry_i + \beta_{10} Year_i + \varepsilon_i$$

其中, β_0 为截距, $\beta_1 \sim \beta_{10}$ 为回归系数, ε_i 为残差。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First_i$ 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我国, 由于缺乏有效的经理市场, 管理者多由大股东委派, 导致行政力量高于市场力量, 容易使管理者的决策以大股东利益为导向^[25]。众多研究表明关联交易往往成为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主要手段之一^[26-28]。受我国股权特性影响, 我国的股权比例中控股情况较多, 大股东往往对公司拥有绝对发言权, 并且由于外部信息系统不透明,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利益“掏空”行为往往是大股东意志的结果,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行为受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低的影响。

$Nature_i$ 用来衡量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最初来自国有企业的改制,这样上市公司与原改制企业(大多成为控股大股东)之间存在天然的内部交易关系。在当时股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大小股东的根本利益分割,控股大股东存在“掏空”上市公司而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动机^[29]。

$Board_i$ 为公司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会总人数来衡量。根据 Gordon(戈登)等人的研究,董事会规模越大的公司治理机制越弱,越容易产生侵占公司资源的关联交易行为^[6]。

RPT_i 、 ROE_i 、 $Size_i$ 、 $Debt_i$ 、 $Industry_i$ 、 $Year_i$ 、 $Big4_i$ 、 $Big10_i$ 含义同上。

模型 3:分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与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模型。

$$\ln fee_i = \beta_0 + \beta_1 RPT_i * EMM_i + \beta_2 Big4_i + \beta_3 Big10_i + \beta_4 Tenure_i + \beta_5 Chang_i + \beta_6 Size_i + \beta_7 SqSubs_i + \beta_8 ROE_i + \beta_9 Growth_i + \beta_{10} Industry_i + \beta_{11} Industry_i + \varepsilon_i$$

其中, β_0 为截距, $\beta_1 \sim \beta_{11}$ 为回归系数, ε_i 为残差。模型中变量的含义如下:

$\ln Fee_i$ 为因变量,以上市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Chang_i$ 为审计师变更情况,如果公司当年变更了审计师,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SqSubs_i$ 为上市公司在会计期末拥有的、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数目的平方根。

$RPT_i * EMM_i$ 、 $Tenure_i$ 、 $Big4_i$ 、 $Big10_i$ 、 ROE_i 、 $Size_i$ 、 $Growth_i$ 、 $Industry_i$ 、 $Year_i$ 等变量含义同上。

四、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给出了样本公司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所选的样本统计结果看,DA 的均值为 -0.015,标准差为 0.117,分布大致对称。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审计市场所占的份额为 7.1%,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占的份额为 35.2%。审计任期平均长度为 3.692 年,有 9% 的上市公司变更了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大股东的平均控股比例为 36.6%,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控股的占 63.2%,公司董事会平均为 9.4 人。

表 1 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DA	-0.015	0.117	-1.204	0.387	0.003
RPT	0.299	0.464	0	4.03	0.167
LnFee	13.16	0.668	11.513	17.56	13.039
Big4	0.071	0.257	0	1	0
Big10	0.352	0.478	0	1	0
Tenure	3.692	1.93	1	9	3
Chang	0.09	0.287	0	1	0
First	0.366	0.151	0.052	0.821	0.344
Nature	0.632	0.483	0	1	1
Board	9.412	1.97	4	18	9
Size	21.44	1.049	18.157	25.74	21.395
SqSubs	2.192	1.659	0	9.381	2.236
Debt	0.516	0.179	0.021	0.981	0.541
ROE	0.026	0.297	-3.632	0.669	0.059
Growth	1.361	2.72	-0.046	75.47	1.132

(二) 变量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表 2 报告了模型 1 变量的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从分析的结果看,模型 1 中自变量 $Size$ 与 $Big4$ 相关系数最大值为 0.407,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限于篇幅,模型 2 和模型 3 的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没有在此列出,它们也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 2 模型 1 变量的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

	RPT * EMM	ROE	Size	Debt	Growth	Big4	Big10	Tenure
RPT * EMM	1	-0.009	-0.017	0.013	-0.009	0.014	-0.017	-0.029
ROE		1	0.144 ***	-0.25 ***	0.044	0.074 **	0.018	-0.042
Size			1	0.195	-0.027	0.407 ***	0.035	0.003
Debt				1	-0.004	-0.07	0.033	-0.006
Growth					1	-0.01 **	-0.007	0.001
Big4						1	0.006	0.024
Big10							1	0.024
Tenure								1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三) 模型 1 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 3 是检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关联交易关系的多变量分析结果。从表 3 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 *RPT * EMM* 在 10%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盈余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量更高,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盈余管理还与 *Big4*、*Big10* 显著负相关,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规模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与审计任期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任期过长不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四) 模型 2 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 4 是检验关联交易与审计师选择关系的多变量分析结果。从表 4 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与 *Big4*、*Big10* 在 10%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此外,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 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性质在 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此外,关联交易还与 *ROE* 在 10% 水平上正相关。

(五) 模型 3 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 5 检验了审计收费水平与关联交易关系的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从表 5 可以看出,审计收费水平与 *RPT * EMM* 在 10%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因盈余管理进行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支付了更高水平的审计费用。此外,审计收费还与变量 *Big4*、*Big10*、*Size*、*SqSubs*、*ROE* 在 1% 水平上显著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六) 稳健性分析

为检验结论对有关因素的敏感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三种稳健性分析:第一,对样本公司的连续变量的异常值,不是采取剔除而是对样本的最大与最小 1% 观测值进行 *Winsorize* 处理。第二,对关联交易的衡量,除了前文采用上市公司年度关联交易额与净资产值的比例来度量,还改用关联交易额与公司总资产值的比值来衡量。第三,对关联交易的衡量采用关联交易金额的自然对数。这三种分析结果

表 3 模型 1 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系数	T 值	P 值	VIF 值
截距	0.036	0.402	0.687	
<i>RPT * EMM</i>	0.047	1.75	0.08 *	1.011
<i>ROE</i>	-0.02	-1.54	0.123	1.141
<i>Size</i>	-0.004	-0.91	0.362	1.379
<i>Debt</i>	-0.01	-0.36	0.717	1.203
<i>Growth</i>	0.004	0.299	0.765	1.047
<i>Big4</i>	-0.03	-1.65	0.092 **	1.244
<i>Big10</i>	-0.018	2.251	0.025 **	1.012
<i>Tenure</i>	0.009	4.412	0.000 ***	1.023
<i>Industry</i>			控制	
<i>Year</i>			控制	
<i>R square</i>			0.053	
<i>Adj-R²</i>			0.037	
<i>F 值</i>			3.209 ***	

表 4 模型 2 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系数	T 值	P 值	VIF 值
截距	-0.533	-1.527	0.127	
<i>Big4</i>	-0.11	-1.709	0.088 *	1.252
<i>Big10</i>	-0.055	-1.769	0.077 *	1.021
<i>First</i>	0.546	5.19	0.000 ***	1.161
<i>Nature</i>	-0.065	-1.971	0.049 **	1.163
<i>Board</i>	-0.002	-0.235	0.814	1.114
<i>ROE</i>	0.031	1.796	0.073 *	1.531
<i>Size</i>	-0.055	-0.608	0.543	1.225
<i>Debt</i>	-0.077	-1.4671	0.143	1.137
<i>Industry</i>			控制	
<i>Year</i>			控制	
<i>R square</i>			0.08	
<i>Adj-R²</i>			0.064	
<i>F 值</i>			4.968 ***	

表 5 模型 3 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系数	T 值	P 值	VIF 值
截距	5.723	17.372	0.000 ***	
<i>RPT * EMM</i>	0.174	1.789	0.073 *	1.01
<i>Big4</i>	0.898	14.173	0.000 ***	1.177
<i>Big10</i>	0.105	3.545	0.000 ***	1.037
<i>Tenure</i>	-0.01	-1.135	0.256	1.024
<i>Chang</i>	0.045	0.911	0.3621	1.032
<i>Size</i>	0.049	5.62	0.000 ***	1.1
<i>SqSubs</i>	0.336	21.839	0.000 ***	1.285
<i>ROE</i>	-0.15	-3.218	0.001 ***	1.039
<i>Growth</i>	0.002	0.327	0.743	1.05
<i>Industry</i>			控制	
<i>Year</i>			控制	
<i>R square</i>			0.574	
<i>Adj-R²</i>			0.566	
<i>F 值</i>			71.238 ***	

表明了研究的基本结论不变。限于篇幅,相关结果没有在此列出。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从关联交易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收费问题,得到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盈余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量更高,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规模有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审计任期过长不利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此外,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量越大,越倾向于选择非国际“四大”和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因盈余管理进行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支付了更高水平的审计费用。

在我国,由于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相关制度还不完善,上市公司存在“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明显特征。关联交易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而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控股股东利益挖掘、“掏空”上市公司的重要手段,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必须得到会计师事务所的“配合”才有可能顺利实施。看重声誉的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必然会认真权衡收益与风险,仔细计算准租金的可能流失,一般不会“配合”上市公司进行不合规的关联交易,因此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此类上市公司的选择目标。为盈余管理目的而进行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以付出更高的审计费用为代价,而承担更高审计风险的会计师事务所则以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作为补偿。为规范证券市场的正常交易,保证其健康运转,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因盈余管理、利益挖掘等动机进行的关联交易行为和审计师的异化行为必须加强管制。

参考文献:

- [1]陈国欣,祝继高.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4(7):12-18.
- [2]Defond M L, Jiambalvo J. Debt covenant viol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accrual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4, 17: 145-176.
- [3]Meyer S 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recalculations and accounting choices in commercial bank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8, 12: 123-154.
- [4]DeAngelo L E. Accounting numbers as market valuation substitutes: audit of management buyouts of public shareholder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86(6): 400-420.
- [5]杜滨,李若山.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实证研究[G]//中国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253-264.
- [6]Gordon E A, Henry E.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R]. Working Paper, 2003.
- [7]Khanna T, Palepu K. Is group affiliation profitable in emerging markets? An analysis of diversified Indian business group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5 (2): 867-892.
- [8]Shleifer A, Vishny R.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 737-783.
- [9]Jian Ming, Wong T J.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unneling through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rporate groups [R]. Working Paper, 2004.
- [10]刘建民,刘星.关联交易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实证研究——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7(1):79-89.
- [11]曾颖,叶康涛.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J].会计研究,2005(10):63-70.
- [12]王焯.股权控制链、代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J].会计研究,2009(6):65-72.
- [13]王善平,唐红.人性、产权与独立审计管理制度安排[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145-147.
- [14]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3): 183-199.
- [15]漆江娜,陈慧霖,张阳.事务所规模、品牌、价格与审计质量——国际“四大”中国审计市场收费与质量研究[J].审

- 计研究, 2004(3): 59-65.
- [16] 温国山. 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审计质量与市场反应——来自中国证券审计市场的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6): 34-45.
- [17] 王霞, 张为国. 财务重述与独立审计质量[J]. 审计研究, 2005(3): 56-61.
- [18] 蔡春, 黄益建, 赵莎. 关于审计质量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制造业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05(2): 3-10.
- [19] Bartov E, Gulf A, Tsui J S. Discretionary-accruals models and audit qualification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0, 76(1): 27-58.
- [20] Heninger W 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or litigation and abnormal accrual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1, 76(1): 111-126.
- [21] 夏立军. 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研究[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3(2): 94-154.
- [22] 陈武朝, 张泓. 盈余管理、审计师变更与审计独立性[J]. 会计研究, 2004(8): 81-86.
- [23] 靳明. 从 ROE 的实证分析看上市公司的业绩操纵行为[J]. 中国工业经济, 2000(2): 64-69.
- [24] 陈德球, 叶陈刚. 家族管理、终极控制与审计师选择[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2): 90-99.
- [25] 李志文, 宋衍蘅. 股权结构会影响筹资决策吗——来自中国赛格系公司的案例[J]. 管理世界, 2003(6): 128-138.
- [26] 余明桂, 夏新平.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 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4(6): 33-61.
- [27] 李增泉, 孙铮, 王志伟. “掏空”与所有权安排——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验数据[J]. 会计研究, 2004(12): 3-13.
- [28] Cheung Y L, Raghavendra R P, Stouraitis A. Tunneling, propping and expropriation: evidence from connected party transactions in Hong Ko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82: 343-386.
- [29] 吴晓求. 股权分置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兼论全流通条件下中国资本市场的若干新变化[J]. 财贸经济, 2006(2): 24-31.

[责任编辑:高 婷]

Earnings Management, Affiliated Transaction and Auditor Characteristics

ZHAO Guoyu

(School of Accounting, Guangdong Business College, Guangzhou 510320, China)

Abstract: Affiliated transa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uning of listed companies, which can be completed with the help of accounting firms. As the commitment to higher audit risk, auditors charged higher auditing fees as compensation.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ffiliated transa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greater affiliated trading volume is, the more capable accounting firm's name brand and size to inhibit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but the long term is detrimental to auditing. The greater volume of transactions of public companies, th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non-international "Big Four" and the domestic non-"Ten" accounting firms. Small-scale CPA is the choice of target by listed companies. The listed companie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y means of affiliated transaction paid a higher level of auditing fees.

Key Words: earnings management; affiliated transaction; auditor choice; auditing fees

投资机会、审计风险与审计质量研究

翟华云¹, 廖洪²

(1. 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审计可以被视为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一种监控机制, 是一项能够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以我国 2004 年—2008 年只发行 A 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的基础上, 检验审计质量、投资机会和可操控性应计的关系后发现: 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股东为监督公司的管理者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 同时, 投资机会越大的公司, 其可操控性应计越高, 即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高的审计风险; 而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和被诉讼的风险, 也有动机提高自身的审计质量, 从而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

[关键词] 投资机会; 审计风险; 审计质量; 可操控性应计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4-0046-08

一、引言

公司投资机会一直是财务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投资机会代表一个公司的投资或者成长机会的选择权, 而选择权是由管理者决定的, 这些选择权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1]。因此, 相比股东而言, 公司管理者能够获悉更多关于投资机会及其未来价值的信息。高投资机会公司需要管理者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做出决策, 这导致管理者行为更加难以被观察^[2]。在这种情况下, 管理者更有可能为了追求私利而产生“败德”行为, 因此具有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股东就更加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监督, 由公司投资机会而产生的监督问题便成为财务学界研究的热点。现有的研究大部分是从财务角度进行的, 而 Jensen(詹森)等认为审计可以被视为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一种监控机制, 是一项能够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3]。由于“深口袋”现象, 大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不会接受这些高投资机会客户^[4]。高投资机会公司更有可能选择“五大”会计师事务所, 而且“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更好地遏制高投资机会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5]。从我国目前的研究来看, 一些学者只研究了投资机会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 还未涉及审计与投资机会关系的研究。我国的法律环境与国外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 审计师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不相同, 并且自从 2002 年以来, 我国的法律制度环境有很大改变, 尤其是加大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和对注册会计师的惩戒力度。因此, 本文拟研究我国高投资机会公司是否具有选择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动机, 而会计师事务所是否能降低高投资机会公司的审计风险, 从而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是: 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列示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收稿日期] 2010-06-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630231); 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SQ11002)

[作者简介] 翟华云(1972—), 女, 湖北襄樊人,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博士, 从事资本市场财务、审计研究; 廖洪(1944—), 男, 湖南永州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审计与会计理论研究。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Myers(迈尔斯)等将因行使未来投资决策的选择权而形成的企业价值称为投资机会集。具有高投资机会的公司股东更加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监督^[6]。Jensen(詹森)认为债务支付可以减少管理者控制的资源,因此增加债务可以促使管理者合理使用公司资源^[7]。而Gaver(盖弗)等研究了公司的财务政策与投资机会的关系。他们发现,由于存在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问题,高投资机会的公司有更少的债务权益比率^[8]。Gul(格尔)利用日本上市公司1988年—1992年的数据分析投资机会与公司资本结构的关系后发现,公司的投资机会与公司的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9]。Jones(琼斯)等对澳大利亚1990年—1998年的上市公司进行了检验,但他们并没有发现高投资机会与低的负债权益比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1]。Simon(西蒙)等研究了香港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管理层持股与公司财务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高投资机会公司有着更低的负债水平和股利政策^[12]。Kam-Wah Lai(卡马沃莱)将审计质量与投资机会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高投资机会公司更加可能选择“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而且“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更好地遏制高投资机会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5]。

在我国关于公司投资机会的研究中,大部分是对公司投资机会的经济后果进行的研究,而对公司高投资机会所产生的监督问题则涉及较少。李小军、樊行健等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均与投资机会显著负相关。应计利润与企业成长性的正相关程度越强,应计异象越明显^[13-14]。张琴基于2005年沪深300个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经理自主度对企业投资机会集的影响效应^[15]。

综观国内研究,对公司高投资机会所产生的监督问题,学者们只是从管理层和负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而对审计如何监督公司高投资机会所产生的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并没有涉及。本文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研究审计质量与公司投资机会的关系,以期为外部审计作为一种监控机制来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

(二) 研究假设

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股东更加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由于存在资产替代和投资不足问题,高投资机会公司有更低的债务权益比率,并且由于交易成本和低价发行等原因,高投资机会公司会更多地选择使用内部资金而不会从资本市场筹资,也不太可能受到资本市场的监管。在这种情况下,高投资机会公司只能依赖其他的监管方法。作为一种监控机制,审计能够发挥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但是这种监控机制对于高投资机会公司是否适用值得探讨。由于投资机会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投资决策不可能总是达到最优,并且高投资机会公司的管理者很容易在事后为他们的决策辩解,这样审计作为监控机制的公信力会降低。尽管存在以上的争论,但是由于高投资机会的公司具有较弱的内部控制,这将使高投资机会的公司跟不上增长的步伐,这些公司可能会需要更高质量的审计^[4]。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证实,高质量审计能够更加准确地将内部的信号传递给外部投资者,外部投资者也更加信赖高质量审计所提供的公司信息。另外,审计质量还可以约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为监督高投资机会公司的管理者和增加投资者对高投资机会公司信息的信赖,股东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但是,高投资机会公司有较高的审计风险,由于“深口袋”现象,大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不会接受这些高投资机会客户,而会选择低投资机会客户。随着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制度的日臻完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为规避审计风险、维护自身声誉,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的审计客户^[16]。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司的投资机会和审计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高投资机会公司更有可能在不确定环境下经营,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使管理者在应计项目的估计

中有更大的自由度,又由于管理者行为不可观测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管理者的会计估计中有更多的可操控性应计。我国企业投资机会与盈余管理存在相关性,企业成长性越好,信息失真越严重;会计扭曲越严重,应计利润的持续性越差^[14]。因此,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高的审计风险^[17]。这种高风险给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为了保护他们的声誉资本,大会计师事务所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来降低高投资机会的审计风险。因此,聘请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高投资机会公司可能有更小的可操控性应计。自从2002年以来,我国的法律制度环境较过去有很大改变,不仅加大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而且同时也加大了对注册会计师的惩戒力度。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2年1月15日和2003年1月9日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加大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随着我国证券审计法律制度的日臻完善,“四大”、“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能够积极应对相应的审计风险^[16]。因此,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和被诉讼的风险,有动机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高投资机会公司,审计能够有效地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年—2008年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只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按以下标准对样本做了剔除:首先,剔除了金融和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其次,剔除无法完整获取相关数据的公司;再次,排除了当年上市的公司。最后,我们得到5542个样本观测值,其中2004年—2008年的样本观测值分别为1148、950、979、1208和1257个。

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均来自中国股市和财务研究数据库(CSMAR),审计师的聘用数据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二) 投资机会的代理变量

因投资机会很难用一个具体的财务指标来衡量,故本文参考Smith(史密斯)等的研究,选取4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公司的投资机会大小^[2,5,8,12]。这4个指标的定义如下:

$$MAS = \frac{\text{长期负债} + \text{权益的市场价值}}{\text{总资产}}; MEQ = \frac{\text{权益的市场价值}}{\text{权益}}; EP = \frac{\text{非经常性收益前每股收益}}{\text{年末收盘价}};$$

$$PPVR = \frac{\text{固定资产总值}}{\text{长期负债} + \text{权益的市场价值}}。$$

(三) 投资机会(DS)代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

表1列示了上面4个表示投资机会代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包括4个变量的中值、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其中相关性最大的是变量MAS和MEQ(0.837)以及变量MAS和PPVR(-0.683),而EP和PPVR(0.072)以及MEQ和EP(-0.092)相关性最弱。本文对以上4个代理变量用

表1 代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A:统计数据	MAS	MEQ	EP	PPVR
Mean	1.891	3.522	0.008	0.433
Median	1.352	1.848	0.018	0.292
Maximum	27.707	734.200	1.298	5.402
Minimum	0.619	0.273	-0.907	0.001
B:相关性矩阵	MAS	MEQ	EP	PPVR
MAS	1.000	0.837	-0.146	-0.683
MEQ	0.837	1.000	-0.092	-0.564
EP	-0.146	-0.092	1.000	0.072
PPVR	-0.683	-0.564	0.072	1.000

因子分析法分离出一个或几个彼此不相关且能反映原来4个代理变量大部分信息的公共因子,然后

用所得到的因子得分来表示企业的投资机会。

表 2 是用主成分法提出初等因子载荷矩阵并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从表 2 得知,前面三个主成分贡献率大于 81%, 所以我们提出主成分个数为 3 个。表 3 为各个因子的得分矩阵,从表 3 我们可以得到各个因子得分函数为:

$$Z_1 = -0.584MAQ + 0.011MEQ - 0.043EP + 0.692PPVR;$$

$$Z_2 = -0.263MAQ + 0.018MEQ + 0.910EP - 0.251PPVR;$$

$$Z_3 = 0.058MAQ + 0.995MEQ + 0.022EP + 0.065PPVR。$$

然后,我们利用公式 $Z = \frac{30.574Z_1 + 26.156Z_2 + 25.060Z_3}{81.790}$ 来计算综合因子得分,最后,我们用综合因子得分来表示投资机会(DS)。

(四) 检验模型和变量定义

为检验审计质量与公司投资机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构造了以下模型^[5]:

$$AQ = \alpha_0 + \alpha_1 DS + \alpha_2 CAPINT + \alpha_3 SALE + \alpha_4 LDEBTAT + \alpha_5 ISSUE + \alpha_6 LOSS + \alpha_7 LARGENI + \alpha_8 IND + \alpha_9 YEAR + \varepsilon \quad (1)$$

其中,因变量 AQ 为审计质量。经验研究中经常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来衡量审计质量^[18],因此本文也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来衡量审计质量。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前百家信息中的排名,该年度排名在前 14 位的会计师事务所^①为高质量的事务所,取值 1,反之为低质量的事务所,取值 0。

自变量 DS 为投资机会,我们选取 4 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公司的投资机会大小,然后对 MAS、MEQ、EP 和 PPVR 进行因子分析的得分来衡量公司投资机会。

我们选取固定资产比重、规模、财务杠杆、权益增长可能性、损失可能性以及净利润改变的可能性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5,19]。CAPINT 为固定资产占销售收入的比重;SALE 为销售收入的规模,对销售收入取自然对数得到;LDEBTAT 为长期负债的比重,用长期负债除以资产总额表示;ISSUE 表示权益增长的可能性,如果前一期的权益增长率大于 10%,取值 1,否则取值 0;LOSS 表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如果前一期净利润小于 0,取值 1,否则取值 0;LARGENI 表示净利润改变的可能性,如果净利润改变大于 10%,取值 1,否则取值 0;IND 和 YEAR 为行业和年度控制变量。

为检验高投资机会公司所聘请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可操控应计的抑制,我们构造如下模型:

$$ABADA = \beta_0 + \beta_1 DS + \beta_2 AQ + \beta_3 DS \times AQ + \beta_4 LEV + \beta_5 SIZE + \beta_6 CFLOW + \beta_7 ROA + \beta_8 IND + \beta_9 YEAR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因变量 ABADA 为可操控应计的绝对值,可操控应计利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通过对每一年每一个行业计算而来;自变量 DS 和 AQ 的定义如上;我们选取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经营活动现金

表 2 总方差的解释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1.254	31.340	31.340	1.223	30.574	30.574
2	1.019	25.466	56.806	1.046	26.156	56.730
3	0.999	24.983	81.790	1.002	25.060	81.790
4	0.728	18.210	100.000			

表 3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Component		
	1	2	3
MAS	-0.584	-0.263	0.058
MEQ	0.011	0.018	0.995
EP	-0.043	0.910	0.022
PPVR	0.692	-0.251	0.065

①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国内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

流量比重以及资产收益率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5,20]。LEV 表示长期债务权益比;SIZE 为公司规模,用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表示;CFLOW 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总资产的比值;ROA 为资产收益率;IND 和 YEAR 为行业和年度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4 是总体和根据审计质量分组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高审计质量样本为 1637 个,低审计质量样本为 3905 个。从表 4 可以看出,高审计质量公司的投资机会(DS)比低审计质量公司的投资机会(DS)均值高,而且在 0.01 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高审计质量公司的固定资产占销售收入的比重(CAPINT)比低审计质量公司的要低,并且在 0.01 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高审计质量公司的销售收入和权益增长的可能性要显著地高于低审计质量公司;另外,高审计质量公司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低审计质量公司。

(二) 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 5 是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对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1)中的投资机会(DS)与审计质量(AQ)之间的系数在 0.01 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司投资机会越高,审计质量越高,即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股东为监督公司的管理者,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从而支持了假设 1。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高投资机会的管理者更有可能为了追求私利而产生“败德”行为,具有高投资机会的公司股东更加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监督,而高质量审计不仅能够更加准确地将内部的信号传递给外部投资者,而且审计质量还可以约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股东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表 5 的(2)是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投资机会(DS)与审计质量(AQ)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它们之间的回归系数在 0.05 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也表明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股东为监督公司的管理者,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从而再一次验证了假设 1。

表 6 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对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表 6 的(1)、(2)和(3)中投资机会

表 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AQ = 0	AQ = 1	ALL	T 值
	N = 3905	N = 1637	N = 5542	
DS	0.0051 (0.0768)	0.0145 (0.0755)	0.0081 (0.0772)	4.1551***
CAPINT	0.8585 (3.4342)	0.6338 (0.7712)	0.7914 (2.9084)	2.5909***
SALE	20.6277 (1.2748)	21.0926 (1.3284)	20.7665 (1.3083)	12.0692***
LDEBTAT	0.0786 (0.0986)	0.0808 (0.1017)	0.0792 (0.0996)	0.7574
ISSUE	0.3581 (0.4795)	0.4782 (0.4997)	0.3939 (0.4887)	8.2834***
LOSS	0.1889 (0.3916)	0.1461 (0.3533)	0.1762 (0.3810)	3.7815***
LARGENI	0.8604 (0.3466)	0.8577 (0.3495)	0.8596 (0.3474)	0.2673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1、0.05 和 0.1 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

表 5 模型(1)的回归结果

	总样本		删除“四大”后样本	
	(1)	(2)	(3)	(4)
C	0.296*** (47.182)	0.259*** (14.013)	0.277*** (44.464)	0.121*** (13.457)
DS	0.339*** (4.155)	0.174** (2.033)	0.257*** (3.185)	0.121** (1.988)
CAPINT		-0.004** (-1.986)		-0.004* (-1.913)
SALE		0.051*** (9.854)		0.048*** (8.534)
LDEBTAT		0.029 (0.463)		-0.017 (-0.271)
ISSUE		0.094*** (7.136)		0.081*** (6.108)
LOSS		-0.026 (-1.505)		-0.021 (-1.253)
LARGENI		0.007 (0.406)		0.008 (0.466)
IND and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 R ²	0.221	0.151	0.134	0.110
F 值	17.265	13.641	10.147	9.646
N	5542		5395	

注:***、**和*分别表示在 0.01、0.05 和 0.1 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

(DS)与可操控性应计(ABADA)的系数在0.0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投资机会越大的公司,其可操控性应计(ABADA)越高,即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高的审计风险;而审计质量(AQ)与可操控性应计(ABADA)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高审计质量能够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表6的(2)中投资机会与审计质量的交互项(DS×AQ)的回归系数在0.0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在高投资机会公司中,高审计质量能够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也就是说,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和被诉讼的风险,有动机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假设2得到证实。表6的(3)为控制了相关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资机会与审计质量的交互项(DS×AQ)的回归系数在0.0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再一次验证了假设2。

表6 模型(2)的回归结果

	总样本				删除“四大”后样本			
	(1)	(2)	(3)	(4)	(5)	(6)	(7)	(8)
C	0.064*** (27.818)	0.064*** (25.431)	0.164*** (5.059)	0.153*** (5.275)	0.063*** (27.909)	0.062*** (25.705)	0.061*** (5.705)	0.054*** (4.873)
DS	0.011*** (11.985)	0.010*** (11.897)	0.007*** (8.140)	0.008*** (9.057)	0.009*** (9.416)	0.009*** (9.181)	0.007*** (7.216)	0.006*** (6.543)
AQ		-0.001* (-1.804)	-0.001* (-1.851)	-0.001* (-1.756)		-0.002** (-2.056)	-0.001* (-1.835)	-0.001* (-1.936)
DS×AQ		-0.093*** (-4.368)	-0.169*** (-8.224)	-0.146*** (-7.541)		-0.002** (-2.023)	-0.058* (-1.719)	-0.054* (-1.821)
LEV			0.001 (0.481)	0.001 (0.572)			-0.001 (-0.281)	0.001 (0.527)
SIZE			-0.005*** (-3.242)	-0.006*** (-2.947)			-0.004** (-2.123)	-0.003** (-2.094)
CFLOW			0.064*** (7.292)	0.059*** (7.852)			0.018** (2.024)	0.017** (2.053)
ROA			0.185*** (24.686)	0.192*** (22.371)			0.134*** (16.253)	0.146*** (15.375)
IMR				0.004** (2.078)				0.003** (2.097)
IND and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usted R ²	0.25	0.29	0.25	0.24	0.27	0.27	0.29	0.31
F值	143.646	54.406	113.073	115.712	88.664	30.491	70.039	75.386
N		5542				5395		

注:***、**和*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

(三) 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的结果

在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十大”与非“十大”及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选择行为存在显著差异^[16]。因此,为了验证国际“四大”以及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投资机会以及可操控应计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对模型(1)和(2)再次进行了回归,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有5395家公司,回归结果见表5和表6。从表5的(3)和(4)的回归结果看,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没有太大变化,各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表6的(5)、(6)和(7)的结果显示,选聘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有效减少高投资机会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这说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会对上述检验结果造成偏差。

(四) 样本自选择问题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内生性会使样本存在潜在的自选择问题,这使上述结果不可靠。我们采用两阶段回归方法,第一阶段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模型(3)进行Probit回归,然后计算出IMR,并将

probit 模型回归后计算得到的 IMR(作为第二阶段回归的控制变量)对模型(2)进行回归^[5,21-22],即:

$$AQ = \kappa_0 + \kappa_1 SIZE + \kappa_2 ROE + \kappa_3 LOSS + \kappa_4 LEV + \kappa_5 MF + \kappa_6 ISSUE + \kappa_7 HERF5 + \kappa_8 INDM + \sum \delta' INDU + \sum \theta' YEAR + \eta_i \quad (3)$$

其中,INDU 和 YEAR 为行业哑变量以及年度哑变量;SIZE 为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取对数表示;ROE 为公司净资产报酬率;LOSS 表示公司是否陷于财务困境,若前期净利润小于 0,取值为 1,否则为 0;LEV 代表财务风险,用资产负债率表示;MF 表示公司的代理成本,用管理费用除以期初总资产衡量;ISSUE 代表公司是否进行增发配股,当公司当年存在增发配股行为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HERF5 为前五大股东的赫芬达尔指数;INDM 为公司所处的地区治理环境。表 6 的(4)和(8)的 IMR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有必要对自选择问题进行控制。表 6 的(4)和(8)的结果也表明,在控制自选择后,我们上述的研究结论不变。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审计是一项制度安排,它不仅可以帮助解决公司代理问题,而且还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以我国 2004 年—2008 年只发行 A 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的基础上,检验审计质量、投资机会和可操控性应计的关系。结果发现,高投资机会公司股东为监督公司的管理者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同时,投资机会越大的公司,其可操控性应计越高,即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高的审计风险;而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和被诉讼的风险,也有动机提高自身的审计质量,从而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

本文为我国外部审计是否能够监督公司管理者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审计质量与投资机会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而为通过提高外部审计质量来监督高投资机会公司的管理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本文的结论还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加强审计监管、提高审计质量以及完善各地区的法律环境,是监督高投资机会管理者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 [1] Myers S 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7,5(2): 147-175.
- [2] Smith Jr C W, Watts R L.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dividend and compensation polic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2,32(3):263-292.
- [3]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3(4):305-360.
- [4] Tsui J S L, Jaggi B, Gul F A. CEO domination, growth opportun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audit fe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 2001,16(3):189-208.
- [5] Kam-Wah Lai. Does audit quality matter more for firms with high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9,28(1):33-50.
- [6] Myers S C, Majluf N S.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13(2):187-221.
- [7] Jensen M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2):323-329.
- [8] Gaver J J, Gaver K M. Additional evidence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dividend and compensation polici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3,16(1):125-160.
- [9] Gul F A. Growth opportunities, capital structure and dividend policies in Japan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 1999,5(2):141-168.
- [10] Gul F A, Kealey B T. Chaebol,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corporate debt and dividend policies of Korean companies [J].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1999,13(4):401-416.
- [11] Jones S, Sharma 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dividend decisions: some Australian evidence[J]. *Managerial Finance*, 2001,27(3):48-63.
- [12] Simon S M H, Kevin C K L, Heibatollah S.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 director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policie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4,10(3):383-408.
- [13] 李小军,王平心. 投资机会与股权结构对公司财务政策的影响[J]. *系统工程*,2008(6):37-44.
- [14] 樊行健,刘浩,郭文博. 中国资本市场应计异象问题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全新视角[J]. *金融研究*, 2009(5):141-155.
- [15] 张琴. 经理自主度对投资机会集影响的实证研究[D]. 重庆大学博士论文,2007.
- [16] 廖义刚,孙俊奇,陈燕. 法律责任、审计风险与事务所客户选择——基于1996年—2006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客户风险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5):34-40.
- [17] Chung H, Kallapur S. Client importance, non-audit services and abnormal accrual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78(4):931-955.
- [18] 吴水澎,李奇凤. 国际四大、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J]. *当代财经*,2006(2):114-118.
- [19] 王艳艳,陈汉文,于李胜. 代理冲突与高质量审计需求——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经济科学*,2006(2):72-82.
- [20] Kothari S P, Leone A J, Wasley C E. Performance matched discretionary accrual measur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39(1):163-197.
- [21] Chaney P K, Jeter D C, Shivakumar L. Self-selection of auditors and audit pricing in private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79(1):51-72
- [22] 王鹏,周黎安. 中国上市公司外部审计的选择及其治理效应[J]. *中国会计评论*, 2006(2):321-344.

[责任编辑:马志娟]

A Research o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udit Risk and Auditing Quality

ZHAI Huayun¹, LIAO Hong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uditing is a bonding device of the managers that they will not behave opportunisticall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of A share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4-2008,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ing quality,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level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based on the controlling self-selection bias. It is found that shareholders have an incentive selection of high quality audit in order to supervise managers in the company of high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addition, the greater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of companies is, the higher discretionary accruals can be, That is, the CPA is facing a higher risk in the company of high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reduce audit risk and litigation risk, the CPAs also have an incentive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audit, thus preventing the discretionary accruals of the audited company.

Key Word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udit risk; auditing quality; discretionary accruals

应诉反倾销的会计举证资料管理平台构建研究

韩庆兰

(中南大学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采用XBRL技术,以现有ERP系统资源为基础,通过数据转换模块将会计数据和相关资料进行整合,以提供反倾销应诉者需求的会计举证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追溯其来源,动态再现相关的明细数据,更适合成本的追溯。这一做法解决了ERP系统与会计举证资料管理平台之间的数据转换和有效传递,实现了会计数据与相关业务数据的“同源”管理和“分流”使用。

[关键词]应诉反倾销;会计举证资料;数据采集模板

[中图分类号]F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4-0054-06

美国是世界上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最早和最多的国家。随着中美两国贸易规模的发展和贸易结构的不断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在2009年快速增加。然而,目前我国的反倾销案中仍有1/4的案件无企业应诉,起诉方即可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利用对其更有利的数据判定我国反倾销成立,迫使我国企业退出该国市场^[1]。同时,由于受市场经济地位歧视的影响,我国被裁定的反倾销税率也是世界最高的^[2],由此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如何应诉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企业界和会计界必须重视的问题。虽然应诉反倾销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如果应诉方能及时提供清晰准确且令起诉方信服的会计资料,则是应诉方胜诉的关键。因为不论是价格倾销还是成本倾销,产品的成本计算都将直接影响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乃至最终确定倾销是否存在^[3]。因此,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系统资源,构建支持企业应诉反倾销的会计举证资料管理平台是非常必要的。

一、应诉反倾销的会计举证资料分析

(一) 反倾销调查问卷分析

以应诉美国为例,应诉反倾销所需的会计举证资料主要来自问卷内容。问卷共有4~5个部分,分别是A、B、C、D,有时还有E部分^[4]。由于A、C、D部分内容是相互制约的,只有分析问卷所包含的会计方面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计算关系,才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

调查问卷A主要涉及公司的结构与关联方、分配程序、销售程序、会计和财务实践以及被调查产品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用来确定出口国政府是否通过法律或在事实上对企业的会计事项进行控制,以证明会计数据的公允和可信,目的是确定选择替代国。

[收稿日期]2010-07-10

[作者简介]韩庆兰(1954—),女,河北石家庄人,中南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会计信息管理、现代成本管理、信息技术在会计领域的应用研究。

调查问卷 B 涉及公司相同或相似产品(即与被调查的目标产品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在出口国或第三国市场的详细销售资料。调查问卷 C 与调查问卷 B 类似,但内容主要涉及在美国的销售资料。调查问卷 D 涉及国外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成本。

分析调查问卷的内容构成,是为了了解其目的导向。调查问卷 A 的目的是确定选用替代国,调查问卷 B 的目的是确定出口国市场价格,调查问卷 C 的目的是确定出口价格(或结构出口价格),调查问卷 D 和调查问卷 E 的目的是确定需要加以调整的各项差别费用或事项,以使各有关项目具有可比性,认定生产要素以供适用替代国价格与适当的价格比较。

应诉企业应准确解读问卷中的会计问题,收集、整理会计举证所需要的相关材料。为了满足应诉企业解读调查问卷中会计问题的需要,本文将问卷中的会计内容归纳为式(1)所示的类型:

$$\text{会计举证资料的分类} \left\{ \begin{array}{l} \text{子类 1: 企业的一般情况} \\ \text{子类 2: 国内市场和第三国市场的销售情况} \\ \text{子类 3: 向起诉国销售情况} \\ \text{子类 4: 生产要素方面情况} \end{array} \right. \quad (1)$$

(二) 会计举证资料的分解

细化每一子类,将其分解为如式(2)所示的分项信息:

$$\begin{array}{l} \text{类/结构} \quad \text{项目 1} \quad \text{项目 2} \quad \text{项目 3} \quad \text{项目 4} \quad \dots \text{项目 } i \\ \left\{ \begin{array}{l} \text{子类 1 | 公司基本情况、内部机构人员、财务会计状况、产品情况、销售情况} \\ \text{子类 2 | 销售对象、销售价格、销售费用} \dots \text{价格减让和佣金} \dots \\ \text{子类 3 | 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出口费用、销售条件费用} \dots \text{付款情况} \\ \text{子类 4 | 生产要素、生产工序、产品情况、产品包装情况} \end{array} \right. \quad (2) \end{array}$$

每个项目还可继续向下分解,如生产要素可分为原材料名称、数量、价格、所需要的人工和工时总数、能源及其数量、机器设备及其折旧。按照此原则逐项分解调查问卷所需的会计举证资料,可追溯到具体的数据项。分析产生数据的源头,便可确定所需数据在现有 ERP 系统中的数据库表。

(三) 数据的提取与计算调整

由于我国会计成本构成及其要素的确认和计量与应诉反倾销所需资料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从 ERP 系统中提取出来的数据需要按照举证资料的要求进行重新组合或重新计算,如三项费用的核算。反倾销法中的产品成本包括销售费、管理费和一般费用,而我国会计实务中也进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核算,但是这三项费用的核算对象是整个会计主体,而不是针对具体产品,包含的内容也与反倾销法中所规定的包含在产品成本中的内容不一致。

从成本核算方法来看,我国制造业的成本核算采用的是完全成本法,制造费用没有按其与产品的关系再次划分为变动性制造费用和固定性制造费用;而反倾销法中的成本核算采用的是变动成本法,它要求企业细化成本项目,将制造费用按照能否直接归属于某批产品成本而进一步划分为变动性和固定性两类。诸如此类问题本文不再展开分析,详情见相关文献^[5-6]。

对举证资料的分析就是要解决问卷中数据之间的关系,以便为建立信息模型、定义数据采集模板提供准确的依据。

二、研究方案

(一) 研究目标:实现“同源”管理和“分流”使用

建立以企业 ERP 业务模块数据库为起点,以应诉反倾销举证资料为目标导向,以 XBRL 为技术支撑,以会计科目、会计账簿、分录信息或分录明细三个层次为分类标准的会计信息管理平台,可以解决企业应诉反倾销会计举证信息提取的难题,实现企业数据的“同源”管理和“分流”使用。“同源”

管理指应诉反倾销所需资料与企业其他产品资料按产生源统一管理,增加数据的可信度及数据之间的一致性,能够经得起调查机构的实地考察。“分流”使用是通过信息平台按不同的需求提取使用信息,以提高信息的共享程度和使用效率。

(二) 研究的基本步骤

第一步,以应诉反倾销调查对会计举证的信息需求为驱动因素,填写调查表,建立需求信息模型。第二步,分析确定应诉反倾销填写调查问卷所需要的数据及这些数据元素间的关系,以确定数据采集模板的定义。第三步,集成各数据模板所生成的实例文档,按照需求通过信息管理平台反馈给使用者。研究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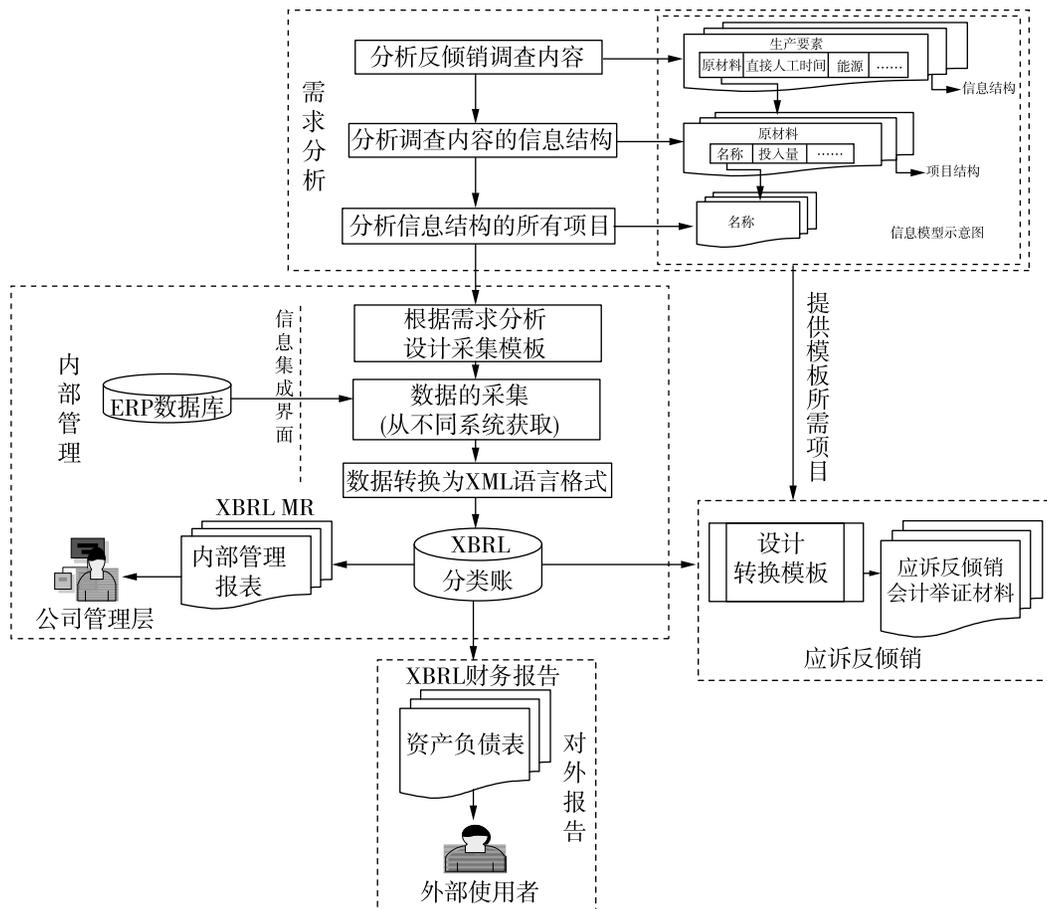


图1 信息管理平台的研究过程

三、研究方案的实现过程

(一) 建立信息模型

首先,分析需求信息,确定信息结构。应诉反倾销所需要的会计举证资料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详细,还要经得起实地考证。因此,应诉企业必须对各类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归纳分析不同的需求,设计面向需求的信息结构,分析信息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以确定包含所有信息结构及其相互间逻辑关系的集合,完成需求信息的信息模型设计。信息结构模型可以参照会计举证资料的分类(1)建立。

其次,分析信息结构的项目,确定项目的逻辑关系。信息结构是由多个信息项目构成,而信息项目之间可能存在包含关系或组合关系,所以应诉企业需要确定信息结构中的项目以及项目之间的逻辑

辑关系。信息结构与信息项目之间的关系可根据式(2)归纳出一般表达式,即如式(3)所示:

$$\left\{ \begin{array}{l} \text{信息结构 1} \{ \text{项目 1(1)}, \text{项目 1(2)} \cdots \cdots \text{项目 1(m)} \} \\ \cdots \cdots \\ \cdots \cdots \\ \text{信息结构 } i \{ \text{项目 } i(1), \text{项目 } i(2) \cdots \cdots \text{项目 } i(k) \} \end{array} \right. \quad (3)$$

再次,将项目分解为基本数据项。根据项目的逻辑关系即层次关系、组合关系、计算关系,将其分解为基本数据项,并为每个基本数据项定义标签。它是构成信息项目的基础,也是对数据进行分类的依据。最底层的数据项定义之后,按其逻辑关系构成组合项的定义,如式(4)所示。

$$\text{项目 } i(x) = \{ \text{数据项 1}, \text{数据项 2} \cdots \cdots \text{数据项 } n \} \quad (n \geq 1) \quad (4)$$

基本数据项、信息项目、信息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信息的层次结构模型。

(二) 实现数据的提取与

转换的原理

按照图2对信息需求模型进行分解,定义分级数据采集模板。信息结构为一级模板,信息项目为二级模板。二级模板链接数据源(基本数据项),而组成项目的基本数据项则来源于不同的业务模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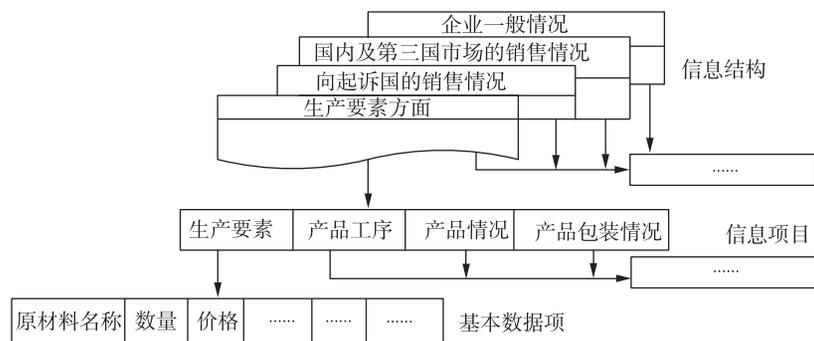


图2 信息需求模型

因此,应诉企业需要对众多数据源进行采集。根据数据模板采集的数据,实现自底向上组织信息,生成符合信息结构要求的最终信息。保证申诉方提供的举证资料经得起实地核查,以验证应诉方所提交的答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因此,数据必须能够追溯到原始数据,这既可以自顶向下追溯分解,又可以自底向上抽取、组织计算。

二级采集模板的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链接库是数据采集模板中定义的概念与XBRL分类账链接的桥梁。根据数据模板要求,通过软件(如Altova XML Spy)直接从原始数据库(ERP系统)中调取数据转换为XML语言的格式(数据转换的操作步骤在此省略)^[7]。XML格式信息是经过标记的信息,即每一条事件信息的每一元素都必须经过XML标签的标记。该标记是搜索提取、重新组织、分析处理与再生的依据,这是实现数据追溯和重新组织的重要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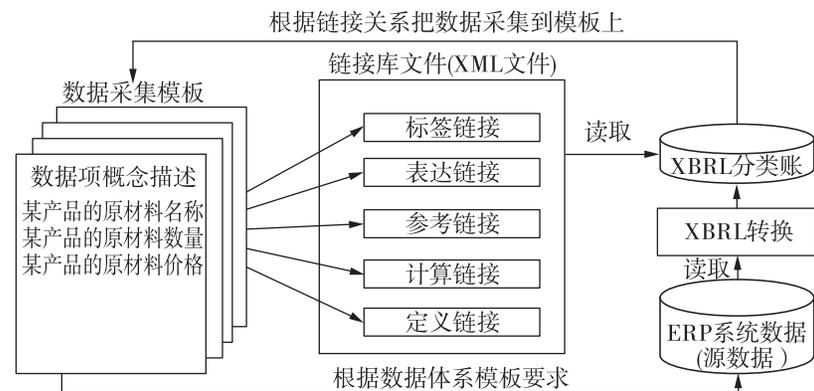


图3 数据采集模板描述示意

根据XBRL GL的分类标准(Taxonomy)从XML库中抽取数据、校验并转换为XBRL GL库文件^[8]。尽管XML格式的文件经过XML Schema的校验,但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检验元素值间的关系。XBRL通过链接库不仅定义了元素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定义元素内容的精度,所以在转换过程中XML文件还需经过相关校验,符合条件的才可以转换为XBRL GL格式文件^[9]。这个过程也可正向

转换,也可逆向追溯到 XML 信息,而 XML 信息又可以通过标记追溯到源数据。

(三) 数据采集的实现过程

数据采集是通过在源数据和模板之间的数据采集模块来完成的。实现过程包括两个主要步骤。

1. 将企业 ERP 系统的数据库数据转换到 XML 文件

通过相应软件(如 Altova XML Spy)直接从原始数据库中调取数据转换为 XML 语言的格式。

(1) 打开 Altova XML Spy,选择图 4 中转换菜单下的导入数据库数据,出现图 5 转换方式选择。

(2) 选择原始数据库,在图 6 的原始数据库中选择与 ERP 系统相匹配的数据库,如 SQL Server。

(3) 构建 ADO 连接,在图 7 中单击构建按钮,建立链接数据库的“连接串”。

(4) 选择数据源所对应的数据库表,从 ERP 系统中选择要提取数据的数据库表,按照定义给出的需求信息与“源数据”之间的准确链接关系选择对应的表名,如收料通知单、销售发票等。

2. 将 XML 格式文件转换为 XBRL GL

XBRL 分类标准是一组 XML 文件,用于定义展现信息中涉及的数据项及这些数据项之间的关系,用于规范实例文件的制作及校验。它包括模式定义文件(Schema)和链接库,其中模式定义文件定义数据项名称、ID 属性、元素类型等属性,链接库则定义数据项间的各类关系。

XBRL GL 文件起到联系原始数据和最终需求信息的作用。ERP 系统的原始记录是 XBRL GL 的数据源,而 XBRL GL 是最终信息的信息来源。将会计资料转成 XBRL GL 文件后,会计资料将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系统转至另一个系统。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省略 XBRL 文件源代码的编写,只将部分结果展示。如图 8(见下页)所示,每个页签对应一个数据采集模板,采集部分数据,实现向上逐层汇总。

四、结语

本文针对出口企业目前迫切需要应诉反倾销会计信息支持这一问题,结合企业内、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采用 XBRL 技术,将现有系统资源进行优化整合,解决系统之间的数据转换和有效传递,实现二者数据的便捷共享和高效使用。这不仅可满足内部管理者的个性化要求,而且可以通过建立不同的数据转换模块将会计数据和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完成反倾销应诉的会计资料举证。这些资料不是抽象的汇总数据,而是可以追溯其来源、动态再现相关的明细数据,更适合成本的追溯。本文既考虑了构建平台体系结构的前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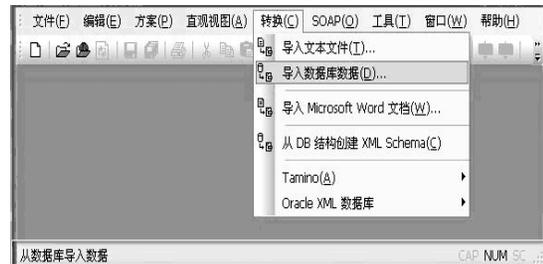


图 4 从数据库导入数据(选择导入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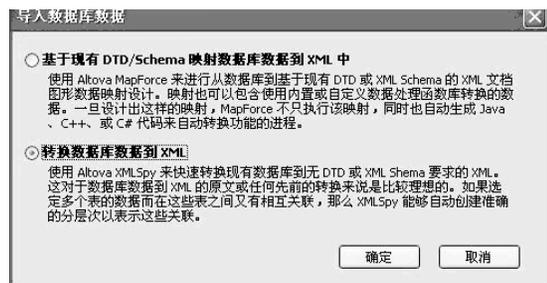


图 5 转换数据库数据到 XML 文件



图 6 选择数据库



图 7 建立“连接串”

性,实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以及应用的经济性,同时又保证了各问卷数据之间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孙铮,刘浩.反倾销会计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辨析[J].会计研究,2005(1):67-76.
 [2]冯巧根.反倾销应诉中的会计问题探讨[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28(147):41-45.
 [3]周友梅.应诉反倾销:中国产品正常价值确定的会计举证[J].对外经贸财会,2004(4):5-8.
 [4]周友梅.美国商务部反倾销调查问卷中会计问题的解读与填答[J].财务与会计,2004(7):53-55.
 [5]袁磊.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会计问题研究——基于调查问卷和案例的会计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
 [6]任勇.论反倾销调查倾销幅度计算中的价格调整[D].博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7]周从军.XML程序设计[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
 [8]韩庆兰,蔡苗.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体系研究综述[J].财会月刊,2008(27):57-58.
 [9]韩庆兰,蔡苗.XBRL分类标准理论研究[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3):34-38.

生产要素XBRL实例文档在线浏览演示

生产要素 生产工序 产品情况 产品包装

材料名称	用量(kg)	单价	总价
氟铂酸钾	1400	445.4	623500
拉丝油	9.5	748.8	7114
高效除油剂	30	134.1	4023
氯化钠	556	4.1	2280
液体钠	98	13.6	1334
塑料软管	171	6.4	1097
盐酸	65	12.8	831
包装物	332	1.6	542
真空泵油	37	12.4	460
			41181

注:因数据是真实产品的成本,故不能全部展示。

图8 生产要素部分数据采集实例

[责任编辑:高婷]

A Research on Accounting Adduc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for Anti-Dumping Responding

HAN Qinglan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the accounting data required for enterprises' responding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on the basis of XBRL technology,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accounting data and related data and achiev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the accounting data required for the enterprises facing the responding to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user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ERP system resource through the data conversion module. These data can be traced back to its origin, and reproduce dynamically the details related to data, and so they can be more suitable for the track of cost. This can solve the conversion and th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of data between the ERP system and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platform, and realizes the "homology" management and "difffluence" use of data.

Key Words: responding to anti-dumping; evidenc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ata collection template

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

刘 斌¹, 吴娅玲²

(1.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2. 重庆工商大学 会计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选取2001年—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价值。实证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无效率水平以及投资过度(不足)都显著负相关,这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会计稳健性水平有助于缓解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行为,进而改善公司的资本投资效率。

[关键词]会计稳健性;投资效率;投资过度;投资不足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4-0060-09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原则又称谨慎性原则。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稳健性原则是指企业对交易或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低估负债或费用。我国新会计准则对会计稳健性也提出了要求,如在备抵项目的计提、债务重组的会计政策、收入确认的标准、无形资产的处理、或有事项的处理等方面都有更为谨慎的规定。作为降低企业潜在诉讼成本、契约成本以及政治成本的一项治理机制,会计稳健性可以协调公司内部各契约参与方利益冲突,保证契约有效执行,减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契约各方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1]。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侧重于将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属性的研究(如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性以及影响因素方面),而缺乏对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价值研究^[2-7]。本文通过研究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来检验会计稳健性是否影响公司资本的投资效率,进而考察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价值,为认识和理解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价值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资本市场不存在缺陷和公司内部不存在代理成本的理想世界中,公司的投资可以达到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最优水平。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公司的投资却并非都是有效率的。一方面,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引起的代理问题,管理者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进行过度投资,将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滥用于净现值为负的项目^[8];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市场摩擦,影响公司外部融资成本,容易导致受流动性约束的公司出现投资不足^[9-12]。我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然而,会计稳健性可以降低契约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投资^[13]。如果企业选择稳健的会计政策,管理者需要在任职期内及时确认投资项目的亏损,无法将责任推卸给下任管理者,那么在任管理者就很可能不会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此外,根据会计稳健性的要求,在预计未来现金

[收稿日期]2010-07-15

[作者简介]刘斌(1962—),男,重庆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吴娅玲(1975—),女,四川简阳人,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博士,从事财务会计理论研究。

流入减少时,企业要以计提减值准备或应计负债等方式在财务报表中确认,这样管理者就可能尽快地从亏损项目中撤出资金,防止当期利润下降。也就是说,采用稳健会计政策的企业会更多地拒绝差的投资项目,而将更多的资本投资于盈利的净现值项目中,同时会更早地从亏损项目中撤资^[14]。Biddle(比德尔)和 Hilary(希拉里)通过检验财务报告质量和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减少经理层与外部资本供给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资本的投资效率^[15]。此外,Bushman(布什曼)和 Piotroski(彼得罗夫斯基)从国家横截面角度检验了稳健的财务报告体制对经理投资决策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稳健的财务报告体制下,经理对投资机会下降做出反应的速度更快^[16]。可见,稳健的会计政策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减少企业股东与经理层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公司资本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假设 1:会计稳健性水平可以改善公司资本的投资效率,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会计稳健性水平与公司资本投资无效率水平负相关。

稳健的会计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会计稳健性有助于降低公司面临的代理成本。当公司面临投资过度的情况时,会计稳健性对公司的投资水平起到抑制作用。因为当投资项目有利于经理获得私人收益时,经理可能接受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由此损害股权投资者利益^[17]。Ball(鲍尔)等认为会计稳健性不仅是一项重要的财务报告质量属性,而且也是一项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8]。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缓解经理层与股权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Ahmed(阿曼)和 Duellman(迪尤尔曼)的实证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可以减少经理层接受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的事先动机^[19]。稳健会计政策的采用使公司经理层面临更高的违约风险,增强经理层声誉受损、报酬降低、被董事会解雇或公司被接管的可能性,增加经理层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减弱股权投资者与经理层的委托代理冲突;同时,由于会计盈余中包括了因稳健性而确认的损失,投资者能够及时获知经理层经营决策中发生亏损的信息,从而能及时地制止经理层由过度投资所带来的代理成本^[11]。可见,会计稳健性可以降低拥有较多信息的经理层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抑制经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过度的投资。另一方面,会计稳健性有助于降低公司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当公司面临投资不足的情况时,会计稳健性对公司的投资水平起到推动作用。McNichols(麦克尼科尔斯)和 Stubben(斯塔布斯)认为,公司管理人员的盈余管理本身会“掩盖”公司真实的收入和盈余增长潜力,这使得投资者无法形成有效的盈余增长预期,而会计稳健性可以减少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改善事后的投资效率^[20]。Lafond(拉丰)和 Watts(沃特斯)的实证研究发现,经理层和股权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稳健性产生了需求,因而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经理层操纵会计数字的动机和能力,并减轻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21]。此外,Ahmed(阿曼)等的研究表明,在控制公司债务成本的其他决定因素后,会计稳健性可以起到减轻债权投资者和股权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降低公司债务成本的重要作用^[22]。Zhang(张)研究发现,采用稳健会计政策的公司更容易触犯债务契约条款,从而能够更好地保护债权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公司也可以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23]。可见,稳健的会计政策可以帮助公司有效降低融资成本,能增加公司投资盈利的净现值项目的机会。尤其对负债率较高或受现金流约束较大的公司通过稳健的会计政策可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公司的投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其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见,稳健的会计政策能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1a 和假设 1b。

假设 1a:会计稳健性有助于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会计稳健性水平与公司过度投资水平负相关。

假设 1b:会计稳健性有助于抑制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会计稳健性水平与公司投资不足水平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以 Basu(巴苏)盈余-股票收益关系模型为基础,借鉴 Khan(卡恩)和 Watts(沃特斯)的研究方法,引用工具变量构建模型来估算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水平。第二步,借鉴 Richardson(理查森)模型,估算公司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然后用公司实际的资本投资水平与估算的资本投资水平之差(即回归残差)代表公司资本投资的无效率程度,分别用残差大于0和残差小于0代表企业的投资过度程度和投资不足程度^[24-26]。第三步,分别采用估算得到的公司资本投资的无效率程度、投资过度程度和投资不足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估算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若干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以考察会计稳健性水平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

(一) 会计稳健性水平的估算

巴苏运用下面的盈余-股票收益关系模型来度量会计稳健性。

$$\frac{EPS_{it}}{P_{it-1}} = \beta_1 + \beta_2 DR_{it} + \beta_3 R_{it} + \beta_4 DR_{it} * 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EPS_{it} 为*i*公司*t*年度的每股盈余; P_{it-1} 为*i*公司*t-1*年度末的收盘价; R_{it} 为*i*公司*t*年度的股票收益率; DR_{it} 为虚拟变量,当 $R_{it} < 0$ 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该模型使用股票年度收益率作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代理变量,负的股票年度收益率表示经济损失,即“坏消息”;正的股票年度收益率表示经济利得,即“好消息”。在模型(1)中, β_2 度量会计盈余确认“好消息”的及时性, β_3 度量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的及时性。因此, β_4 度量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相对于确认“好消息”的增量及时性。由于稳健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对“好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充分,本文通过检验 β_4 是否显著大于0来判断会计盈余是否稳健。

卡恩和沃特斯对巴苏模型进行了拓展,选择公司规模(SIZE)、负债率(LEV)和市值与账面价值比率(MB)作为工具变量,设计出度量公司/年的稳健性指标。他们假定非对称及时性是上述三个工具变量的线性函数,用*G-Score*表示盈余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用*C-Score*表示盈余对“坏消息”反应的增量程度,两个系数分别变为:

$$G\text{-Score} = \beta_3 = \mu_1 + \mu_2 SIZE_{it} + \mu_3 LEV_{it} + \mu_4 MB_{it} \quad (2)$$

$$C\text{-Score} = \beta_4 = \lambda_1 + \lambda_2 SIZE_{it} + \lambda_3 LEV_{it} + \lambda_4 MB_{it} \quad (3)$$

将(2)式和(3)式代入(1)式,可得到用于估算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模型,这一模型为:

$$\frac{EPS_{it}}{P_{it-1}} = \beta_1 + \beta_2 DR_{it} + (\mu_1 + \mu_2 SIZE_{it} + \mu_3 LEV_{it} + \mu_4 MB_{it}) * R_{it} + (\lambda_1 + \lambda_2 SIZE_{it} + \lambda_3 LEV_{it} + \lambda_4 MB_{it}) * DR_{it} * 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4)$$

运用上述模型,采用年度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可以估计出 $\mu_1, \mu_2, \mu_3, \mu_4$ 以及 $\lambda_1, \lambda_2, \lambda_3, \lambda_4$ 。然后,将 $\lambda_1, \lambda_2, \lambda_3, \lambda_4$ 估计系数再代入(3)式,估算出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程度。

(二) 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估算

理查森通过模型估算出企业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然后用该模型的回归残差作为投资过度 and 投资不足的代理变量,考察了自由现金流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26]。本文借鉴该模型来估算我国上市公司资本投资的无效率水平以及投资过度(不足)程度。上市公司正常的资本投资水平估计模型如下:

$$INV_{it} = \alpha_0 + \alpha_1 GROWTH_{it-1} + \alpha_2 LEV_{it-1} + \alpha_3 CASH_{it-1} + \alpha_4 SIZE_{it-1} + \alpha_5 RET_{it-1} + \alpha_6 INV_{it-1} + \sum INDUSTRY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INV_{it} 为*i*公司*t*年度的资本投资水平,用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现金数

除以期初总资产表示; $GROWTH_{i,t-1}$ 为*i*公司*t*-1年度的增长机会,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示; $LEV_{i,t-1}$ 为*i*公司*t*-1年度资产负债率; $CASH_{i,t-1}$ 用*i*公司*t*-1年度公司现金余额除以总资产表示; $SIZE_{i,t-1}$ 为*i*公司*t*-1年度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RET_{i,t-1}$ 为*i*公司*t*-1年度股票年度收益率,并用市场年度收益率进行调整; $INV_{i,t-1}$ 为*i*公司*t*-1年度的资本投资水平; $\Sigma INDUSTRY$ 为行业虚拟变量,行业按证监会的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共选取20个行业虚拟变量; $\Sigma YEAR$ 为年度虚拟变量,控制不同年份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模型(5)回归残差表示公司资本投资的无效率程度,取其绝对值后用符号 INV_Resid 表示。如果模型(5)回归残差大于0,则其值为投资过度,用符号 $Over_INV$ 表示,相反则为投资不足,用符号 $Under_INV$ 表示。为了便于理解和解释,本文将 $Under_INV$ 取绝对值。因此, INV_Resid 越大,表明上市公司资本投资效率越低; $Over_INV$ 越大,表明上市公司投资过度情况越严重; $Under_INV$ 越大,表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情况越严重。

(三) 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效率的回归模型设计

在确定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和资本投资水平变量之后,本文分别用模型(6),模型(7)和模型(8)来考察会计稳健性水平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

$$INV_Resid_{it} = \gamma_0 + \gamma_1 AC_{it} + \gamma_2 PAY_{it} + \gamma_3 FCF_{it} + \gamma_4 MFEE_{it} + \gamma_5 TUNNE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Over_INV_{it} = \gamma_0 + \gamma_1 AC_{it} + \gamma_2 PAY_{it} + \gamma_3 FCF_{it} + \gamma_4 MFEE_{it} + \gamma_5 TUNNE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7)$$

$$Under_INV_{it} = \gamma_0 + \gamma_1 AC_{it} + \gamma_2 PAY_{it} + \gamma_3 FCF_{it} + \gamma_4 MFEE_{it} + \gamma_5 TUNNE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8)$$

其中, INV_Resid_{it} , $Over_INV_{it}$ 和 $Under_INV_{it}$ 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为*i*公司*t*年度资本投资的无效率程度、投资过度程度以及投资不足程度; AC_{it} 为解释变量,代表*i*公司*t*年度会计稳健性程度,估算方法如前所述。参考理查森及辛清泉等的研究,本文加入的其他变量均为控制变量^[17,26]。 PAY_{it} 表示高管薪酬,为*i*公司*t*年度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的自然对数; FCF_{it} 表示自由现金流,用*i*公司*t*年度期末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期初总资产减去模型(5)估算出的预期资本投资额表示; $MFEE_{it}$ 表示管理费用率,为*i*公司*t*年度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TUNNEL_{it}$ 表示大股东资金占用,为*i*公司*t*年度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例。

(四)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股票市场2001年—2008年发行A股的所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当年首次发行新股公司和特别处理的公司、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本文最终得到6645家上市公司样本,其中2001年559家,2002年638家,2003年755家,2004年818家,2005年880家,2006年938家,2007年1022家,2008年1035家。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数据统计与处理软件为EXCEL 2003和STATA 10.0。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 变量的估算结果

1. 会计稳健性水平的估算

表1(见下页)报告了公司会计稳健性的估计结果。由表1可以看出全样本公司DR * R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32(t值为2.37)和0.595(t值为5.85),且在5%和1%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显著地快于对“好消息”的反应,会计稳健性是存在的。为了排除亏损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的噪音,本文在全样本中剔除亏损公司后再重新进行回归。如表1所示,盈利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仍然存在。这说明就整体水平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是存在的,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将表1回归系数代入模型以估算我国上市公

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会计稳健性水平用 AC 表示。

2. 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估算

表 2 报告了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本文采用模型回归残差表示公司资本投资的无效率水平,取绝对值为 *INV_Resid*。模型残差正值表示投资过度,记为 *Over_INV*,模型残差负值表示投资不足,取绝对值为 *Under_INV*。

(二)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3 为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最终 6645 家研究样本公司中,投资过度公司 *Over_INV* 为 2440 家(占 37%),投资不足公司 *Under_INV* 为 4205 家(占 63%),说明就整体水平而言,我国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的比重较大。会计稳健性水平 AC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004 和 0.0037,两个系数均大于 0,说明就整体水平而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策略显稳健。

表 1 会计稳健性水平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全样本公司		盈利公司	
截距	-0.00447 (-0.83)	-0.00242 (-0.45)	0.00636*** (2.88)	0.00558*** (2.61)
DR	-0.0153*** (-9.48)	-0.0128*** (-7.82)	-0.00881*** (-8.34)	-0.00645*** (-6.19)
R	0.00833*** (3.3)	0.163*** (3.42)	0.0101*** (3.91)	0.100** (2.53)
DR * R	0.0132** (2.37)	0.595*** (5.85)	0.00418 (0.98)	0.382*** (6.32)
SIZE * R		0.00912*** (3.97)		0.00587*** (3.09)
LEV * R		-0.0243** (-2.09)		-0.00349 (-0.44)
MB * R		-0.000827** (-2.08)		-0.00108*** (-3.48)
SIZE * DR * R		-0.0312*** (-6.35)		-0.0192*** (-6.86)
LEV * DR * R		0.153*** (6.09)		0.0214** (2.1)
MB * DR * R		-0.000401 (-0.27)		0.00267*** (4.88)
行业和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adj. R-sq	0.067	0.109	0.169	0.216
F	16.59***	16.13***	39.04***	41.29***

注:被解释变量为模型中 EPS/P;表中数据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并经过 White 异方差稳健性修正;***,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 5% 和 10%。

表 2 公司资本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截距	GROWTH _{it-1}	LEV _{it-1}	CASH _{it-1}	SIZE _{it-1}	RET _{it-1}	INV _{it-1}
	-0.0747*** (-3.91)	0.0158*** (6.61)	-0.0134*** (-5.68)	0.0368*** (3.49)	0.00598*** (6.60)	0.00537*** (2.97)	0.318*** (23.73)
行业和年度	控制						
adj. R-sq	0.249						
F 值	56.5***						

注:被解释变量为模型中的资本投资水平(INV);表中数据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并经过 White 异方差稳健性修正;***,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 5% 和 10%。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INV_Resid	6645	0.0379	0.0266	0.0363	0.2009	0.0003
Over_INV	2440	0.0516	0.036	0.0484	0.2009	0.0003
Under_INV	4205	0.0299	0.0244	0.0235	0.1253	0.0008
AC	6645	0.004	0.0037	0.0368	0.1132	-0.0851
PAY	6645	12.9722	13.0368	0.8481	14.3751	11.2645
FCF	6645	0.0608	0.0572	0.0956	0.3631	-0.2569
MFEE	6645	0.1109	0.0732	0.1571	1.1987	0.0063
TUNNEL	6645	0.0448	0.0207	0.0629	0.3504	0.0003

由表 4 可见,资本投资的无效率水平、投资过度(不足)与会计稳健性程度均显著负相关,初步证明假设 1、假设 1a 和假设 1b 成立。即稳健的会计政策有助于降低契约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能缓

解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进而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此外,无论是全样本组还是分样本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低,表明不存在较大的多重共线性。

表4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样本类别	相关系数					
A 栏:全样本						
	INV_Resid	AC	PAY	FCF	MFEE	TUNNEL
INV_Resid	1					
AC	-0.117***	1				
PAY	-0.028**	-0.283***	1			
FCF	0.167***	-0.182***	0.078***	1		
MFEE	-0.030**	0.275***	-0.165***	-0.160***	1	
TUNNEL	-0.107***	0.335***	-0.210***	-0.204***	0.341***	1
B 栏:投资过度样本						
	Over_INV	AC	PAY	FCF	MFEE	TUNNEL
Over_INV	1					
AC	-0.091***	1				
PAY	-0.021	-0.263***	1			
FCF	0.187***	-0.169***	0.091***	1		
MFEE	-0.02	0.211***	-0.111***	-0.135***	1	
TUNNEL	-0.114***	0.350***	-0.212***	-0.187***	0.284***	1
C 栏:投资不足样本						
	Under_INV	AC	PAY	FCF	MFEE	TUNNEL
Under_INV	1					
AC	-0.133***	1				
PAY	-0.074***	-0.238***	1			
FCF	0.072***	-0.157***	0.061***	1		
MFEE	-0.012	0.290***	-0.187***	-0.162***	1	
TUNNEL	-0.058***	0.322***	-0.206***	-0.190***	0.355***	1

注:***,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 5% 和 10%。

(三) 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无效率水平回归结果

表5(见下页)列出了模型的混合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及 F 检验、LM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结果。由于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本文首先需要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判断。由表5可见,在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与固定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时,F 检验值为 1.87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因而优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与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时,LM 检验的卡方值为 178.42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因而优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间进行选择时,Hausman 检验的卡方值为 50.73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因而优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综合 F 检验,LM 检验与 Hausman 检验的结果,本文的回归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5(见下页)可见,固定效应模型中会计稳健性水平 AC 的回归系数为 -0.182 (t 值为 -6.25)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会计稳健性水平与公司资本投资的无效率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稳健的会计政策可以有助于改善公司资本投资效率。这表明会计稳健性在公司资本投资中具有治理价值,从而假设 1 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来看,高管薪酬 PAY 的回归系数为 -0.00191(t 值为 -2.53)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工作努力程度和经营才能做出补偿和激励时,将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企业资本投资无效率水平增加。自由现金流 FCF 的回归系数为 0.0308(t 值为 5.74)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其经理人无效率投资的可能性更大。管理费用 MFEE 的回归系数为 0.00648(t 值为 1.78)仅在 10% 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也会影响企业资本投资效率。大股东占款 TUNNEL 的回归系数为 -0.0452(t 值为 -4.33)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或许是大股东占款导致上市公司资金短缺,反而减少了无效率投资的可能性。

(四) 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过度(不足)的回归结果

表 6 报告了会计稳健性对投资过度(不足)的影响,且回归模型包括了高管薪酬、自由现金流、管理费用率、大股东占款比率等控制变量。会计稳健性水平 AC 在表 6 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211(t 值为 -2.74)和 -0.158(t 值为 -6.68),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会计稳健性水平与公司投资过度(不足)水平显著负相关,即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有助于经理人拒绝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有助于经理人接受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缓解企业投资不足。可见,会计稳健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企业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从而假设 1a 和假设 1b 得到验证。

此外,高管薪酬 PAY 与投资过度 Over_INV 在 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投资不足 Under_INV 在 10%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薪酬激励越充分,企业资本投资过度(不足)的可能性越小,经理薪酬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企业投资过度(不足)的现象。自由现金流 FCF 与投资过度显著正相关,与投资不足负相关,说明自由现金流充足可以缓解投资不足的压力,同时也会加剧投资过度的情况。管理费用 MFEE 与投资过度(不足)正相关,说明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会加剧企业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无效率行

表 5 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的无效率水平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混合最小二乘法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截距	0.0784*** (10.90)	0.0627*** (6.34)	0.0720*** (9.16)
AC	-0.0988*** (-7.20)	-0.182*** (-6.25)	-0.112*** (-6.83)
PAY	-0.00327*** (-6.01)	-0.00191** (-2.53)	-0.00269*** (-4.52)
FCF	0.0553*** (9.42)	0.0308*** (5.74)	0.0438*** (9.13)
MFEE	0.00735** (2.36)	0.00648* (1.78)	0.00680** (2.15)
TUNNEL	-0.0416*** (-6.37)	-0.0452*** (-4.33)	-0.0437*** (-5.16)
F 值	59.46***	20.29***	—
Wald 值	—	—	209.6***
adj. R-sq	0.0445	0.035	0.0434
F 检验值		1.87***	
LM 检验值		chibar ² (01) = 178.42***	
Hausman 检验		chi ² (5) = 50.73***	

注:被解释变量为模型中资本投资的无效率水平(INV_Resid);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F 值为多元回归总体显著性检验,而 F 检验值则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混合最小二乘法模型的检验值;***,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 5% 和 10%。

表 6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过度(不足)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Over_INV	Under_INV
截距	0.0999*** (3.89)	0.0466*** (5.69)
AC	-0.211*** (-2.74)	-0.158*** (-6.68)
PAY	-0.00398** (-2.04)	-0.00122* (-1.96)
FCF	0.0814*** (5.51)	-0.00346 (-0.79)
MFEE	0.0127 (1.14)	0.00476* (1.67)
TUNNEL	-0.121*** (-3.53)	-0.00719 (-0.89)
adj. R-sq	0.0419	0.023
F 值	11.36***	9.623***

注:表中回归都是用 2001 年—2008 年上市公司的非均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所以进行了模型的筛选,最终选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中数据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 t 值;***,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 1%, 5% 和 10%。

为。大股东占款 TUNNEL 与投资过度(不足)负相关,这可能是大股东占款导致上市公司资金短缺,从而使企业削减了资本支出。

(五) 敏感性分析

本文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为了避免理查森模型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偏差,本文将模型残差按大小分成三组并剔除掉中间一组;然后,将残差最大的一组作为投资过度组,将残差最小的一组作为投资不足组,再次进行回归。此外,本文将非平衡面板数据转换为平衡面板数据,即将 2001 年—2008 年正常在市交易并且只发行 A 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用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托宾 Q 作为公司增长机会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这些敏感性分析的回归结果与前面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01 年—2008 年我国沪深股票市场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会计稳健性与公司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考察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价值。实证结果发现会计稳健性与资本投资无效率水平即投资过度(不足)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会计稳健性水平有助于缓解公司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行为,改善公司的资本投资效率。

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者有动机对外披露有关收益的信息而隐瞒有关损失的信息,所以股东可以利用稳健性原则来抑制管理者不对称披露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及时确认损失的稳健性能够使企业的决策权尽早从造成亏损的管理者手中转移到债权人手中,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会计稳健性不仅是一项重要的财务报告质量属性,而且还是一项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理解会计稳健性在公司治理中的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会计稳健性在公司投资效率方面的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企业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一方面,会计稳健性通过要求及时确认损失,限制了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及其机会主义行为,有效缓解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抑制过度投资的发生;另一方面,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投资者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投资者溢价要求,缓解投资不足的发生。

参考文献:

- [1]Watts R L.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3, 17(3): 207 - 221.
- [2]李增泉,卢文彬. 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发现与启示[J]. 会计研究, 2003(2): 19 - 27.
- [3]赵春光. 中国会计改革与谨慎性的提高[J]. 世界经济, 2004(4): 53 - 62.
- [4]孙铮,刘凤委,汪辉. 债务、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5(2): 112 - 173.
- [5]李远鹏,李若山. 是会计盈余稳健性,还是利润操纵?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5(3): 1 - 56.
- [6]朱茶芬,李志文. 国家控股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J]. 会计研究, 2008(5): 38 - 45.
- [7]毛新述,戴德明. 会计制度改革、盈余稳健性与盈余管理[J]. 会计研究, 2009(12): 38 - 46.
- [8]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 - 360.
- [9]Myers S C, Majluf N S.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2): 187 - 221.
- [10]Kanodia C, Deokheon L. Investment and disclosure: the disciplinary role of periodic performance report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 36(1): 33 - 55.
- [11]辛清泉,郑国坚,杨德明. 企业集团、政府控制与投资效率[J]. 金融研究, 2007(10): 123 - 142.
- [12]王彦超. 融资约束、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J]. 金融研究, 2009(7): 121 - 133.

- [13] Bushman R M, Smith A J.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32(1/3): 237 – 333.
- [14] Ball R, Shivakumar L. Earnings quality in Uk private firms: comparative loss recognition timelin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39(1): 83 – 128.
- [15] Biddle G C, Hilary G. Accounting quality and firm-level capital investment[J]. *Accounting Review*, 2006, 81(5): 963 – 982.
- [16] Bushman R M, Piotroski J D. Financial reporting incentives for conservative accounting: the influence of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1/2): 107 – 148.
- [17] 辛清泉, 林斌, 王彦超. 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 *经济研究*, 2007(8): 110 – 122.
- [18] Ball R, Kothari S P, Robin A.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 29(1): 1 – 51.
- [19] Ahmed A S, Duellman 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board of director characteristic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3(2/3): 411 – 437.
- [20] McNichols M F, Stubben S R. Does earnings management affect firms' investment decisions? [J].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6): 1571 – 1603.
- [21] Lafond R, Watts R L. 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sm[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2): 447 – 478.
- [22] Ahmed A S, Billings B K, Morton R M, et al. The rol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mitigating bondholder-shareholder conflicts over dividend policy and in reducing debt cos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 77(4): 867 – 890.
- [23] Zhang J. The contracting benefits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o lenders and borrow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8, 45(1): 27 – 54.
- [24] Basu S.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7, 24(1): 3 – 37.
- [25] Khan M, Watts R L.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 48(2/3): 132 – 150.
- [26]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2): 159 – 189.

[责任编辑:高 婷]

An Empirical Study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apital Efficiency

LIU Bin, WU Ya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1-2008 in China,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capital invest efficiency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governance rol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his study find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ed to capital invest inefficiency (over-investment, under-investment), and provides the evidence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can lower cost conflict between managers and shareholders, reduc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faced by investors, and weaken corporate over-investment or under-investment, and thus improving the company's capital investment efficiency.

Key Word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vestment efficiency; over-investment; under-investment

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例

李婉丽, 陈丽英, 吕怀立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近年来日趋频繁的盈余重述受到了投资者、学术界及监管当局的广泛关注,探究盈余重述发生的深层次动因成为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对象,通过分析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后发现,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这说明重述公司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正向调整了盈余,盈余重述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以前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

[关键词] 盈余重述; 真实活动操控; 经营活动现金流; 盈余管理; 高报盈余; 重述公司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4-0069-08

一、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0-09-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09YJA63012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572040)

[作者简介] 李婉丽(1963—),女,陕西合阳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会计理论与上市公司会计研究;陈丽英(1979—),女,河南郑州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司财务与审计研究;吕怀立(1983—),男,山东梁山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公司财务政策与行为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①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 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代理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 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②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 682 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 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

^①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

^②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

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①,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 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 1999 年—2009 年这 11 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发布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 1998 年—2008 年。选择 1999 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 495 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 12269 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2. 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 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 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frac{CFO_{it}}{Assets_{it-1}} = k_1 \frac{1}{Assets_{it-1}} + k_2 \frac{REV_{it}}{Assets_{it-1}} + k_3 \frac{\Delta REV_{it}}{Assets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1)$$

$$\frac{DISX_{it}}{Assets_{it-1}} = k_1 \frac{1}{Assets_{it-1}} + k_2 \frac{REV_{it-1}}{Assets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2)$$

$$\frac{PROD_{it}}{Assets_{it-1}} = k_1 \frac{1}{Assets_{it-1}} + k_2 \frac{REV_{it}}{Assets_{it-1}} + k_3 \frac{\Delta REV_{it}}{Assets_{it-1}} + k_4 \frac{\Delta REV_{it-1}}{Assets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3)$$

^①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

式中 i 表示公司, t 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 CFO 为经营活动现金流, $Assets_{t-1}$ 为年初总资产; REV 为当期营业收入; ΔREV 为营业收入变动; $DISX$ 表示操控性费用, 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 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 REV_{t-1} 为上年收入; $PROD$ 代表生产成本, 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 ΔREV_{t-1} 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 $RCFO$ 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 即:

$$RCFO_{it} = (CFO_{it}/Assets_{it-1}) - \left[\hat{k}_1(1/Assets_{it-1}) + \hat{k}_2(REV_{it}/Assets_{it-1}) + \hat{k}_3(\Delta REV_{it}/Assets_{it-1}) \right] \quad (4)$$

同理, 异常操控性费用 $RDISX$ 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 即:

$$RDISX_{it} = (DISX_{it}/Assets_{it-1}) - [\hat{k}_1(1/Assets_{it-1}) + \hat{k}_2(REV_{it-1}/Assets_{it-1})] \quad (5)$$

异常生产成本 $RPROD$ 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 即:

$$RPROD_{it} = (PROD_{it}/Assets_{it-1}) - \left[\hat{k}_1(1/Assets_{it-1}) + \hat{k}_2(REV_{it}/Assets_{it-1}) + \hat{k}_3(\Delta REV_{it}/Assets_{it-1}) + \hat{k}_4(\Delta REV_{it-1}/Assets_{it-1}) \right] \quad (6)$$

(2) 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 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_{it} = \beta_0 + \beta_1 MIS_{it} + \beta_2 LEV_{it-1} + \beta_3 \ln(Assets_{it-1}) + \beta_4 ROA_{it} + \beta_5 GROW_{it} + \varepsilon_{it} \quad (7)$$

式中, RM 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 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 $RCFO$ 、异常操控费用 $RDISX$ 和异常生产成本 $RPROD$ 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 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 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 MIS 为虚拟变量, 如果公司 t 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①, 则取 1, 反之取 0。

已有的研究表明, 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 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 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公司负债水平, 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 (LEV_{it-1}) 表示; 公司规模 ($\ln Assets_{it-1}$), 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 盈利水平, 以资产回报率 (ROA) 来衡量; 成长状况 ($GROW$), 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及均值 T 检验

表 1 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 T 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 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 且存在显著差异 (t 值分别为 -5.332 、 -6.995 、 -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 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 T 检验, 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 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 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 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 T 检验, 这表明与非重述

^①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 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

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及均值 T 检验

变量	重述公司		非重述公司		T 检验	
	Mean	Median	Mean	Median	均值差	t
经营活动现金流 CFO	112492428	37654713	353489227	55895054	-240996799	-5.332***
CFO/ Assets _{t-1}	0.057753334	0.05115688	0.332124847	0.034579808	-0.27437151	-0.897
生产成本 PROD	1057700000	464810000	2588100000	571770000	-1530440000	-6.995***
PROD/ Assets _{t-1}	3.824000568	0.359754847	0.641907541	0.466445822	3.18209303	1.045
操控性费用 DISX	164150000	81705000	284670000	87563000	-120522000	-5.26***
DISX/ Assets _{t-1}	0.14568627	0.067574754	0.092294349	0.072593687	0.05339192	1.002
资产负债率 LEV _{t-1}	0.75200824	0.521578	0.50213972	0.47763	0.24986852	1.476
资产 ln(Assets _{t-1})	20.9867629	20.913677	21.0356492	20.937473	-0.0488863	-1.018
资产净利率 ROA	-0.008322	0.018771	0.03096555	0.036341	-0.03928751	-4.605***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	0.39574115	0.120895	0.67084306	0.135986	-0.27510191	-0.278
异常现金流 RCFO	0.002492993	0.05978844	-0.00010058	0.03723055	-0.03137492	-0.935
异常操控费用 RDISX	0.005336463	-0.01222338	-0.0002153	-0.0158391	0.00555177	1.358
异常生产成本 RPROD	0.294349326	0.49700683	-0.0118757	0.22554253	0.30622502	5.467***
样本量 N	495		12269		12764	

注:表中统计的为财务报告发生误报年度(即被重述年度)的数据;*为10%水平上显著;**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 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 2 为变量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 MIS 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 -0.021),异常生产成本 RPROD 与误述变量 MIS 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 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 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 ROA 与误述变量 MIS 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 GROW 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Pearson 相关系数

	RCFO	RDISX	RPROD	MIS	ROA	GROW	LEV _{t-1}	ln(Assets _{t-1})
RCFO	1							
RDISX	0.141**	1						
RPROD	0.310**	-0.067**	1					
MIS	-0.021*	0.012	0.048**	1				
ROA	-0.003	-0.146**	-0.176**	-0.066**	1			
GROW	0.006	0.012	0	-0.002	0.014	1		
LEV _{t-1}	-0.001	-0.014	0.028**	0.057**	-0.009	0.011	1	
ln(Assets _{t-1})	0.089**	0.005	0.296**	-0.009	0.012	-0.025**	-0.083**	1

3. 多元回归分析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 MIS 的回归系数为 -0.031,且在 5%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 值为 -2.336),假设 1 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 0.231,t 值为 4.402,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假设 3 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 2 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 ROA 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 LEV 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

表 3 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RCFO		RDISX		RPROD	
	系数	t	系数	t	系数	t
(Constant)	-0.526	-10.082***	-0.004	-0.234	-7.352	-35.94***
MIS	-0.031	-2.336**	0.002	0.382	0.231	4.402***
ROA	-0.014	-0.617	-0.113	-16.638***	-1.872	-21.406***
GROW	0.008	0.873	0.00005926	1.637	0.001	1.188
LEV _{t-1}	0.002	0.792	-0.002	-1.782*	0.071	5.901***
ln(Assets _{t-1})	0.025	10.105***	0.004	0.495	0.35	36.145***
Adj. R ²	0.008		0.021		0.123	
F	21.661***		56.746***		358.223***	

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 82 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 -0.035,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t 值为 -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 0.226,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t 值为 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 1 与假设 3 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 Jones 的模型^[17],即

$$TA_{it}/Assets_{it-1} = \beta_0 + \beta_1 (1/Assets_{it-1}) + \beta_2 (\Delta REV_{it} - \Delta AR_{it})/Assets_{it-1} + \beta_3 (PPE_{it}/Assets_{it-1}) + \beta_4 (ROA_{it-1}/Assets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8)$$

式中 ΔAR 为应收账款变动, PPE 为固定资产原值, ε 代表操控性应计,即 DA 。

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 4),我们发现变量 DA 与 $ACFO$ 显著负相关,与 $APROD$ 正相关,与 $ADISX$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表 4 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	ACFO	APROD	ADISX	DA
ACFO	1			
APROD	0.310**	1		
ADISX	0.141**	-0.067**	1	
DA	-0.533**	0.290**	-0.218**	1

以 DA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 0.027,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见表 5),

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五、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

表 5 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	(Constant)	MIS	ROA	GROW	LEV _{t-1}	ln(Assets _{t-1})
系数	-0.536	0.027	0.561	-0.015	0.002	0.025
t	-15.045***	2.995***	36.819***	-1.748*	0.858	14.899***
Adj. R ²	0.111					
F 值	318.604***					

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Graham J R,Harvey C R,Rajgopal S.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5,40(1):3-73.
- [2]张菊香. 基于动机视角的盈余管理文献综述[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6):60-65.
- [3]Jeffrey L C,Joshua L,Dan S. Accounting restatements:are they always bad news for investors? [R].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Toronto,2007.
- [4]Richardson S. Predi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the case of earnings restatements[R].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2.
- [5]Natasha B,Simi K. The impact of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on misreport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1):35-67.
- [6]Jap E,Anup S,Edward P S. Why do corporate managers misst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role of option compensation and other factor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5(3):667-708.
- [7]赵震宇,杨之曙,白重恩. 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变更的因素分析与实证检验[J]. 金融研究,2007(8):76-89.
- [8]张为国,王霞.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差错的动因分析[J]. 会计研究,2004(4):24-30.
- [9]Wu Min. Accounting restatements: an oriental version[R]. Working Paper,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8.
- [10]纪信义,曹寿民. 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报告品质可靠性的影响——从盈余门坎的角度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1):3-17.
- [11]Ewert R,Wagenhofer A. Economic effects of tightening accounting standards to restrict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5,80(4):1101-1124.

- [12]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42(3):335-370.
- [13] Cohen D A, Paul Z.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50(1):2-19.
- [14] Dechow P, Dichev I. The quality of accruals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accrual estimation err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77(1):35-59.
- [15] 路云峰, 刘国常. 公司治理特征与审计重大错报风险——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8(2):102-108.
- [16] 杨兴全, 张照南. 治理环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及现金持有量——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0(1):66-73.
- [17] Keith L J, Gopal V K, Kevin D M. Do models of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etect actual cases of fraudulent and restated earnings? [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8,25(2):499-531.

[责任编辑:马志娟]

Earnings Restatement and Real Activity Manipulati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Overstatement Companies Claiming Higher Earnings

LI Wanli, CHEN Liying, LV Huaili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Increased earnings restatement in recent years has attracted investors, academic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wide attention. Exploring the deep motivation of earnings restatement has become a question that had to be solved to improve companie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nings restatements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by using the overstatement companies as sam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statement companies have low levels of cash flow from operations and high production costs compared with non-restatement companies in restated years, indicating that restatement companies have use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to positively manage the earnings in question. So most earnings restatement is the product of intentional earnings management.

Key Words: earnings restatement; real activity manipulation; cash flow of operations; earnings management; higher earnings claim



(上接第 28 页)

Opportunistic Tendencies, Business Risk and Audit Quality

CHEN Lianghua¹, FENG Wentao², CHEN Jifeng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2.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Prospect Theory"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echanism between auditors' opportunistic tendencies and the audit opinions, then examined the hypothesis by the data from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maller the business risks of listed companies was, the easier to get clean audit opinions. Audit opinions which should have reflected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reports just became an evaluation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which indicated the existence of opportunistic tendencies in the audit ac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d behavioral economics into audit research not only to extend the methodological thought but also to sublimate our knowledge of audit action.

Key Words: audit quality; opportunistic tendencies; behavioral economics; prospect theory; operation risk; auditor switch

独立董事独立性、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

——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徐高彦

(南京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要求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进行监管政策的出台, 创造了基于关联交易研究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机会。基于此, 在研究独立董事独立性对公司异常关联销售和公司价值的影响后发现, 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异常关联销售的发生。《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颁布以后, 异常关联销售的比率降低, 且更为“干净”。独立董事独立性对异常关联销售的抑制不仅是政策作用的直接结果, 而且确实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

[关键词] 异常关联销售; 独立董事; 独立性; 公司价值; 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4-0077-08

一、引言

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作为内部市场的一种交易方式, 能够使子公司通过内部交易弥补外部市场所无法实现的机能^[1]。例如, 它有助于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 降低交易成本, 从而有利于集团公司的整体战略。然而, 关联交易也可能被用于实现资金和利润的转移而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2-4]。本文中, 我们称这类交易为异常关联交易。在中国, 异常关联交易可能会成为大股东掏空企业价值和经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为此监管者制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减少这一机会主义行为。其中, 2001年8月16日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将关联交易与公司内部治理联系在一起。该意见明确了独立董事作为公司治理中来自外部的力量在关联交易中应起的作用。有关该项政策的作用, 学术界实证研究甚少^[5-6]。

独立董事制度是我国从西方国家引入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制约内部控股股东, 规范经理人行为,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缓解“一股独大”所导致的股权制衡问题。然而, 独立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能否相对独立地发挥监管作用,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

本文基于《指导意见》的政策监管要求, 抛开以往实证研究中过于偏激的假设(即认为关联交易是常见的利润操纵手段之一, 会引发严重的代理问题, 损害企业价值), 从能否抑制异常关联销售的角度, 考察独立董事独立性是否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有关关联交易及独立董事独立性方面的文献回顾; 第三部分是相关制度背景介绍、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第四部分是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检验结果及分析; 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及研究局限。

[收稿日期] 2010-11-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02026)

[作者简介] 徐高彦(1983—), 女, 江苏扬州人,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财务会计研究。

二、文献回顾

(一) 关联交易的相关研究

1. 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

关联交易的相关研究表明,正常的关联交易大大降低了非关联交易过程中必须发生的搜寻、比较、谈判等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的稳定性,避免了外部不利市场环境的影响。王跃堂、涂建明认为关联交易是集团公司内部整合资源的手段,是内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7]。肖星、王琨的研究提供了中国企业集团成员企业的价值显著优于同行业的经验证据^[8]。我们可以推论,企业集团的内部市场提升了成员企业的价值,企业集团的经营行为是理性的。高雷等提出了“效率增强观”,即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关联交易通过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减少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交易风险^[9]。因此,基于企业集团内部市场发生的关联交易,从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

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能会损害公司价值。Johnson(约翰逊)等人的研究显示,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侵占其他股东利益所形成的利益冲突会夺取上市公司的发展机会,在集团公司内部交易中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会严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10-11]。许多经验证据都提供了在集团公司内部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实施掏空行为的证据,这种利益冲突和掏空行为会对企业价值造成破坏^[12-13]。与上述关联交易掏空观相对的是关联交易的盈余管理观。这种观点认为关联交易的动机不是单纯地提高效益或者破坏企业价值,而是调节利润的手段之一。

2. 异常关联交易的判别:比重观和内外市场观

如果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通过关联交易给公司带来价值减损,那么如何识别这类异常关联交易呢?已有的文献给出了两种观点:比重观和内外市场观。

比重观认为,关联交易是支持“效率增强观”还是“掏空盈余观”取决于关联交易所占的比重大小。上市公司向其关联方的商品销售达到较大比重时,其报告的会计盈余数据具有较低的价值相关性。关联购销份额较小时,它依然可以通过高派现或直接占用资金达到利益输送的目的,此时关联购销的发生更可能出于正常的决策安排^[2]。只有当关联交易的比重上升、交易额规模巨大时,外部投资者对大股东或者管理层可能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才会随之上升。

内外市场观认为,对于企业及其关联方构成的企业集团而言,内部市场销售应与外部市场保持平衡,超过非关联购销增长的关联购销量可以被保守地认为是异常量。这一异常量的驱动力不是源于企业集团或上市公司的价值最大化,而更可能是基于盈余报告目的的利益驱动。

(二) 独立董事的相关研究

1.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大量文献表明独立董事要充分发挥其监督效力,首先需要成为董事会决策行为的主体。独立董事仅能通过声明或辞职向其他利益相关者报警,因此董事会的人员构成是决定董事会运作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高的董事会比较容易摆脱外界干预,因而能够提供更加透明的财务信息^[14-15]。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有助于减少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成本,将中小股东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15]。因此,要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切实发挥制约控股股东的效力,就必须扩大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重。

独立董事人品、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其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保障。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之间信息获取能力的替代程度会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效率。为了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遏制大股东操纵财务数据,公司必须聘请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独立董事。研究表明,聘请具有行业专长的独立董事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聘请具有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约束公司管理层的违法行

为,减少公司面临的信息披露诉讼风险。聘请具有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有助于发现财务舞弊,加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减少盈余管理行为^[16]。除了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外,行业“声誉”也是衡量独立董事能力和品质的重要机制。独立董事为了提高自己在职业市场上的声誉资本,会在监督的过程中努力维持高“声誉”,以增加被雇用的机会和薪酬^[17-18]。唐清泉的研究表明,在上市公司与独立董事动机的相互作用下,独立董事具有花瓶效应、决策效应和风险回避效应^[6]。

2. 独立董事与关联交易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独立董事制度与关联交易的实证研究较少,并且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模型设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5-6]。关联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联销售。在关联销售的研究中,对于异常关联销售并无统一的计算方法。以关联销售额为例,一般的做法是将样本年限分为两段:计算前一时间段的关联销售占关联交易的比率,认为此比率是正常的比率;将后一时间段的实际关联销售额与关联交易和前一比率的乘积之差定义为异常关联销售额。具体计算公式为:异常关联销售额 = 实际关联销售额 - 实际关联交易额 × 比率^[2]。

本文认为上述方法在我国并不适用。从时间序列上看,随着法规的建立和交易环境的完善,关联交易更为规范。以前期交易情况为基础计算的比率,合理性反而较后期低。因此,以不规范的比率作为基准计算异常关联销售,可信度将大大下降。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选择比重观,即上市公司向关联方的商品销售达到较大比重时,其报告的会计盈余数据具有较低的价值相关性。市场对较低比例的关联交易似乎比较认可,因为较低比例的关联交易并不影响盈余数据的价值相关性^[19]。通过超过 300 万元的大额关联销售来刻画异常关联销售,可以降低主观性和噪音影响。因此,本文以大额关联销售为研究变量刻画异常关联销售。这也切合《指导意见》中独立董事对大额关联交易的监督要求。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尚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关联交易形成的客观基础。有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原国有企业剥离重构而来,这使得上市公司和原来的母体或母系成员之间维持着大量的内部市场交易。此外,关联交易具有隐蔽性,在内部交易中缺乏讨价还价的价值公允性。

从内部结构来看,我国特有的公司治理特征成为大量异常关联交易被不合理利用的内在原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股权集中度较高,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容易受到大股东和大股东集团的侵占。在重大关联交易中,大股东常以不合理的高价将其产品或劣质资产出售或置换给上市公司,换取上市公司的现金或优良资产,或者以不合理的低价从上市公司购买产品或资产,甚至不支付价款,致使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不断增加、资金被长期占用,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损害了公司价值。

另外,我国评估和审计等中介机构尚不发达。这些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有效监督的缺乏助长了不合理关联交易的滋生。

尽管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和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规范的关联交易呈现减少的趋势。尤其是法律法规的完善对关联交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具体来看,2001 年 8 月 16 日颁布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5% 的关联交易,应得到独立董事的认可;上市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上市公司现有或新发生的总额高于 300 万元或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5% 的借款或其他资金往来,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这是监管机构对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的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公司有无重大关联交易成为独立董事需要关注的重点。

此外,2004 年 9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征求意见稿)》中有一段重要表述,“证监会将用独立董事的良知与公信,去呵护小股民的弱势,防止关联交易……独董们拥有特别职权”。在重大关联交易的问题上,应有 1/2 以上的独立董事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这也说明独立董事有充分的集体话语权来监督重大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如果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保护股东利益,满足资本市场监管者的要求,他就会通过自身的专业特长识别公司经营的危险信号,对公司的违规或不正当行为提出警告。本文认为独立董事出于对声誉、专业能力的维护,仍可能独立于利益集团,在监督公司经营管理、提高公司绩效和保护股东权益等方面发挥作用。

《指导意见》这一强制性经济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对独立董事而言,考虑到潜在的法律后果,他会对 300 万元以上的关联销售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制度变革对企业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经理层或控股股东为避免超过 300 万元关联销售引起独立董事的关注,可能会将大额销售分拆化小。因此,董事、经理层或控股股东的行为决策都有可能受到《指导意见》的影响。这一影响可能使政策变革前后关联销售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独立董事独立性的三个方面与大额关联销售的关系提出假设 1。

假设 1: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提高将抑制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

假设 1a:独立董事的声誉越高,越有可能抑制上市公司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

假设 1b:独立董事的专长越强,越有可能抑制上市公司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

假设 1c: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越有可能抑制上市公司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

同时,如果 2001 年《指导意见》之后的独立董事对关联销售的监管更为规范,经理层利用大额关联销售进行盈余管理或达到其他目的的行为就可能受到抑制,那么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也可能会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加。据此,我们提出假设 2。

假设 2: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能够有效抑制异常关联销售的发生,提升公司价值。

假设 2a:独立董事的声誉与上市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 2b:独立董事的专长与上市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 2c: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价值呈正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2001 年—2007 年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非金融保险行业的 A 股上市公司。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以及市场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股票上市公司数据库(简称 CSMAR),而独立董事人数及其背景资料则来源于手工搜集,剔除独立董事背景、模型变量缺失以及资不抵债的公司,关联销售的相关数据以各公司年报中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进行核对与补充,不一致之处以年报为准进行调整。

(二) 研究方法 with 模型

为检验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否会抑制大额关联销售,我们建立模型 1:

$$\begin{aligned} Percent_{t,i} = & \alpha_0 + \alpha_1 Indep_{t,i} + \alpha_2 Size_{t,i} + \alpha_3 Lev_{t,i} + \alpha_4 Roe_{t,i} + \alpha_5 Sh_{t,i} + \\ & \alpha_6 Dual_{t,i} + \alpha_7 Group_{t,i} + \varepsilon_{t,i} \end{aligned} \quad (1)$$

$Percent_{t,i}$ 为 t 年度 i 公司超过 300 万元关联销售笔数占关联销售总笔数的比例。 $Indep_{t,i}$ 为 t 年度 i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具体选取三个指标:(1)独立董事的声誉 $Reput_{t,i}$,取公司平均每名独立董事任职公司数。独立董事的声誉越高,违规行为带来的成本就越高,他越有动机抑制大额关联销售。(2)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 $Index_{t,i}$ 。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中有行业专家、注册会计师或法律专家时, $Index_{t,i}$ 取 1,否则取 0。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越好,识别和抑制大额关联交易背后隐藏盈余操纵动机的概率越大。

(3)独立董事人员的比例 $Comp_{t,i}$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越高,话语权越大,越有权利抑制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三种不同指标的选取分别形成模型 1~1,1~2,1~3。我们参考以往关联交易的相关研究,选取下列控制变量:Size_{t,i}为 t 年度 i 公司规模,取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_{t,i}为 t 年度 i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Roe_{t,i}为 t 年度 i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Sh_{t,i}为 t 年度 i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①,比例越大,大股东利用大额关联销售满足自身目的的可能性越大。Dual_{t,i}为虚拟变量,表示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两职合一取 1,否则取 0。两职合一意味着约束机制的弱化,大额关联销售被用来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很大。Group_{t,i}为虚拟变量,上市公司属于某一企业集团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当上市公司为企业集团时,交易双方可能服从一致目的,大额关联销售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为检验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本文建立模型 2:

$$TQ_{t,i} = \alpha_0 + \alpha_1 Indep_{t,i} + \alpha_2 Indep_{t,i} \times PerDum_{t,i} + \alpha_3 Size_{t,i} + \alpha_4 Lev_{t,i} + \alpha_5 Roe_{t,i} + \alpha_6 Sh_{t,i} + \varepsilon_{t,i} \quad (2)$$

TQ_{t,i}为 t 年度 i 公司的托宾 Q 值,其计算方法为:TQ = (每股市场价格 × 流通股数 + 每股账面净资产 × 非流通股数 + 负债的账面价值)/总资产的账面价值。Indep_{t,i}为 t 年度 i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具体选取的三个指标同上,分别构成模型 2~1,2~2,2~3。其余变量选取及处理同上。值得关注的是,本文利用 $Indep_{t,i} \times PerDum_{t,i}$ 来深入考察大额关联销售所占比重的大小在独立董事发挥独立性的情况下是如何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的。PerDum_{t,i}为虚拟变量,本文设计 t 年度 i 公司超过 300 万元关联销售笔数占关联销售总笔数的比例低于样本中位数值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预计系数 α_2 显著为正,即如果独立董事能够发挥其独立性,抑制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并且市场能够有效识别这些信息,那么大额关联销售所占比重较低企业的公司价值就较高。

五、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对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由 Percent_{t,i}的均值和中位数可以看出,大多数观测值的大额关联销售的比例处于 50% 或以下的水平,但也有部分企业的大额关联销售比例较高,从而使得大额关联销售的比例达到了 55%。独立董事的声誉 Reput_{t,i}也有着与 Percent_{t,i}类似的特点,而表示独立董事

表 1 模型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Percent _{t,i}	5385	0.55	0.50	0.37
TQ _{t,i}	8952	1.34	1.08	0.94
Reput _{t,i}	4750	2.18	1.67	1.57
Index _{t,i}	4882	0.39	0.00	0.47
Comp _{t,i}	5337	0.30	0.33	0.11
Size _{t,i}	5385	21.35	21.24	1.04
Lev _{t,i}	5385	0.53	0.49	1.71
Roe _{t,i}	5385	0.13	0.06	6.58
Sh _{t,i}	8914	0.40	0.38	0.17
Dual _{t,i}	5350	0.11	0.00	0.31
Group _{t,i}	5384	0.85	1.00	0.36

独立性的另外两个变量 Index_{t,i}和 Comp_{t,i}却刚好相反。这说明少数上市公司倾向于选择声誉高的人担任独立董事,而并不十分注重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独立董事人员比例主要集中在 1/3,还有少部分企业未达到这一比例。Dual_{t,i}的均值和中位数表明两职合一的现象尽管存在,但比重较小,约占 1/10。Group_{t,i}的均值和中位数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属于企业集团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也是我国关联销售比较复杂的原因之一。Roe_{t,i}的均值和中位数相差较大,对应的标准差也较大,说明不同企业不同年份的收益波动差异较大,这可能对模型拟合产生一定影响。

2. 假设 1 的回归结果

上述数据分析显示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大额关联销售的抑制作用。这是从时间序列角度而言的。研究年限中,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呈现增强趋势。从横向角度来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否对大额

^①为使统计结果有意义,调节量纲,对 Sh_{t,i}作除以 100 处理。

关联销售具有抑制作用呢? 我们利用模型 1~1, 1~2, 1~3 对假设 1 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模型 1~1 中 $Indep_{t,i}$ 为 $Reput_{t,i}$; 模型 1~2 中 $Indep_{t,i}$ 为 $Index_{t,i}$; 模型 1~3 中 $Indep_{t,i}$ 为 $Comp_{t,i}$ 。
模型 1~1 中 $Reput_{t,i}$ 的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 为 -0.01; 模型 1~2 中 $Index_{t,i}$ 的系数为 -0.00, 不显著; 模型 1~3 中 $Comp_{t,i}$ 的系数为 -0.40, 在 1% 水平下显著。

表 2 假设 1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预测符号	Percent _{t,i} 1~1		Percent _{t,i} 1~2		Percent _{t,i} 1~3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Intercept	?	-1.30***	-11.36	-1.29***	-11.52	-1.22***	-11.63
Indep _{t,i}	-	-0.01***	-2.90	-0.00	-0.12	-0.40***	-8.92
Size _{t,i}	+	0.09***	15.89	0.09***	16.07	0.09***	17.49
Lev _{t,i}	?	-0.07**	-2.21	-0.06*	-1.92	-0.05*	-1.72
Roe _{t,i}	?	-0.00	-0.36	-0.01	-0.71	-0.00	-0.45
Sh _{t,i}	+	-0.03	-0.73	-0.02	-0.65	-0.03	-0.83
Dual _{t,i}	+	-0.03	-1.57	-0.02	-1.44	-0.03	-1.64
Group _{t,i}	+	0.01	0.46	0.01	0.52	0.01	0.40
N			4648		4775		5223
Adjust-R ²			0.05		0.05		0.07
F 值			38.85		40.11		53.93

注: *** 表示 1% 水平下显著, ** 表示 5% 水平下显著, * 表示 10% 水平下显著。

该结果表明, 独立董事的声誉和独立董事人员的比例对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指导意见》颁布后, 独立董事考虑到潜在的法律后果, 可能会对大额关联销售予以更多的关注, 从而抑制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同时, 管理层为避免异常的关联销售引发独立董事的关注, 也会主动减少大额关联销售。专业性的不显著可能由于独立董事能够通过其专业知识鉴别出大额关联销售背后的盈余操纵动机, 同时确保继续留存的大额关联销售不会引发自身的法律风险。

在控制变量中, $Size_{t,i}$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公司规模越大, 大额关联销售笔数发生比率越高, 其原因可能是规模较大的公司所从事的单笔销售的金额也相应越大。Lev_{t,i}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 大额关联销售笔数发生比率越低, 其原因可能在于负债率较高的公司容易引起监管部门和证券市场的关注。因此, 即使存在大额关联销售, 经理层也尽量将其分拆化小。其他控制变量并不显著。总体而言,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大额关联销售具有抑制作用。

3. 假设 2 的回归结果

假设 1 的检验结果表明,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那么, 这一抑制作用对公司价值有何影响呢? 利用模型 2~1, 2~2, 2~3 对假设 2 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模型 2~1 中 $Indep_{t,i}$ 为 $Reput_{t,i}$; 模型 2~2 中 $Indep_{t,i}$ 为 $Index_{t,i}$; 模型 2~3 中 $Indep_{t,i}$ 为 $Comp_{t,i}$ 。
 $Reput_{t,i}$ 和 $Index_{t,i}$ 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独立董事的声誉越高, 公司价值越大, 同时独立董事专业背景对公司价值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 $Comp_{t,i}$ 的系数为 -0.33, 在 1% 水平下显著, 表明当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较高时, 有可能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 降低公司的价值。与预

表 3 假设 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预测符号	TQ _{t,i} 2~1		TQ _{t,i} 2~2		TQ _{t,i} 2~3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Intercept	?	3.88***	15.73	3.72***	15.64	3.89***	18.05
Indep _{t,i}	+	0.06***	7.26	0.07***	3.92	-0.33***	-3.32
Indep _{t,i} × PerDum _{t,i}	+	-0.02***	-3.47	-0.06***	-3.74	-0.08***	-2.73
Size _{t,i}	-	-0.11***	-9.33	-0.10***	-8.90	-0.11***	-10.76
Lev _{t,i}	?	0.11*	1.67	0.15**	2.23	0.14**	2.21
Roe _{t,i}	+	0.12***	5.88	0.11***	5.38	0.11***	5.69
Sh _{t,i}	-	-0.91***	-12.82	-0.90***	-12.90	-0.84***	-12.95
N			4675		4804		5260
Adjust-R ²			0.077		0.067		0.069
F 值			66.37		58.22		65.55

注: *** 表示 1% 水平下显著, ** 表示 5% 水平下显著, * 表示 10% 水平下显著。

期不一致的地方在于 $Indep_{t,i} \times PerDum_{t,i}$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在 1% 水平下显著,即大额关联销售比重高的公司,公司价值反而较大。这表明 2001 年《指导意见》要求独立董事对关联销售进行监管是有一定成效的,独立董事的声誉和比例越高,越会抑制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因此,如果经理层担心盈余管理动机下的大额关联销售会被独立董事高度关注,就会将其分拆化小,以降低被独立董事识别的可能性。真正能继续存在的大额关联销售可能本身就含有较少盈余操纵的信息含量,在市场上就会表现为独立董事的声誉越高、比重越大、专业性越强时,大额关联销售比率的提高反而会被识别为好的信息,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总体来看,在独立董事发挥其独立性的条件下,假设 1、假设 2 的结果得到了相互印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大额关联销售的发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4. 敏感性测试

为加强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选用股价 $Price_{t,i}$ 作为公司价值的替代变量对假设 2 进行了敏感性测试。 $Price_{t,i}$ 为 i 公司 t 年 12 月 31 日股票收盘价。结果如表 4 所示:

模型 3 ~ 1 中 $Indep_{t,i}$ 为 $Reput_{t,i}$; 模型 3 ~ 2 中 $Indep_{t,i}$ 为 $Index_{t,i}$; 模型 3 ~ 3 中 $Indep_{t,i}$ 为 $Comp_{t,i}$ 。

表 4 中 $Reput_{t,i}$ 的系数为 0.48, 在 1% 水平下显著; $Index_{t,i}$ 的系数为 0.42, 在 5% 水平下显著。这与表 3 的检验结果一致,即独立董事的声誉越高,专业性越强,则公司价值越大。 $Comp_{t,i}$ 的系数为负值,且在 1% 水平下显著。 $Indep_{t,i} \times PerDum_{t,i}$ 的系数均为负值,这与表 3 结果基本一致,即大额关联销售比重高的公司价值较大。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

总体而言,敏感性测试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 4 假设 2 敏感性测试

变量	预测符号	Price _{t,i} 3 ~ 1		Price _{t,i} 3 ~ 2		Price _{t,i} 3 ~ 3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Intercept	?	-20.81***	-6.44	-16.98***	-5.79	-14.26***	-5.30
Indep _{t,i}	+	0.48***	4.61	0.42**	2.05	-4.82***	-3.92
Indep _{t,i} × PerDum _{t,i}	+	-0.35***	-3.00	-0.40	-1.59	-1.62*	-1.96
Size _{t,i}	-	1.50***	9.46	1.37***	9.55	1.33***	10.09
Lev _{t,i}	-	-4.41***	-5.01	-4.53***	-5.60	-4.38***	-5.74
Roe _{t,i}	+	1.54***	5.69	1.36***	5.58	1.46***	6.15
Sh _{t,i}	-	-1.53*	-1.64	-1.92**	-2.23	-2.18***	-2.69
N		4673		4801		5257	
Adjust-R ²		0.04		0.03		0.03	
F 值		34.55		28.27		29.92	

注:***表示 1% 水平下显著,**表示 5% 水平下显著,*表示 10% 水平下显著。

$Comp_{t,i}$ 的系数为负值,且在 1% 水平下显著。 $Indep_{t,i} \times PerDum_{t,i}$ 的系数均为负值,这与表 3 结果基本一致,即大额关联销售比重高的公司价值较大。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

六、研究结论

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董事制度的效率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研究独立董事独立性与异常关联销售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是独立董事的声誉、专业背景和独立董事人员的比例对大额关联销售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二是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不过这种价值的提升可能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抑制大额关联销售实现的,市场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并未能有效识别大额关联销售比例下降带来的企业价值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包含很多方面,本文选取的其中三个指标并不能概括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立董事相关的其他指标对关联销售甚至整个关联交易的影响是后续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Khanna T, Palepu K. Why focused strategy may be wrong in emerging market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7, 75

(4): 41 - 51.

- [2] Wong T J, Jian M. Propping through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0, 15(1): 70 - 105.
- [3] 李增泉, 孙铮, 王志伟. “掏空”与所有权安排——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04(12): 3 - 13.
- [4] 李增泉, 余谦, 王晓坤. 掏空、支持与并购重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05(1): 95 - 105.
- [5] 罗党论, 唐清泉. 独立董事制度实施效果分析——基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证据[J]. *南方经济*, 2006(9): 65 - 74.
- [6] 唐清泉, 罗党论, 王莉. 大股东的隧道挖掘与制衡力量——来自中国市场的经验证据[J]. *中国会计评论*, 2005(3): 63 - 86.
- [7] 王跃堂, 涂建明. 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 掏空、支持, 抑或是价值最大化? [J]. *中国会计评论*, 2006(4): 119 - 124.
- [8] 肖星, 王琨. 企业集团特征与成员企业价值[J]. *中国会计评论*, 2006(4): 1 - 14.
- [9] 高雷, 宋顺林, 薛云奎. 关联交易、企业价值与公司特征——来自上市公司 2000—2004 年的经验证据[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7(9): 53 - 82.
- [10]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3): 1131 - 1150.
- [11] Johnson S,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et al. Tunneling[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2): 22 - 27.
- [12] Bae K H, Kang J K, Kim J M. Tunneling or value added?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6): 2695 - 2740.
- [13] Bertrand M. Ferreting out tunneling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1): 121 - 148.
- [14] Strickland D, Wiles K W, Zenner M. Is small shareholder monitoring effectiv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6, 40(2): 319 - 338.
- [15] Charu G, Raheja C. Determinants of board size and composi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5, 40(2): 283 - 306.
- [16] 王跃堂, 朱林, 陈世敏. 董事会独立性、股权制衡与财务信息质量[J]. *会计研究*, 2008(1): 55 - 62.
- [17]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 1983, 26(2): 301 - 325.
- [18] Cotter J F, Shivdasani A, Zenner M. Do independent directors enhance target shareholder wealth during tender offer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7, 43(2): 195 - 218.
- [19] 洪剑峭, 方军雄. 关联交易和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J]. *中国会计评论*, 2005(3): 87 - 98.

[责任编辑: 马志娟]

Independ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Related Party Sale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Stock Market

XU Gaoyan

(Institut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policy concerni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supervision over related transaction, we find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based on the related transaction. Based on this, after studying the impac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the company's irregular related sales and firm value, we find such enhanced independence is helpful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he irregular related transaction. After the release of Guiding Opin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System, the irregular related sales decreases and such sales also become “cleaner”. The restraint from the independence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the irregular related party sale in China is not only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policy's impact, but also it can promot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Key Words: irregular related party sale; independent directors; independence; firm value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扩展的 STIRPAT 模型分析

孙敬水, 陈稚蕊, 李志坚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深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 基于扩展的 STIRPAT 模型, 利用 1990 年—2009 年统计数据, 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等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量影响不显著; 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影响因素, 且其贡献率也最大; 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负向影响因素, 其对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低碳经济; 能源结构; 回归分析; 能源强度; STIRPA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11)04-0085-09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议定书》等, 都是围绕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分担等问题进行激烈的国际谈判后形成的约束性文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 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阶段。在这个阶段, 生产和生活能源消耗量必将不断增长, 且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另外, 我国以煤炭为主、多种能源互补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碳排放量的降低, 从而使得碳排放呈现总量大、增长快的特点。事实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大国, 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压力, 因此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效途径, 也是获得世界低碳革命的先发优势和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是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低增长或负增长^[1]。由此可以认为, 温室气体排放(本文主要指二氧化碳排放)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围绕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问题,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基于 IPAT

[收稿日期] 2011-02-20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0CGYD22YB)

[作者简介] 孙敬水(1958—), 男, 安徽蚌埠人,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社长, 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陈稚蕊(1986—), 女, 安徽蚌埠人,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李志坚(1987—), 男, 湖南永州人,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

方程的驱动力分析和基于 Kaya 模型的碳排放驱动因子分析。Ehrlich(艾利希)等提出了 IPAT 方程,认为碳排放的驱动力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等因素的综合作用^[2]。日本学者 Kaya(卡亚)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反映人口、经济、能源等与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认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等于人口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等因子的乘积^[3]。Dietz(迭特滋)等在 Kaya 模型基础上建立了 IPAT 方程的随机模型——STIRPAT 模型。他将指数引入该模型使模型能用于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的非比例影响^[4]。Wang(王)等采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LMDI)对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代表技术因素的能源强度是减少碳排放量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能源结构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5]。国内学者对碳排放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进展较快,学者们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率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庄贵阳提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工业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源禀赋等^[6]。胡初枝等通过对我国六部门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提出能源强度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并且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碳排放量的减少有一定影响^[7]。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在不同阶段依靠的驱动力是不一样的^[8]。宋德勇等认为,产出规模和能源效率是对碳排放量的增减起关键作用的变量^[9]。王锋等采用对数平均 Divisia 指数分解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影响因素,生产部门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最重要因素^[10]。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进一步探讨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由于相关数据的缺乏,学者们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较少,且结论说服力也不强。目前对低碳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等方面,而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等角度探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却较少。此外,现有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从总量角度来进行分析,而对人均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探讨则较少。实证表明,不同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及贡献率是不一致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对 STIRPAT 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实证分析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等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贡献率,探讨减少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得出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

二、变量、模型与数据

碳排放主要源于石化能源的消耗,但碳排放量的增减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石化能源消耗,因为碳排放量的变化还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等因素的影响。

(一) 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解释变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人口规模(P)。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具有正向影响。首先,人口越多,使用和消耗的能源就越多,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也就越大。其次,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增加了碳排放量。但也有例外,随着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环境的需求增加,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减少碳排放和改善环境质量的能力也随之提升,这会使得人口规模对碳排放产生负向影响。

2. 经济发展水平(A)。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量煤炭、石油等石化能源的投入和使用,而能源消费的增加必然会促进碳排放量的增加。我国目前刚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处在能源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时期,碳排放量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

3. 能源强度(T)。能源强度是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量来表征能源系统的投入产出

特性,它反映了能源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率。能源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较大,能源强度越高,碳排放量就越大。

4.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CT)。单位能耗碳排放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对碳排放总量具有直接影响。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越大,碳排放总量就越大,反之碳排放总量则越小。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主要是由碳排放系数、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捕获技术所决定的。

5. 能源消费结构(CS)。能源消费结构趋于低碳化将会减少碳排放量。多年来,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这使得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的状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优化能源结构,用低碳能源逐步替代煤炭等高碳能源。

6. 产业结构(S)。不同产业部门消耗的能源类型和结构是不同的,导致碳排放量也各不相同。由于第二产业终端能源消费占到全部终端能源消费的60%以上,因此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碳排放量的变化。也就是说,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越高,碳排放量就越大。

7. 城市化水平(U)。城市化水平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是人口、交通、工业等各种资源的集中地,也是能源消耗、碳排放的集中地。城市化水平越高,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也就越大。

8. 国际贸易分工(EX)。由于各国存在国际分工、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各方面的差异,这使得国际贸易中存在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因此国际贸易分工也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具有双重作用:进口高耗能的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则减少了本地区此类产品的生产,从而减少碳排放量;而出口高耗能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则增加了本地区此类产品的生产,从而增加碳排放量。

(二) 扩展的 STIRPAT 模型

STIRPAT 模型是 IPAT 方程的随机形式。IPAT 方程是一个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量化模型,其一般表示为: $I = P \times A \times T$ 。其中 I 为二氧化碳排放量,P 为人口总量,A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 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的二氧化碳,即碳排放强度 $T = \text{二氧化碳排放量} / \text{国内生产总值}$ 。IPAT 方程结构简单、易于操作,已在能源与环境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它考察的变量数目有限,所能得到的研究结果基本限于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经济及人口在宏观上的量化关系以及对因变量的等比例影响,这成为该方程的最大局限。

为了克服 IPAT 方程的不足,迭特滋等建立了 IPAT 方程的随机模型——STIRPAT 模型,其表示为: $I_t = aP_t^{\alpha_1} A_t^{\alpha_2} T_t^{\alpha_3} e^{\varepsilon_t}$ 。其中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分别表示人口总量、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强度的弹性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指数的引入使得该模型可用于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的非等比例影响。

除了上述变量外,本文引入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等变量对 STIRPAT 模型进行扩展。扩展后的 STIRPAT 模型为:

$$I_t = aP_t^{\alpha_1} A_t^{\alpha_2} T_t^{\alpha_3} CT_t^{\alpha_4} S_t^{\alpha_5} CS_t^{\alpha_6} U_t^{\alpha_7} EX_t^{\alpha_8} e^{\varepsilon_t} \quad (1)$$

其中,I 为二氧化碳排放量,P 为人口总量,A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T 为能源强度,CT 为单位能耗碳排放量,S 为产业结构,CS 为能源消费结构,U 为城市化水平,EX 为国际贸易分工, ε 为随机误差项。其中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alpha_4, \alpha_5, \alpha_6, \alpha_7, \alpha_8$ 分别表示人口总量、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的弹性系数。与传统的 STIRPAT 模型相比,扩展后的模型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1) 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将该模型化为线性回归模型(这可以减弱各变量指标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考虑到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 $\ln T_t$ 与 $\ln CT_t$ 以及 $\ln S_t$ 与 $\ln U_t$ 的乘积,即:

$$\ln I_t = \alpha_0 + \alpha_1 \ln P_t + \alpha_2 \ln A_t + \alpha_3 \ln T_t + \alpha_4 \ln CT_t + \alpha_5 \ln T_t \times \ln CT_t + \alpha_6 \ln S_t + \alpha_7 \ln U_t + \alpha_8 \ln S_t \times \ln U_t + \alpha_9 \ln CS_t + \alpha_{10} \ln EX_t + \varepsilon_t \quad (2)$$

$$\ln PI_t = \beta_0 + \beta_1 \ln A_t + \beta_2 \ln T_t + \beta_3 \ln CT_t + \beta_4 \ln T_t \times CT_t + \beta_5 \ln S_t + \beta_6 \ln U_t + \beta_7 \ln S_t \times \ln U_t + \beta_8 \ln CS_t + \beta_9 \ln EX_t + \varepsilon_t \quad (3)$$

(3)式为人均碳排放量的STIRPAT模型(各变量解释同上)。在用多元回归方程分析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时,由于解释变量或影响因素所用的单位不同,数据的大小差异往往很大,这不利于用同一标准进行比较。为了消除量纲不同和数量级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样本数据(对数形式)作标准化处理,即将每个变量(对数样本数据)减去各自的均值,然后除以其标准差,得到新的变量和新的模型,再用计量方法估计未知参数,求得标准化回归系数。有了标准化回归系数后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就容易进行比较了。将(2)式和(3)式中每个变量标准化后(加上“*”以示区别)就变为新的计量经济模型,即:

$$\ln I_t^* = \alpha_1 \ln P_t^* + \alpha_2 \ln A_t^* + \alpha_3 \ln T_t^* + \alpha_4 \ln CT_t^* + \alpha_5 \ln T_t^* \times \ln CT_t^* + \alpha_6 \ln S_t^* + \alpha_7 \ln U_t^* + \alpha_8 \ln S_t^* \times \ln U_t^* + \alpha_9 \ln CS_t^* + \alpha_{10} \ln EX_t^* + \varepsilon_t \quad (4)$$

$$\ln PI_t^* = \beta_1 \ln A_t^* + \beta_2 \ln T_t^* + \beta_3 \ln CT_t^* + \beta_4 \ln T_t^* \times \ln CT_t^* + \beta_5 \ln S_t^* + \beta_6 \ln U_t^* + \beta_7 \ln S_t^* \times \ln U_t^* + \beta_8 \ln CS_t^* + \beta_9 \ln EX_t^* + \varepsilon_t \quad (5)$$

模型中各变量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中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碳排放量(万吨)	I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135673.2	52340.73	248270.7	80610.9
人口规模(万人)	P	人口总量	125301.2	5952.8	133474	114333
人均碳排放量(吨)	PI	碳排放量与人口总量之比	1.07	0.37	1.86	0.71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元)	A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物价指数	4626.87	2635.39	10638.33	1632.76
能源强度	T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3.28	0.93	5.29	2.16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	CT	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之比	0.81	0.01	0.82	0.77
产业结构(%)	S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46.09	2.03	48.7	41.3
能源消费结构(%)	CS	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	71.09	3.39	76.2	66.3
城市化率(%)	U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35.33	7.27	46.60	26.40
国际贸易分工(%)	EX	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23.31	7.10	36.61	14.96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下同。

(三) 数据来源

由于石化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因此本文选取碳足迹测量法对石化能源消耗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进行计算。我们将消费的能源分为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八类,根据全国历年各类能源消耗量和各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计算出历年的碳排放量。为了消除物价水平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本文以1990年为基期,用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鉴于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石油和天然气及其他新能源使用比例较小,本文中的能源消费结构用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国际贸易分工用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

三、实证分析

1990年—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图1显示能源消费总量由1990年的98703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09年的306647万吨标准煤,增加了2.11倍,年均增长6.25%;碳排放

总量由1990年的80611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248271万吨,增加了2.08倍,年均增长6.23%。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在20年间变化几乎一致,其平均增长率仅相差0.02%,且两者在2001年后都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1990年—2009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人均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图2显示,人均能源消费量由1990年的0.863吨标准煤增加到2009年的2.297吨标准煤,增加了1.67倍,年均增长5.4%;人均碳排放量由1990年的0.705吨增加到2009年的1.860吨,增加了1.64倍,年均增长5.37%。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在20年间变化趋势也几乎一致,其平均增长率仅相差0.03%,2001年后两者也都显现快速上升的趋势。

图3显示,碳排放总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走势基本保持一致。1990年—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4%,均快于碳排放总量增长率与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率,这说明能源强度不断减弱,使碳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不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趋势与碳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几乎一致,表明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正向相关性。同时,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碳排放总量之间存在较强正向相关关系,但由于控制碳排放的相关技术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因此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增长率也几乎不变。在国际贸易方面,净出口增长率变化波动大于碳排放总量增长率变化波动且两种之间存在微弱的反向作用;在城市化水平方面,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总量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城市化增长率与碳排放总量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明显。

(一) 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计量模型分析

由于对非平稳数据变量直接建立模型会产生虚假回归,本文将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若为非平稳的同阶单整时间序列,则需要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经验证,各变量时间序列(对数形式)为非平稳、一阶单整序列,因此需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根据前面所述的(4)式和(5)式,我们利用各变量数据和EViews6.0软件,得到回归结果(见下页表2)。表2中的模型1至模型4中残差为平稳序列,即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由表2中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 $\ln P^*$ 、 $\ln A^*$ 、 $\ln T^*$ 、 $\ln CT^*$ 、 $\ln T^* \times \ln CT^*$ 、 $\ln S^* \times \ln U^*$ 、 $\ln CS^*$ 对 $\ln I^*$ 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不显著。模型2的回归结果最好,各回归系数均显著,拟合优度非常高,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由表2中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 $\ln A^*$ 、 $\ln T^*$ 、 $\ln CT^*$ 、 $\ln U^*$ 、 $\ln EX^*$ 对 $\ln PI^*$ 有显著影响,其中模型4的回归结果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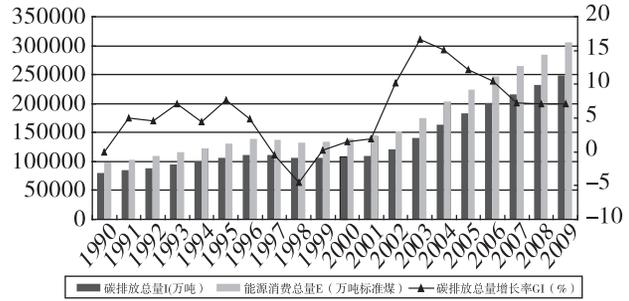


图1 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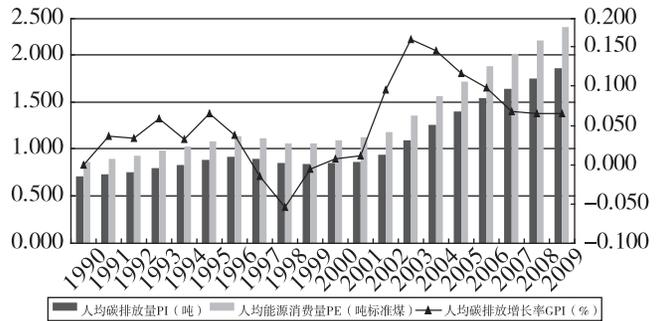


图2 人均碳排放量、人均能源消费量与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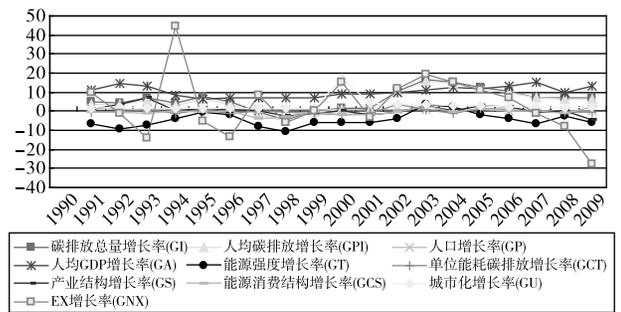


图3 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增长率

表 2 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碳排放总量(对数形式 lnI*)				人均碳排放量(对数形式 lnPI*)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oefficient	t-Prob	Coefficient	t-Prob	Coefficient	t-Prob	Coefficient	t-Prob
lnP*	0.136704	0.0000	0.136727	0.0000				
lnA*	1.571421	0.0000	1.571395	0.0000	1.785804	0.0000	1.785866	0.0000
lnT*	0.772815	0.0000	0.772815	0.0000	0.878311	0.0000	0.878303	0.0000
lnCT*	0.045839	0.0000	0.045840	0.0000	0.052022	0.0000	0.052081	0.0000
lnT* × lnCT*	2.27E-05	0.0123	1.99E-05	0.0051	1.99E-08	0.0167	2.66E-08	0.0002
lnS*	5.13E-06	0.3536			1.00E-08	0.0645		
lnU*	1.26E-05	0.5431			3.40E-07	0.0000	3.41E-07	0.0000
lnS* × lnU*	8.77E-06	0.0321	8.16E-06	0.0119	4.27E-09	0.2880		
lnCS*	3.30E-05	0.0331	4.24E-05	0.0031	1.47E-09	0.8985		
lnEX*	2.29E-06	0.7946			2.35E-08	0.0013	2.01E-08	0.0005
Adjusted-R ²	1.000000		0.999998		1.000000		0.999106	
DW	2.052516		1.683785		2.650377		2.375955	

从表 2 可以看出,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国际贸易分工则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显著。从模型 2 的回归系数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弹性、能源强度弹性、人口规模弹性、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弹性,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 1.571395,0.772815,0.136727 和 0.04584,即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每提高 1% 时,碳排放总量增长率将依次为 1.5714%、0.7728%、0.1367%、0.0458%,而其他变量弹性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对碳排放总量正向影响的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大,能源强度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影响较小,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影响最小。

表 2 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对人均碳排放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的交互作用对人均碳排放量影响不显著。从模型 4 的回归系数看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弹性、能源强度弹性、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弹性,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 1.785866,0.878303 和 0.052081,即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每提高 1% 时,人均碳排放量的增长率将依次为 1.7859%、0.8783% 和 0.0521%,而其他变量弹性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对人均碳排放量正向影响的因素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影响最大,能源强度影响较大,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影响最小。

(二) 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率分析

由表 2 中的模型 2 可知,对碳排放总量正向影响较大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hat{\alpha}_1 = 0.136727$, $\hat{\alpha}_2 = 1.571395$, $\hat{\alpha}_3 = 0.772815$, $\hat{\alpha}_4 = 0.045840$;由模型 4 可知,对人均碳排放量正向影响较大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hat{\beta}_1 = 1.785866$, $\hat{\beta}_2 = 0.878303$, $\hat{\beta}_3 = 0.052081$ 。将模型 2 和模型 4 的回归系数做归一化处理,处理后的系数为: $\delta_i = \hat{\alpha}_i / \sum \hat{\alpha}_i (i = 1, 2, 3, 4)$, $\gamma_j = \hat{\beta}_j / \sum \hat{\beta}_j (j = 1, 2, 3)$,有 $\sum \delta_i = 1$, $\sum \gamma_j = 1$ 。各影响因素变动对碳排放总量变动和人均碳排放量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 $\delta_i G_i / GI (i = 1, 2, 3, 4)$ 和 $\gamma_j G_j / GPI (j = 1, 2, 3)$ 。其中 G_i 为各影响因素增长率, GI 为碳排放总量增长率, GPI 为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率。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贡献率的计算结果见下页表 3。

由表 3 可知,1990 年—2009 年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长 6.23%,分解后的各影响因素中,人口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其贡献率分别为 1.10% 和 152.49%;而能源

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则表现为负效应,其平均贡献率依次为-36.62%和-0.63%。

1990年—2009年人均碳排放量平均增长5.37%,分解后的各影响因素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平均贡献率为98.15%;而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则表现为负效应,平均贡献率分别为-9.60%和-0.24%。

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1990年—2009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是现阶段碳排放总量增加、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主导因素,其贡献率最大。人口规模对现阶段碳排放总量的增加也具有正向影响,但由于人口年均增长率(0.82%)较小,因此人口年均增长率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率较小。1990年—2009年我国能源强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年均下降4.54%,其对碳排放总量变动与人均碳排放量变动负向驱动的贡献率最大,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较小,对碳排放总量变动与人均碳排放量变动负向驱动的贡献率较小。尽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对碳排放总量变动表现为微弱负效应,但也表明我国能源结构优化成效初步显现。

一般来说,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及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对碳减排的贡献有限,因此能源效率的提高更多地来自技术进步。换言之,技术进步是导致能源强度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降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

表3 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贡献率

年份	对碳排放总量变动的贡献率(%)				对人均碳排放量变动的贡献率(%)		
	人口规模变动 P _c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变动 A _c	能源强度变动 T _c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 CT _c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变动 A _{ac}	能源强度变动 T _{ac}	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 CT _{ac}
1990	-	-	-	-	-	-	-
1991	1.42	142.59	-41.99	-0.06	207.02	-60.96	-0.09
1992	1.39	203.45	-63.75	-0.25	292.72	-91.73	-0.36
1993	0.87	114.61	-30.68	0.21	146.19	-39.11	0.27
1994	1.37	121.52	-25.66	-0.53	173.86	-36.71	-0.75
1995	0.75	53.42	-3.11	0.17	66.23	-3.85	0.22
1996	1.16	89.05	-12.65	-0.37	121.11	-17.20	-0.50
1997	-10.54	-821.40	478.49	-1.09	-297.50	173.31	-0.39
1998	-1.09	-92.11	73.36	0.21	-81.81	65.16	0.19
1999	18.48	1778.88	-771.17	-7.32	-784.83	340.24	3.23
2000	2.67	377.80	-120.06	-2.26	794.77	-252.56	-4.75
2001	2.04	302.65	-96.52	-1.43	517.51	-165.04	-2.44
2002	0.34	60.61	-12.56	0.70	68.88	-14.27	0.80
2003	0.20	40.54	6.16	0.13	44.73	6.80	0.14
2004	0.21	51.89	5.07	-0.10	57.41	5.61	-0.11
2005	0.26	60.63	-4.48	0.22	67.76	-5.01	0.25
2006	0.27	79.72	-11.20	0.13	89.26	-12.54	0.14
2007	0.38	129.95	-28.97	-0.12	148.64	-33.13	-0.14
2008	0.39	85.69	-11.83	-0.05	98.08	-13.55	-0.06
2009	0.39	117.84	-24.33	-0.11	134.80	-27.84	-0.13
均值	1.10	152.49	-36.62	-0.63	98.15	-9.60	-0.24

注:P_c、A_c、T_c、CT_c依次表示人口规模变动、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变动、能源强度变动、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对碳排放总量变动的贡献率;A_{ac}、T_{ac}、CT_{ac}依次表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变动、能源强度变动、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变动对人均碳排放量变动的贡献率。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鉴于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对 STIRPAT 模型进行了扩展,实证研究了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等因素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贡献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交互作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国际贸易分工则对碳排放总量影响不显著。

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与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接近于 1;人口规模与碳排放总量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但人口总量的增加对碳排放总量增加只有较弱的推动作用;能源强度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增加的贡献率为负,这说明能源强度的变动与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

第三,从影响程度上来讲。经济发展水平对碳排放总量正向影响最大,即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正向影响因素;能源强度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负向影响最大,即可以通过改变能源强度来抑制碳排放总量的增加。

总之,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是碳排放总量增加的主导因素。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满足国民生存与发展基本需求的必要条件,能源消费作为维持经济系统运行的一项基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强度和满足国民生活需要的能力,其所导致的碳排放量的增加也是在所难免的。在目前的发展模式下,如果要大幅减少碳排放量,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因此,我国必须权衡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确保经济发展不受影响的条件下,显著减少碳排放,实现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双赢。

笔者认为,我国要减少碳排放、向低碳经济转型,应实行以下政策:

第一,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首先要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降低煤炭、石油等石化能源的消费比例;其次要改变能源结构相对单一的局面,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水能、太阳能、核能、潮汐能和生物质能等,加快以石化能源为主向以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结构转变。

第二,加强低碳技术创新,降低能源强度。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因此,我国要逐步建立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自然碳汇等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要加大能源科技投入,加快技术升级,改进生产工艺,减少能源在生产、转换、运输及消费过程中的损失,实现技术节能;构建有利于低碳技术发展的制度框架,通过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办法鼓励企业引进高效节能设备,实现低碳技术的更新。

第三,加快发展低碳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实证研究显示,碳排放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企业。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能够采取调整产业结构的措施,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减少碳排放量的贡献率就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我国一方面要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提高高碳产业进入的门槛,限制其发展,同时利用低碳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使高碳产业低碳化;另一方面要引导、鼓励和扶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提高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增强低碳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第四,控制人口规模,提高公众低碳意识。实证研究显示,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正向作用,人口增加不仅造成生存空间的挤压,而且加大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逐年提高,居民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相应提高,这将给碳减排带来新的压力。因此,我国要实现节能减排

目标,就必须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控制人口规模,注重优化人口结构与人口素质;同时政府要注重提高公众的低碳意识,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宣传力度,大力倡导低碳消费、绿色消费的理念,引导居民消费模式向可持续的低碳消费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孙桂娟,殷晓彦,孙相云,等. 低碳经济概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6-27.
- [2]Ehrlich P R, Ehrlich A H.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issues in human ecology[M]. San Francisco: Freeman, 1970:89-157.
- [3]Kaya Y. Impact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GNP growth: interrelation of proposed Scenarios[R]. Paris: Presentation to the Energy and Industry Subgroup, Response Strategies Working Group, IPCC, 1989:1-25.
- [4]Dietz T, Rosa E A. Reth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J]. Human Ecology Review, 1994(1):277-300.
- [5]Wang Can, Chen Jining, Zou Ji. Decomposition of energy-related CO₂ emission in China: 1957—2000[J]. Energy, 2005(30):73-83.
- [6]庄贵阳. 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M]. 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24-67.
- [7]胡初枝,贤金,钟太洋. 中国碳排放特征及其动态演进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38-42.
- [8]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53-73.
- [9]宋德勇,卢忠宝. 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周期性波动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18-24.
- [10]王锋,吴丽华,杨超. 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研究[J]. 经济研究,2010(2):123-136.

[责任编辑:杨志辉,陆惠敏]

A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xtended STIRPAT Model

SUN Jingshui, CHEN Zhirui, LI Zhi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Industr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Profound discussion on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changing developmental patterns and building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From aspects of the pop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nergy intensity,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carbon emission,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low-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y using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09, this paper extends STIRPAT model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main factors and contribution rate affecting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GDP per capita, energy intensity, population,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carbon emission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division has a very small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 continued growth in GDP per capita is the largest positive contribution on the growth of carbon; while change in energy intensity has an inhibition in the growth of carbon emiss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empirical results, this paper presents a policy recommendation to maximize the existing energy structure,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 more low-carbon industry and i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ntrol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public awareness in this regard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 energy structure; regression analysis; energy intensity; STIRPAT model

后危机时代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

王晓青, 李 涛

(南京审计学院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在研究国内外金融结构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特性,对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体系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分业经营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对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更具有防范系统风险的作用,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在监管缺失下更容易发生危机。因此,展开金融业竞争、加强法制、在合理监管体制下促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体系运作效率是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金融结构;金融监管;后危机时代;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4-0094-08

一、引言

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当前的金融体系产生了疑问: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更容易产生金融危机?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最适应经济发展?当今,尽管各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已经开始重新设计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但是否有效仍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现有文献从分析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出发,比较研究了银行和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即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哪个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不同的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资金配置、分散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各有优势和劣势,单方面讨论金融体系的特性往往难以得出何种金融体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1]。本文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并比较分析危机中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这两种金融体系的表现,阐述中美两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要素禀赋结构、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对各自经济体融资特征的影响,并得出政府政策、法律、文化及国际环境等因素会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的结论,进而强调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作用。

二、金融体系理论分析

(一) 关于金融结构的研究

对金融结构的系统性研究可以追溯到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2],此后的“两分法”是继戈德

[收稿日期]2010-12-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YJC790146);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指导项目(2010SJD790013);南京审计学院校级科研项目(NSK2009/B21)

[作者简介]王晓青(1973—),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农业经济、农村金融研究;李涛(1972—),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房地产经济、土地经济研究。

史密斯理论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金融结构发展理论。该理论通常将金融结构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类,前者以英美两国为代表,而后者以德日两国为代表^[3]。然而,随着现代金融内涵和外延的发展,目前英美和德日等国家的金融结构已逐渐趋于相似,但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金融结构仍差异显著^[4]。因此,林毅夫等将金融结构定义为金融体系内部各种不同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1]。

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制度安排,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比重对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发挥会产生重要影响。学者们在对何种金融结构更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形成了银行主导学派和市场主导学派^[5]。银行主导学派^①认为,银行等金融中介易于获得企业的有关信息从而降低信息搜集和管理成本,有利于银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对企业实施控制。市场主导学派^②则强调势力强大的金融中介机构对企业的影响力较大且具有天生的谨慎倾向性,这不利于公司创新和增长,而金融市场则能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风险产品和工具,有利于公司改善治理结构^[6-8]。

银行主导学派和市场主导学派的争论虽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但双方都强调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因而都称为“金融结构非中性观”。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结构中中性观”则弱化这一相关性,反对用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区分来判定金融体系的优劣。这类观点主要包括金融功能观、服务观、法律观等非结构论^③,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更关注如何改善银行体系、市场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功能,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率。

(二) 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之间的互补共生关系

“金融结构非中性观”强调的是银行和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之间并非是替代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按照传统理论,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金融中介的作用应该下降,但事实上,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金融中介成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金融中介实际上是替代个人参与金融市场而非替代金融市场;二是风险管理成为金融中介最核心的业务,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正是金融中介越来越多地使用新金融衍生工具的结果。因此,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3],可为实体经济提供互补的金融服务。

由于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各有其优势和劣势,我们在分析比较不同金融体系时应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的特性相结合。林毅夫等认为,一国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以及不同产业中企业的规模、风险和融资需求等,从而形成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这是决定金融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与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相匹配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的,才能有效发挥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降低系统风险方面的比较优势,促进企业成长、要素禀赋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发展。因此,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其内生动态的最优金融结构,从横向和纵向上看都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经济发展阶段和所有经济体的金融结构。此外,国内政策、法律、文化及国际环境等因素会加快或缩短一国金融结构随实体经济发展而演变的过程,但不会根本改变这种趋势^[9]。

(三) 金融监管与金融体系稳定的关系

一般来说,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斯蒂芬等认为,如果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以风险资本要求为基础的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则无力实现这个目标^[10]。传统金融监管是以单个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为基础,它无法确

①银行主导学派以 Stiglitz、Bencivenga、Rajan、Allen、Chakraborty 等为代表。

②市场主导学派以 Black、Morch、Caprio、Levine 为代表。

③金融功能观、服务观以 Morton、Bodie 和 Levine 等为代表;法律观以 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 Vishny 为代表,又称之为 LLSV 观。

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随着近年全球金融衍生市场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的微观创新行为逐渐背离了金融体系稳健性目标,出现了金融市场监管缺位状况,因而有必要改进传统微观监管模式。Borio(博里欧)全面比较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认为二者既共存于金融监管体系之中,又相互区别。宏观审慎监管是基于微观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是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对金融体系进行风险监测,从而实现金融稳定^[11]。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整个金融体系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都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是维护金融体系及稳定实体经济的必要手段。

综上所述,对一国的金融体系不能简单地说何种金融结构孰优孰劣,而应根据资源、能力和管理质量来判断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是否有最优且能动态变化的金融结构。基于此,本文将考察并比较分析此次金融危机中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这两种金融体系的表现,进而结合最优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讨论后危机时代金融体系完善和创新的路径选择与安排。

三、金融危机中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

(一) 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现状概述

图1中的箭头表示某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换的过程,如以市场导向为特征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金融体系先后经历了从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换的过程,其中美国1933年的金融经营模式曾以分业经营为主(以《美国银行法》颁布为标志),1999年其又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为标志)。德国历来实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的混业经营,所以图1中没有用箭头表示其金融经营模式的变化。日韩两国的金融经营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后分别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21世纪初我国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有限制地开展混业经营,但仍然以分业经营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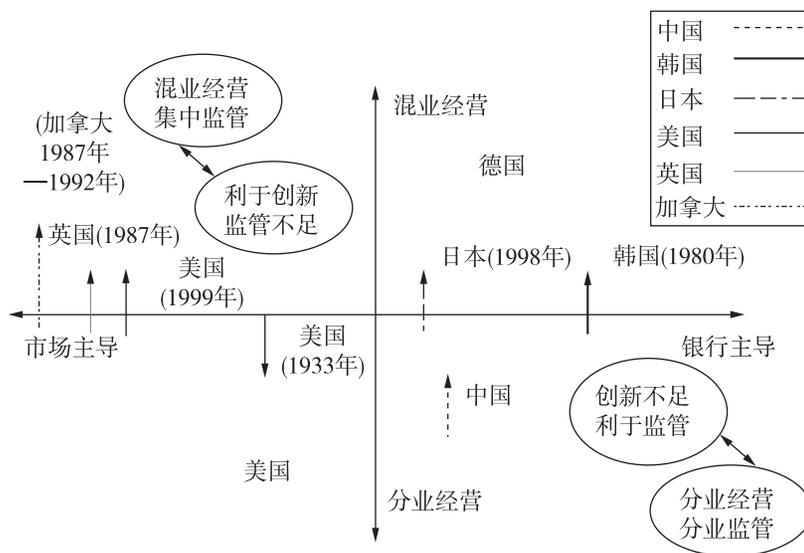


图1 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现状

没有用箭头表示其金融经营模式的变化。日韩两国的金融经营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后分别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21世纪初我国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下有限制地开展混业经营,但仍然以分业经营为主。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无论何种金融制度安排,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都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在金融体系中有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都是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现代的金融市场是以金融中介为主要参与者的市场,且这种市场正在经历两种变化,即传统机构(如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地位下降,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规模剧增;传统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扩展其产品和服务,如将贷款证券化从而使得贷款不再拘泥于资产负债表。当然,本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过度乱地使用新金融衍生工具的结果,导致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相互渗透传递风险,使得最初住房抵押贷款的偿付危机传导为次级债务危机,进而再通过“混业经营”的金融管理体系扩散为全面信用危机^[12]。从总体来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金融创新,以银行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金融统筹^[13]。

(二) 以中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及其在危机中的表现

与经济发展路径相一致,我国金融体系也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历程。在统一的计划体制中,中国人民银行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人民银行实行“统存统贷”的综合信贷管理办法,把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从而形成了“大财政、小金融”的格局和人民银行独家垄断的金融结构,使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产生这一“金融抑制”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政府忽视资本稀缺,人为地扭曲各种要素价格来支持重工业的发展,以国家计划和行政手段取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如控制利率、管制汇率和限制金融市场竞争等。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我国金融业实际上实行的是混业经营模式。然而,由于当时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产业中许多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实施市场导向的混业经营的金融赶超战略反而导致经济中产业链断裂,增加了银行经营风险,造成金融市场混乱。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一系列分业经营法律的出台,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信贷需求膨胀、金融秩序混乱等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现实选择。这些金融法律的出台对稳定我国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抵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说明我国在特定现实条件下实行银行主导型的分业经营是合理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和 product 创新风险较低,且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信息相对不透明,因此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克服企业家风险,以较低的交易成本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有市场经济中共有的金融风险、来自产权不明晰和不正当权力的体制风险以及金融市场不发达产生的风险。其中,体制风险会放大市场经济中共有的金融风险,而分业经营则可以有效缓解体制风险。

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银行主导和政府主导的典型特征,这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承担本应由财政承担的改革成本;二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货币化推动储蓄资源的迅速积累,特别是在政府干预下,更能将少量资源集中用于某些关键项目,从而优于强调竞争和风险分散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储蓄缺口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时,风险高度集中、识别新投资项目能力有限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就应该让位于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资产组合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比例很高,而保险准备金比例则很低。不仅如此,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融资渠道仍是以银行贷款为主,全社会融资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业,而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宏观经济影响则甚微;虽然近几年直接融资比例快速上升,商业银行可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上市银行也得以重返交易所、债市等,但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仍显不足,不利于实体经济

表1 各类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 单位:亿元,%

	2002年		2005年		2008年	
	资产额	占比	资产额	占比	资产额	占比
政策性银行	19529	8.3	29283	7.8	56454	9.0
国有商业银行	133382	56.5	210050	56.1	318358	51.0
股份制商业银行	29977	12.7	44645	11.9	88091	14.1
城市商业银行	11524	4.9	20367	5.4	41320	6.6
城市信用社	1192	0.5	2033	0.5	803	0.1
农村商业银行	306	0.1	5779	1.5	19324	3.1
农村信用社	22025	9.3	31427	8.4	52113	8.4
邮政储蓄	7376	3.1	13787	3.7	22163	3.6
非银行金融机构	7989	3.4	10162	2.7	11802	1.9
外资银行	3038	1.2	7154	1.9	13448	2.2
资产总额	236338	100	374697	100	623876	100

可持续发展。此外,银行业中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银行如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等,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是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有相当部分的控股股东是政府部门。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很难以市场为导向的关键原因之一。表1显示了2002年—2008年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2009》。

的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变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高速发展,随着实体经济中资本的积累加快和企业自生能力的增强,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得以优化,不同产业中企业的规模、风险和融资需求也随之变化,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新的特定需求。同时,由于金融创新,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日益趋同,其经营范围也逐渐模糊了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因此这使得分业经营的前提难以保证。另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对传统银行业的渗透也威胁到商业银行的生存,迫使其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在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创新的背景下,我国如果仍旧拘泥于银行主导的分业经营模式,不仅会束缚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还会压抑金融创新及使金融体系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例如,银行吸收的存款只能用于贷款、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等而不能用于投资,这种规定会降低银行盈利能力,使银行面临巨大的经营风险。又如,《证券法》实施后出现了证券市场融资难的现象,增加了证券投资者和经营者的风险。因此,从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和实现金融业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我国应逐步实施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型,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同时完善和创新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

(三) 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及其在危机中的表现

作为此次金融危机中心的美国,其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表现出来的竞争和创新一直为发展中国家所推崇,成为许多国家金融体系改革转型的方向。然而,从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中的次贷危机开始,延伸为金融机构的次债危机乃至全面信用危机,进而危及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这一危机的传导过程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混业经营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是不是更容易发生危机,后危机时代应如何进行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创新?

美国 1933 年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银行业大倒闭,是美国金融机构禁止混业经营的立法依据。然而,从 60 年代以后该法受到日益激烈的抨击;80 年代以后在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压力和美联储对该法越来越灵活的解释下,该法的作用在许多领域已逐渐失效;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出台标志着金融分业经营的终止。过去的 20 多年中,美国政府最初为促进私人储蓄向退休金账户流动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将存款迅速转化,这使得共同基金在金融中介业务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不受管制的平行银行系统得到迅速发展。与银行相比,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在筹集资金方面成本优势明显,如无需法定准备金、无须支付存款保险费、信息成本低、不设置分支机构和自动存取款设备等。此外,共同基金还直接或间接地从政府金融政策支持中获利,这更增加了其竞争优势。作为平行银行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公司在发放贷款上也不受诸多法律限制,如对资本流动性要求、对个人或机构贷款限制、社区投资标准限制以及获得资金的工具(商业票据)限制等。然而,各种放松管制的措施大量削减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包括对利率、贷款类型和额度、货币供给等控制。

美国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和银行同业间的竞争,严重地限制了商业银行业传统业务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商业银行设计出各种新的金融工具和产品以规避相关法律的约束。理论上讲,金融技术和市场的创新、金融体系和制度的创新以及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可以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机会,推动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然而,美国的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的过度和过乱导致了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使原本仅发生在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断供”问题,通过金融机构广泛参与和投资银行的资产证券化运作以及金融资产交易违约保险机制,扩大为全面的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创新本身无错,但金融创新过度与金融监管薄弱密切相关。美国金融市场运作和监管先后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的过程,这一一直被视作全球典范。而事实上,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美国“双重、多头”监管体制致使监管权限重叠及监管空白,而其中的监管空白为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创造了便利条件。金融监管体制严

重落后于金融创新和市场发展进程,而且其功能性分业监管方法与混业经营不相容,这使得解决金融市场稳定问题更加困难。

(四) 金融危机下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中国金融体系发展进程及危机中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从横向比较,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结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有所不同,这取决于我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特征、最优产业和技术结构、企业特征等因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纵向比较,最优金融结构也会随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特征变化而相应演变。中国现阶段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及最优产业结构决定了分业经营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对防范系统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虽然目前我国国情不适宜实行混业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通过渐变性的金融创新逐步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我国金融结构也应趋向于包括为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大银行、能有效分散技术和产品创新风险的股票市场、能为不同产业中不同规模企业服务的债券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等混业经营体制,同时应加大金融业之间的竞争,促使金融业在合理的金融法规和监管体制下进行金融创新,以便使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

相比而言,美国金融体系在危机中的表现显示了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在监管缺失下更容易发生危机。虽然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但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创新影响了金融业对其客户的保护力度和保护成本,产生了关于金融体系如何对货币政策及实体经济做出反应的根本性问题,尤其在现有金融法规和金融监管框架不能与金融业调整和创新相适应的情况下,这更容易引起金融市场风险的波动,美国的金融结构也更可能偏离其最优路径。因此,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应从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入手,将平行银行系统逐步纳入监管体系,采用相同的监管标准,在宏观层面上对资本市场实施全面监管,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四、后危机时代金融体系调整的政策含义及路径选择

(一) 政策含义

后危机时代对金融体系的调整包含了完善和创新两方面的实质性内容,而在改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金融监管与规避金融管制的金融创新之间如何能达到二者的平衡则是各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方面。以美国为例,金融创新大多出自资本市场、投资银行等管制较松的领域,且多数发生在放松管制之后,这说明管制肯定不利于创新。

另外,次贷危机源自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漏洞,并沿着金融网络蔓延。引入宏观审慎理念,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确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能有效地防止次贷危机的发生。宏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包含了对整个金融体系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关系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就金融体系而言,宏观审慎是从金融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和化解金融风险;就金融稳定与宏观经济间的高度相关性而言,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密切关注并积极地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为金融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经济和社会环境。因此,宏观审慎监管是以系统性风险治理为指向的监管。

(二) 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选择

英美、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旨在弥补监管漏洞、调整金融市场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失衡,而非非回归到严格监管上。要在坚持市场主导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监管机构自身调整来保障金融体系安全运行,就必须把握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度”,同时要重新审视金融创新风险,力图衔接金融风险的微宏观监管框架,从而全面监管金融系统性风险。

在国内金融市场逐步开放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发展趋势下,我国金融体系在危机之后面临着金融创新工具不足与金融监管重构的双重难题,因此我国金融业应借鉴其他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对当前的金融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金融体系调整的路径如下:

1. 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坚持金融体系服务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阶段性特征,这决定了金融体系的混业经营发展与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是渐进的。首先,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合理安排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满足新巴塞尔协议标准,引导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其次,我国应继续保持以国有和股份制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服务机构,同时将银行体系的投资银行等新业务重点纳入新监管框架。再次,我国应积极发展股票、债券市场,稳定投资者信心,加快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业务,调整债券市场结构,推动直接融资工具的发展与成熟。

2. 构建微观审慎的分业监管和宏观审慎的系统性风险监管并存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于我国目前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市场发展不成熟,因此注重单个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传统监管体系的缺陷尚未完全凸显。在当前仍需坚持分业监管的前提下,我国金融业应重新确立有别于分业经营模式并适应混业经营发展趋势的分业监管新框架,形成分业监管新机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具有从金融全局高度监管金融风险的特殊优势,其在当前更适合承担系统性风险监控的职责。然而,中央银行扩权也存在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和银行监管目标之间冲突和扩大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风险的内在缺陷问题,因此在长期中我国有必要建立独立的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来担当金融体系宏观审慎监管职责。

3. 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创新风险管理,实现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市场也缺乏深度和广度。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相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中,德国实行混业经营但创新并不多,日本由于行政隔离,其金融机构间缺乏竞争。我国的金融创新主要是节省成本的工具创新,且金融创新同样明显不足。因此,我国首先应完善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功能,建立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这是创新的有力保障;其次建立各金融行业间的内部竞争机制,这是创新的强大动力;再次应吸取美国“先创新后监管”的教训,把金融创新产品纳入风险监管协调范围,在金融效率和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4.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挥中国在构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我国应建立全球汇率稳定合作机制,维护发展中国家应有权益;倡导建立东亚地区性金融合作机制,保持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五、结论

本文基于金融结构发展理论,结合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的特性,考察并比较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这两种金融体系,并进一步讨论了后危机时代最优金融体系问题。研究发现,各种金融制度安排都有其比较优势和劣势,因而无论何种金融体系,适合本国国情的即为最佳;各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都有不同,最优金融结构应内生于该国现阶段实体经济诸要素和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法律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有可能会使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路径,因而无论何种金融体系都需要宏观审慎监管;改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金融监管与规避金融管制的金融创新之间存在矛盾,这需要正确理解金融创新及风险,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

美国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的过度创新使其金融结构偏离最优路径,而现有金融法规和金融监管框架则不能与金融业调整和创新相适应,容易引发金融市场风险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现阶段实体经济特征决定了分业经营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规避此次危机中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混业经营趋势的凸显,以分业为主导的金融监管体系需形成有效的分业监管新机制方能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后危机时代,我国金融体系的调整应坚持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坚持金融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大竞争、促进金融创新和提高金融体系运作效率,以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同时,我国政府机构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应积极主动制定并维护市场要求的金融监管法律,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协调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发挥中国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中的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 经济研究, 2009(8): 4-17.
- [2]戈德史密斯. 金融与金融发展[M]. 周朔,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 [3]Allen F, Gale D. 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4]Kunt D, Levine A R.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banks,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 [5]Levine R. Bank-based or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s: which is better? [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02, 11: 398-428.
- [6]Chakraborty S, Ray R. Bank-based versus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s: a growth-theoretic analysi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6, 53: 329-350.
- [7]Morck R, Nakamura M. Banks and corporate control in japan[J].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 319-340.
- [8]Jr C, Levine 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finance: concepts and international observations[M]// In financial sector governance: the role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2:17-50.
- [9]林毅夫,章奇,刘明兴.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J]. 世界经济, 2003(1):3-21.
- [10]斯蒂芬. 立足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监管[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9.
- [11]Borio C. Towards a macro-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J]. CES Economic Studies, 2003, 49(2):181-216.
- [12]郭恩才. 解码金融:金融危机及“美国梦”[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 [13]杜亚斌,顾海宁. 影子银行体系与金融危机[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0(1): 82-87.

[责任编辑:杨志辉,许成安]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Post-Crisis Era: A Comparison Analysis of Bank-Based vs. Market-Based

WANG Xiaoqing, LI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evelopment theory about financ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inspec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wo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crisis, comb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ith that of the real economy. Both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its optimal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stitute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bank-based financial structure with separate operation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on guard against systemic risk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ank-based financial system of separate operation has more protection against the systemic risks for China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 is more vulnerable to risks without corresponding supervision.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to a real economy to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competition and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o promot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proper supervision system.

Key Words: bank-based financial system;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structure; financial supervision; post-crisis era; financial innovation

基于产业互动视角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研究

冯海华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随着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愈发明显。为此,基于产业互动视角下研究生产者服务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研究表明,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有利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呈现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化和制造业服务外包能够更好地带动各产业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关键词]产业互动;生产者服务业;产业发展环境;服务外包

[中图分类号]F2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4-0102-09

一、引言

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的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促使各国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1]。因此,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便成为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和内容。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对生产者服务业的社会地位与功能作用进行重新定位,充分认识生产者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将“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利用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和影响力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认为,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若要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就必须了解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将从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的视角构建数理模型,探讨两者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二、文献回顾

生产者服务业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Browning(布朗宁)和 Singelman(辛格曼)于1975年对服务业进行功能性分类时提出的。他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性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2]。然而,不同学者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定义生产者服务业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他们都是从要素密集程度和投入产出关系这两个方面来界定生产者服务业的。现在学术界一般把生产者服务解释为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通过市场向生产者而不是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和劳务,即为其他产品或服务提供中间产品或中间功能服务^[3]。从生产者服务

[收稿日期]2010-11-1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0EYB013)

[作者简介]冯海华(1982—),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服务经济与产业经济研究。

业的内涵和外延来看,其对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是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和加速器^[4-6]。对于生产者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学者们认为两者在总体上表现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联动性关系。程大中认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它已不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领域。他强调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黏合剂”的功能。正因为这一功能使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经济变革与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6-7]。高传胜和刘志彪阐述了生产者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作用,认为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可以降低区域交易成本、深化与泛化专业化分工、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增强地区创新能力等^[8]。总的来说,关于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和“融合论”四种观点。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细分研究领域时还不断将新兴的理论、分析方法和工具融入研究中,努力从全新的角度来寻求新的突破。Krugman(克鲁格曼)和 Marrewijk(马蕾威杰克)以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为视角,通过分析产业间的比较优势来论述生产者服务业在国际间的贸易^[9-10]。程大中采用投入产出法对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影响与推动作用^[7]。当然,更多的学者则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实证检验区域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关系,并提出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但他们对两者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为此,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中 D-S 模型构建关于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模型,分别从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和均衡三个角度来论证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并提出推进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与相关命题

本文参考著名空间经济学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相关模型^[11],并依托该模型构建一个关于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的数理模型。具体来讲,本文首先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探讨消费者选择,然后分析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并论证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的互动发展关系。

(一) 基本假设

假设 1:经济社会中存在三部门,即传统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其中服务业可划分为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且对于同一类消费需求来说,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者服务业是可以内部相互替代的。

假设 2: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可以生产功能效用相似或相近的可替代产品,两部门之间是完全竞争且规模收益不变的;而服务业部门则是垄断竞争的,因为服务业具有即时性和异质性,即服务业受服务时间、地点及人员等因素的影响很大^[12]。

假设 3:存在两种基本生产要素和一种派生出的生产要素。两种基本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派生出的生产要素是作为中间要素投入制造业部门进行再生产的生产者服务业产品。

假设 4:所有经济体(包括消费者和生产部门)均服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即都是以效用或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假设 5:所有消费者可对农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这三类消费品进行自由选择,且其消费遵循“恩格尔定律”^①。也就是说,消费者必须优先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后才去消费制造业产品

^①恩格尔定律是由 19 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得出的一个关于消费结构变化的规律,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

和消费性服务产品,这样才算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假设消费者将所有的收入用于够买食品(农产品)直至达到足够的数量 \bar{G} ;如果消费者的收入多于购买这一数量食品,消费者可以用剩余的收入来购买制造业产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

假设6: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即存在同样的效用函数,且满足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二) 消费者行为

根据以上假设可知所有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即:

$$U = S_s^\alpha M^{1-\alpha}, 0 < \alpha < 1 \quad (1)$$

其中, M 是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量; S_s 是消费性服务产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 α 是常数,表示制造业产品的支出份额。本文假定无论是生产者服务业 S_m 还是消费性服务业 S_s 均符合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具体形式表示如下:

$$S_s = \left[\int_0^n (S_{si})^\rho di \right]^{1/\rho}, 0 < \rho < 1 \quad (2)$$

其中, n 表示消费性服务产品种类的数目; S_{si} 为消费者对第 i 种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消费量;参数 ρ 表示消费者对消费性服务产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当 ρ 越接近于1时,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强度就越弱;当 ρ 越接近于0时,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强度就越强。 ρ 与CES效用函数中的消费者替代弹性 δ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delta = 1/(1-\rho) \quad (3)$$

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必须先考虑其购买消费性服务产品集合 S_s 时支出最小化问题,即:

$$\min \int_0^n P_{si}^s S_{si} di, \text{ s. t. } S_s = \left[\int_0^n S_{si}^\rho di \right]^{1/\rho} \quad (4)$$

我们通过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对某消费性服务产品需求量 S_{si} 进行求导,并将其代入成本最小化问题的约束式中,从而求得消费者某一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S_{si} = \frac{(P_{si}^s)^{1/(\rho-1)}}{\left[\int_0^n (P_{si}^s)^{\rho/(\rho-1)} di \right]^{1/\rho}} S_s \quad (5)$$

求得消费者对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总支出为:

$$\int_0^n P_{si}^s S_{si} di = \left[\int_0^n (P_{si}^s)^{\rho/(\rho-1)} di \right]^{(\rho-1)/\rho} S_s \quad (6)$$

从上式可以看出,消费者对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支出,就相当于购买了 S_s 单位的消费性服务产品组合,而购买价格为等式右边的前一项,因此该项可视为消费性服务产品组合的价格指数。消费性服务产品价格指数 P_s^s 用下式表示:

$$P_s^s = \left[\int_0^n (P_{si}^s)^{\rho/(\rho-1)} di \right]^{(\rho-1)/\rho} \quad (7)$$

现给定收入 Y 和一组价格,即 P^A 、 P^M 分别为农产品和工业制造品的价格, P_{si}^s 是第 i 种消费性服务产品的价格,那么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p^A A + p^M M + \int_0^n P_{si}^s S_{si} di = Y \quad (8)$$

当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假定某一消费者的收入为 Y 且 $Y \leq \bar{G}$,那么该消费者就会把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农产品。农产品、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消费,即 A 、 M 和 S_{si} 可以分别表示为:

$$A = Y, M = 0, S_{si} = 0, i = 1, 2, \dots, n \quad (9)$$

在此种情形下讨论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本文考虑

$Y \geq \bar{G}$ 时的情形,此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A = \bar{G}$,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转化为:

$$\max U(M, S_s), \text{ s. t. } Y - \bar{G} \geq p^M M + \int_0^n p_{si}^s S_{si} di \quad (10)$$

据此可以推导出消费者对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非补偿型消费需求的函数,即:

$$M = (1 - \alpha)(Y - \bar{G})/p^M \quad (11)$$

$$S_{si} = \frac{(P_{si}^s)^{-\theta}}{\sum_{i=1}^n (P_{si}^s)^{1-\theta}} \alpha(Y - \bar{G}), i = 1, 2, \dots, n, \theta = (1 - \alpha)^{-1} \quad (12)$$

命题 1:上述结果论证了消费者效用函数接近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即如果消费者的收入超过 \bar{G} ,他们就会以 α 和 $(1 - \alpha)$ 的比重分别将剩余的收入部分用于购买消费性服务产品和工业制造品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

(三) 生产者行为

根据前文的假设,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规模收益不变,农产品生产需投入两种要素,即土地 H_A 和劳动力 L_A ,且其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即:

$$A = TL_A^\gamma H_A^{1-\gamma}, 0 < \gamma < 1 \quad (13)$$

这里, T 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的生产要素为劳动力 L_M 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品 S_M 。为了方便计算,假定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固定投入比例,那么工业制造品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M = R \min\{L_M, S_M/b\}, b > 0 \quad (14)$$

其中, R 为工业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b 为生产者服务业产品和劳动力投入的比率。

与此同时,我们将考虑各部门的生产成本问题。假定劳动力的工资为 w ,土地租金为 v ,生产者服务业产品总体的价格指数用 P_m^s 来表示,那么农业生产成本函数可如下表示:

$$C_A(w, v, A) = K_A w^\gamma v^{1-\gamma} A, K_A = \gamma^{-\gamma} (1 - \gamma)^{-(1-\gamma)} / A \quad (15)$$

对于工业制造业来讲,其生产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C_M(w, P_m^s, M) = (1/R)(w + bP_m^s)M \quad (16)$$

生产者服务业产品总体的价格指数 P_m^s 则表示为:

$$P_m^s = \left[\int_0^n (P_{mi}^s)^{\rho/(\rho-1)} di \right]^{(\rho-1)/\rho} \quad (17)$$

如果制造业部门要生产 M 单位的产品,就应该需要 uM/R 单位的生产者服务业产品,且对于某一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函数可由下式表示:

$$S_{Mi} = b \frac{M}{R} \frac{P_{mi}^{s-\theta}}{\left[\sum_{i=1}^n (P_{mi}^s)^{-\rho\theta} \right]^{1/\rho}} \quad (18)$$

每种服务产品由唯一的生产者提供并满足 CES 函数。我们假定服务业产出的唯一要素投入是劳动力,且使用一个劳动力存在着一个固定成本 F ,而每生产一单位的服务产品需要 φ 单位的劳动力,且生产者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之间存在近似的替代性。为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设定 $P_{mi}^s = P_{si}^s$ 。对于所有服务企业来说,每生产一单位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均为 φw ,但由于服务业是垄断竞争的,其价格并不等于边际成本。

现假定总收入为 Y ,根据(12)式和(18)式可知消费者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总需求量为:

$$S_i^{AD} = S_{si}^s + S_{mi}^s = \left\{ \frac{(1 - \alpha)(Y - \bar{G}L_0)}{\sum_{i=1}^n (P_{mi}^s)^{1-\theta}} + \frac{(b/R)M}{\left[\sum_{i=1}^n (P_{mi}^s)^{-\rho\theta} \right]^{1/\rho}} \right\} P_{mi}^{s-\theta} \quad (19)$$

下面考虑某一垄断的服务企业生产者 i 的利润最大化问题。该生产者的利润可表示为：

$$\pi_i = (P_{mi}^s - \varphi w) S_i^{AD} - wF \quad (20)$$

现将(19)式代入(20)式中,根据最优化理论可求得服务业生产者 i 的最优价格为：

$$P_{mi}^s = \varphi w / \alpha, i = 1, 2, \dots, n \quad (21)$$

这一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业是根据成本加成法确定服务产品价格的,加成系数为 $(\frac{1}{\alpha} - 1)$ 。再根据(21)式可求得生产者服务业产品总体的价格指数 P_m^s ,即：

$$P_m^s = \frac{\varphi w}{\alpha n^{1/\alpha\theta}} \quad (22)$$

命题2:制造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生产者服务业中间投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其原因在于生产者服务业采用成本加成法来确定服务产品价格,这样不论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量有多少,生产者服务业总存在着经济利润,且与需求量呈正相关的关系,即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具有依赖性。

命题3: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规模越大、市场竞争越激烈,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就越低。具体表现为生产者服务业所能提供的产品种类与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决定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成本。服务业数目越多,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工业制造者所购买的相应服务产品的有效价格就越低^①。也就是说,越多的生产者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就越能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四) 均衡问题

均衡问题包括:(1)劳动力在三个部门之间如何分配;(2)要素的价格怎么决定;(3)服务业的产出情况;(4)农产品、工业制造品以及服务产品的消费情况。首先,由于只有农业部门才会需要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因此所有土地将全部充分有效地用于农产品生产,即 $H_A = H_0$ 。其次,劳动力工资和土地租金均由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决定,且取决于农业劳动力的数量。这可由(13)式推导得出：

$$w(L_A, T) = T\gamma(H_0/L_A)^{1-\gamma} \quad (23)$$

$$v(L_A, T) = T(1-\gamma)(L_A/H_0)^\gamma \quad (24)$$

如果有数量为 L_A 的劳动力从事农产品生产和经营,就不难得出农产品的总产出 $A(L_A, T)$ 和该经济体的总收入 $Y(L_A, T)$ 为：

$$A(L_A, T) = TH_0^\gamma L_A^{1-\gamma}, 0 < \gamma < 1 \quad (25)$$

$$Y(L_A, T) = L_0 w(L_A, T) + H_0 v(L_A, T) \quad (26)$$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只要经济体的农产品产出和需求之间存在差异就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根据研究可知,该差异为 $[Y(L_A, T) - \bar{GL}_0]$,即可消费的工业制造品数量为 $[Y(L_A, T) - \bar{GL}_0]/P_M$ 。由(1)式和(11)式可知,当消费者的收入高于 \bar{G} 时,消费者用于工业制造品的消费比例为 α ,即可消费的工业制造品数量为 $(1-\alpha)[Y(L_A, T) - \bar{GL}_0]/P_M$ 。所以,该经济体内部所生产的工业制造品数量 $M(L_A, T)$ 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M(L_A, T) = (1-\alpha)[Y(L_A, T) - \bar{GL}_0]/P_M + [A(L_A, T) - \bar{GL}_0]/P_M \quad (27)$$

当制造业产出为 $M(L_A, T)$ 时,制造业对劳动力直接需求量为 $L_M(L_A, T)$,可用下式表示：

$$L_M(L_A, T) = M(L_A, T)/R \quad (28)$$

对于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我们可以根据(18)式和(21)式推导出来。由于每种服务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一个固定投入 F ,且每单位的服务产出需要 φ 单位的劳动力,我们推导出的生产者服务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为：

^①在 Markusen, Fujita, 安虎森,梁琦等人的相关模型或著作中都曾得到类似的这个结论。

$$L_S^M(L_A, T, n) = nF + \varphi \frac{M(L_A, T)}{Rn^{1/\alpha\theta}} \quad (29)$$

(29)式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与制造业的发展呈现同向关系,即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而提高。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L_A + L_S^M + L_S^S + L_M = L_0 \quad (30)$$

显然,(30)式的结果取决于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 $L_A(T, n)$ 。这就必须推导出生产者服务业数目的均衡值 n 。为此,我们将考虑生产者服务业的利润情况。生产者服务业的利润函数为:

$$\pi_i = (P_{mi}^s - \varphi w) S_{mi}^s - wF = \frac{b\varphi M(L_A(T, n), T) w}{\alpha\theta Rn^{1/\alpha\theta}} - wF \quad (31)$$

命题4: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为紧密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的经济效益或者发展状况直接取决于制造业的发展,且两者之间表现出正相关性,即制造业产出 M 越大,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效益 π_i 就越大;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即制造业产出 M 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投入的需求数量 n 。

命题5: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有赖于制造业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为制造业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就越大,而且表现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促使生产者服务业更专注于具备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环节,促进相关生产者服务外包和分工协作的进一步加强,这必将导致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市场供给增多,进而降低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市场价格,刺激制造业增大对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量。

为了推导出生产者服务业数目的均衡值 n ,我们假定生产者服务业的超额利润为零,即:

$$\frac{b\varphi M(L_A(T, n), T)}{\alpha\theta Rn^{1/\alpha\theta}} - F = 0 \quad (32)$$

根据前文的假设与分析可知,(32)式中所有相关的内生变量均可以得到,这样我们就能求出生产者服务业数目的均衡值 n^* ,从而此时的人均收入为 $y = Y(L_A(T, n^*), T)/L_0$ 。根据(11)式和(12)式,我们就容易求出消费者对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需求量。

综上所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各自的发展壮大对双方都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的增加,而且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大小^[13];另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影响着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影响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见,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呈现一种唇齿相依的双向互动关系。因此,我国在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时应努力加大投入来增强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化的发展;同时还应注重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通过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生产者服务业的外包并扩大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

四、产业互动发展的经验分析

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的发展,除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外向化之外,服务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当前,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效应正日益凸显。根据历年统计年鉴可知,制造业的增加值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值分别由1978年的1607亿元和585.9亿元持续上升到2008年的129112亿元和90761.4亿元,它们各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94%和30.19%^①。从

^①根据生产者服务业的定义,笔者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来衡量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值。

图1和图2可知,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两者的增加值折线走势极为相似,且生产者服务业增长率与制造业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也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本文利用 $\ln ZZY = \alpha + \beta \ln PSI$ (其中 ZZY 为制造业增加值, α, β 为常数, PSI 为生产者服务业增加值) 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3]。通过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相关系数 $r = 0.9977$)。由计量回归分析可得: $\ln ZZY = 1.766 + 0.866 \ln PSI$, 其中 $R^2 = 0.996$ 。这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非常大。在制造业增长速度快的年份,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率也呈上升趋势。在变动的时点上,生产者服务业增长率的变动总体上稍微滞后于制造业的增长率。可见,制造业的发展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关系不仅表现在相互促进,而且表现在相互依赖,尤其是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较大。所谓的产业依赖度是指某个行业的生产过程中某项中间产品的投入系数(又称直接消耗系数)占全部中间产品投入系数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 $d_{ij} = \frac{a_{ij}}{\sum a_{ij}}$, 其中 a_{ij} 是投入系数。

因此,本文借助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将代码为06~21的制造业行业 and 代码为27~42的生产者服务业行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计算可知(见表1),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依赖度较高,其中11个制造行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度高于20%。另外,我们还借助服务投入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程度。服务投入率是指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的服务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它反映了国民经济服务化的程度。

从表1可以看出,10个制造行业的服务投入率比重超过1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更是分别高达35.32%和34.23%。在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来自生产者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所占比重越大,说明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依赖性越强,也表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生产者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生产者服务业通过制造业的中间需求间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依赖度的增高是技术变革和劳动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得益于企业追求规模经济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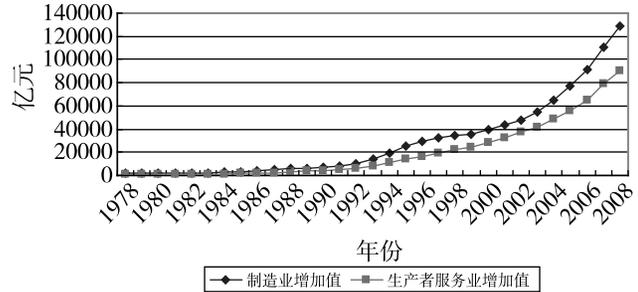


图1 1978年—2008年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两者增加值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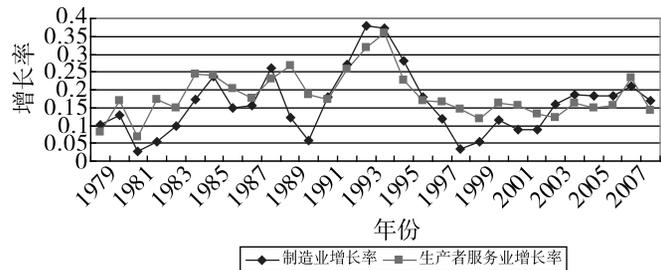


图2 1979年—2008年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两者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表1 制造业的服务投入率和产业依赖度

制造行业	服务投入率(%)	产业依赖度(%)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26.74	52.33
纺织业	3.82	8.35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21.25	30.40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5.99	20.63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34.23	47.98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35.32	43.78
化学工业	11.61	29.6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02	8.28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40	1.45
金属制品业	6.14	14.89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7.02	14.4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3.74	41.6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5.96	37.1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9.64	26.99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7.87	45.57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14.39	22.52

和范围经济效应所采取的剥离和外包,同时生产者服务业所带来的高效率 and 低成本,又进一步拉动了制造业对该类服务的需求。因此,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发展关系。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基本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建立数理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协调发展的关系。另外,制造业是生产者服务业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生产者服务业则通过中间产品投入支持了制造业的发展,改善了制造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制造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具体结论如下:

首先,随着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者服务业所提供的产品数量增加,这使得生产者服务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服务企业有两种选择,要么降低产品的市场价格以获取市场占有率,要么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树立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这两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利于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因为如果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制造业就能够降低成本;如果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品质量和水平提高,制造业的产品品质就会得到保障。

其次,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人工资呈现正相关关系,如果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就会有所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会增强,对工业制造品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大,同时也扩大了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推动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再次,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产者服务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即制造业的发展水平越高,生产者服务业对劳动力直接或间接的需求也就越大。因为制造业越发展,其对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的需求就越大,进而促使生产者服务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大。

最后,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影响着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因为生产者服务业产品种类的多寡意味着专业化分工程度和制造业部门服务外包化程度的高低,而专业化分工程度和服务外包化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制造业“专于精、求于强”,有利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虽然我国的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它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不能形成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两者之间良性有序的互动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生产者服务业的总供给量不足、发展滞后,供给不能有效满足消费需求;服务价格偏高、服务质量差;内部结构不合理,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中传统生产者服务业比重较大等方面。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第一,积极推进规制、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改革,尽量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标准以及建立公开、公平、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内部的有序竞争,从而适应生产者服务产业化、市场化的趋势。

第二,遵循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发展的规律,改变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提高制造业的社会化生产水平,鼓励制造业企业专注于自身的优势与强势环节,注重核心技术的培育和市场竞争力提升,通过生产者服务外包化来整合外部专业分工优势,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同步成长和全面升级。

第三,大力支持有竞争力的生产者服务业企业跨地区兼并与重组,提升生产者服务业的水平和质量、增加服务产品的数量与品种,并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采取集约型、集聚化发展模式,特别是将城市作为生产者服务业的主要空间载体,充分发挥区域集聚与辐射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发展。

第四,测算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构建产业互动发展机制,建立健全产业中介体系,同时促进企业间相互协作,充分发挥企业的正外部性作用,实现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从而最终推动生产者服务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重.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J]. 天津社会科学, 2006 (2): 89-92.
- [2] Browning C, Singelman J.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 [M]. Springfield: [s. n.]. 1975.
- [3] 冯海华, 王珏.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5): 88-92.
- [4] 刘志彪. 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J]. 中国经济问题, 2001 (1): 3-9.
- [5] Guerrieri P, Meliciani V.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5, 16: 489-502.
- [6] 程大中. 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黏合剂”作用[J]. 财贸经济, 2004 (2): 68-74.
- [7] 程大中.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 (1): 76-88.
- [8] 高传胜, 刘志彪. 生产者服务与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聚和发展——理论、实证与潜力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05 (8): 35-42.
- [9]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 243-264.
- [10] Martinelli F.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dvanced produced services in the Italian space economy [J]. Progress in Planning, 1995 (43): 223-240.
- [11] 藤田昌久, 克鲁格曼, 维纳布尔斯. 空间经济学 [M]. 梁琦,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2] 李朝鲜. 理论与量化: 现代服务产业发展研究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 [13] 任志成, 武晓霞. 承接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 [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09 (3): 1-6.

[责任编辑: 杨志辉, 陆惠敏]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 Service Sect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Interaction

FENG Haihua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specialized division, the promo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toward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ocial economy is becoming more obvious, and driving forwar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o the service-oriented economy. So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es, constructs and analyses the model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er service is playing a vital role du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e clustering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outsourcing can better promote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local economy.

Key Words: industry interaction;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ndustr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utsourcing service

现代审计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有效尝试

——评《审计心理学》

李凤鸣

作为一名审计理论研究者,总是希望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探讨新问题、提出新观点,甚至开创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尝试开创新领域具有很强的挑战性,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而且要具有较强的学术迁移能力;要求研究者既能在梳理已有中外文献上得心应手,足能“以正视听”,更要能密切联系最新的现实问题和学科专业环境,提出新见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王会金教授的《审计心理学》新作,就能给予我们这样的印象,并给人一种难能可贵之叹。该书不仅是王会金教授本人继《风险导向审计》、《知识经济与现代审计》等著作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南京审计学院“审计学国家级教学团队”以及江苏省高校“现代审计理论与方法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的系列成果之一。

审计心理学是现代审计学与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的问世,正如裘宗舜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言,“为审计科学百花园地里增添了一枝奇葩”。综观《审计心理学》一书,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最值得称道,一是浓厚的理论色彩,二是严谨的逻辑结构,三是鲜明的实用价值。

浓厚的理论色彩

上个世纪60年代前,审计一直被认为是完全实务性的,这一观点的盛行,使审计理论研究长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1961年,莫茨(Mautz)和夏拉夫(Sharaf)两位教授的专著《审计哲学》(Philosophy of Auditing)问世,开创了西方审计理论研究的先河。正如他们在该书中所说:“如果没有系统理论的支撑,很难想象审计还能够进入科学的殿堂和被认为是一门有学问的职业”。我国对审计理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1989年和1995年分别在贵州和四川举办的两次全国审计基本理论研讨会,对审计概念、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及审计基本理论体系等进行了深入研讨,这对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基本理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有关学者对审计基本理论越来越关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但对审计活动中的行为主体——人这个最重要、最活跃因素的心理问题的研究却仍显薄弱。

综合运用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相关理论来剖析包括常见的贪污与舞弊等审计领域所涉及的心理问题以及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的各种心理现象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点。作者专门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本书所运用的理论,而理论分析的内容更是贯穿于全书。这和本书的选题及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多年来,王会金教授对学术孜孜以求,紧密追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实践最新经验及其运行效果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学术研究思维缜密、思路开阔。本书正是作者多年来对审计科学与心理科学合理嫁接并深入研究思考的结果,作者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也是本书诸方面研究观念的细化和深化。

作者科学界定了审计心理学与普通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指出两者是基本理论与具体应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厘清了审计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劳动心理学的关系,指出以上四种心理学虽均属于应用心理学的范畴,但管理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相互结合,共同为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和职工的满意感服务;而审计心理学则融汇了所有的相关心理活动,并对其进行分析、考察和研究。

又如,作者在分析审计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时,强调审计心理学绝非是审计学和心理学研究内容的简单罗列,更不

是从审计学角度运用几个心理学术语拼凑而成。审计心理学研究的物质运动性、规律客观性、要素相关性、内容多元性、精神时代性以及广泛群众性等特征,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绝非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变动的。

显然,上述理论研究不仅具有基础性,而且具有开创性。

严谨的逻辑结构

《审计心理学》是作者 20 余年研究审计学基础理论的集大成之成果,有着非常严谨缜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全书由三大板块构成:第一板块是审计心理学的专题理论研究;第二板块是审计心理学中的“人—人”关系研究;第三板块是审计心理学中的“人—物”关系研究。三大板块脉络清晰、纵横贯通、经纬互补、层层推进,整个专著将审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及审计职业心理、审计个体心理、审计组织与群体心理、审计关系心理、审计计划与方案确定心理、审计调查心理、审计取证心理、审计报告心理、审计决定心理、宏观调控心理、审计法规心理、常见财经违规心理及审计对策、审计质量心理和审计政治思想教育中的心理等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许多学者在撰写审计学专著时,在篇章结构上都会遇到这样一个困惑,即如何处理好“审计主体为主线”和“审计客体为主线”的问题。其实,无论是“审计主体主线论”(即按照政府审计、内部审计、民间审计来组织框架),还是“审计客体主线论”(即按照财政财务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等来组织篇章),都难免会落入俗套或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

作为一部厚重的审计基础理论的专著,显然要求著者不仅要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还必须占有详尽而扎实的资料。由于审计心理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普遍关注,译介的原始资料和文献又十分匮乏,尤其对于发展演变中的动态信息,若要同步了解更是困难重重。而王会金教授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十多年持之以恒的求索和对学术前沿的紧密跟踪,拥有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同时,他也适时地吸纳了国际学术前沿的一些新观点、新方法,使自己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拓展和跃进。

正是基于前期的深入思考,作者没有简单地对所谓的政府审计心理、内部审计心理、民间审计心理以及财务审计心理、绩效审计心理、经济责任审计心理等泛泛而谈,而是独辟蹊径,从审计心理学研究的“人—物”关系和“人—人”关系两个方面入手,对审计主体的心理现象、被审计者的心理现象、审计中各种行为的心理特点、审计的社会心理效力以及审计活动中的心理交互作用等内容进行重点研究,这种框架显然凝聚着作者对审计心理学的深入思考和独特见解。

鲜明的实用价值

《审计心理学》在开展理论分析的同时,也不乏有特色的个案分析和事例研究,这有助于人们从更广的视野、更深的层面和更加贴近现实的角度去认识审计心理问题,同时,也使本书更加具有可读性。

例如:在审计实施阶段,对审计对象进行心理分析时,作者系统探讨了审计对象在面对审计时主要表现出的对抗心理,指出持这种心理的被审计者一般会认为审计是有目的地来查找自己的问题,是专门来挑刺找毛病的。因此,他们不会主动配合审计,往往表现出各种形式的对抗,如出言不逊、蛮横无理、喊冤叫屈。

针对上述心理特征,作者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取证技巧:摸清对方心理——把握分寸、切中要害;对人倾注真情——因人而异、先理后情,并以个案分析的形式予以佐证。这些见解引导审计人员和审计管理者不仅要将自己定位在监督者的角色,更多地还要从帮助被审计单位改善管理、提高效益的建设者高度来定位自身审计工作,这无疑又与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所强调的增值型内部审计,以及刘家义审计长所提倡的发挥审计监督的“免疫系统”功能,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层面揭露问题,避免“屡查屡犯”现象,立足服务坚持监督等要求是一致的。

这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互为表里、心理分析与对策建议相得益彰的做法,表面看来是比较容易的,好像只要检索到材料,就能够把问题解决,其实在实际操作中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对材料的处理上,如果没有很规范的好方法,就会把材料做成一锅粥,根本不可能做到科学化。显然,王会金教授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他综合运用了审计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可靠的,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也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总之,《审计心理学》是审计基础理论研究中一部值得一读、不可不读的力作。

《审计与经济研究》理事会

理事长

王家新 南京审计学院院长

副理事长

张炳功 审计署驻重庆特派办特派员
李勇库 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办特派员
杨宁生 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办特派员
袁野 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特派员
王秀明 审计署驻深圳特派办特派员
王鸿津 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办特派员

李玲 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特派员
胡大华 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特派员
刘正均 审计署驻长春特派办特派员
赵耿毅 江苏省审计厅厅长
王殿军 江西省审计厅厅长
王会金 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

常务理事

高仁全 四川省审计厅厅长
屈方方 陕西省审计厅厅长
葛梦彬 河北省审计厅厅长
张如飞 贵州省审计厅厅长
何振中 甘肃省审计厅厅长
黄必贵 广西壮族自治区审计厅厅长
周志豪 江苏省苏州市审计局局长

翁国玖 江苏省南京市审计局局长
王凡 江苏省无锡市审计局局长
刘景旺 湖南省长沙市审计局局长
康巨文 山西省大同市审计局局长
吴利林 安徽省合肥市审计局局长
张炳泉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
夏平 南京银行行长

理事

王耘农 重庆市审计局局长
白日玲 辽宁省大连市审计局局长
陈立民 山东省济宁市审计局局长
吴进立 山东省枣庄市审计局局长
周效华 江苏省常州市审计局局长
张俐 江苏省扬州市审计局局长
顾天荣 江苏省兴化市审计局局长
孙芬 海南省海口市审计局局长
孙志强 江苏省大丰市审计局局长
丁岱 湖北省荆门市审计局局长
纪进 江苏省南通市审计局局长
夏光明 安徽省马鞍山市审计局局长
苏士军 江苏省连云港市审计局局长
陆啸峰 江苏省泰州市审计局副局长

路玉萍 深圳市南山区审计局局长
初群 南京市浦口区审计局局长
罗希德 深圳市福田区审计局局长
夏元顺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审计局局长
马世永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审计局局长
张继红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审计局局长
严华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审计局高级经济师
魏国辰 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院长
喻强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商学院院长
徐永林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管理学院院长
孟祥霞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副院长
罗莉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
邱学文 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副院长